

CONTENTS

No. 8, 1999

- An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rket Wang Bing and Lin Youping(6)
Problems of Property Right Appearing in Current Reform of Stock Cooperation
System Huang Kaixuan(12)
How Should China Utilize the World's Commercial Net of Oversea Chinese after
She Participat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iao Xiaojian(17)
An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 View from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 Chen Lijie(21)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Guo Xue) in China during Modern
Time Zhong Shaohua(25)
Thinking Ways of a Scholar, Chen Rongjie, and His Achievement
..... Zhou Chicheng(39)
A Look into Current Chinese Philosophy, Referring to '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Jing Haifeng(44)
A Review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ith a Standing
Poi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for 80 Years and the P. R. of China
for 50 Years Xia Shuzhang(47)
Guangdong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I Zeng Jinyi(48)
No Prosperity of Social Sciences if without the Reform and Openess
..... Huang Dehong(49)
The Causes for That England and Easten India Company Changed Its Trade
Center in China from Xiamen to Canton Zhang Yanqing(50)
Distribution of Padd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 Investigation on
Local Chronicles Concerned Min Zongdian(54)
Some Historic Problems about Macao Opened as a Port Tan Shibao(61)
On the Current Stage Plays in Macao: Subjectivization and Multipolization
..... Lai Bojiang(71)
Anecdotes about How ' The Handwritten Copy of Gu Jin Poetic Dramas Originaly
Stored by Maiwang Private Library' Was Discovered and Handed Down
..... Song Ruoyun(76)
Obscure Language, Obscure Thinking, and Daily Speaking Communication
..... Zeng Yantao(83)
A Test and Analysis over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Monority Nationality
Students at College in Guangdong Liu Jin(87)
Points from ' The Symposium on How Keeping a Lookout for Financial Risk
and Standardizing the Management of Insurance' Tan Zhanming(91)
An Introduction to Gong Yuzhi and Zhang Lei's Work ' Three Great Men
of the 20th Century' Wen Xianyuan(94)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4/ 义不容辞，积极投入反对“法轮大法”的思想
政治斗争

——广东省社科联向全省社科工作者发出
倡议

•经济学 管理学•

6/ 王 冰 林幼平：不同类型市场评议

12/ 黄凯旋：当前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17/ 廖小健：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华商网络

21/ 陈丽洁：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

•人文精神与当代学术•

25/ 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哲学•

39/ 周炽成：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

——陈荣捷的学思与功业

44/ 景海峰：从《剑桥哲学词典》看当代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五十年•

47/ 夏书章：从五四运动 80 年和建国 50 年看我国
社会科学的发展

曾近义：我与广东哲学学会

黄德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科学繁荣

录

·历史学·

50/ 张燕清: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
转向广州的原因

54/ 闵宗殿: 从方志记载看明清时期水稻的分布

·澳门研究·

61/ 谭世宝: 澳门开埠的若干历史问题

71/ 赖伯疆: 当代澳门话剧: 主体化和多元化

·文学 语言学·

76/ 宋若云: 谁驾玉轮入海底 辗破琉璃千顷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和流传

83/ 曾衍桃: 模糊语言、模糊思维与日常言语交际

·教育学·

87/ 刘 金: 广东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测验
与比较研究

·学术动态·

91/ 谭湛明: “防范金融风险, 规范保险经营” 座
谈会论点综述

·书评·

94/ 温宪元: 振兴中华的杰出领袖
——喜读龚育之、张磊等著《世纪三伟人》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46307

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 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义不容辞, 积极投入反对“法轮大法” 的思想政治斗争

——广东省社科联向全省社科工作者发出倡议

(本刊讯)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 20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近日在省社科联聚会,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和处理“法轮功”的《7·19 通知》精神。与会理论工作者一致地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 认为党的英明决策保证了党的群众基础、理论基础, 维护了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法轮功”非法组织的取缔是思想路线上的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胜利。

与会同志痛斥了“法轮功”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严重危害, 深刻揭露了“法轮功”的本质, 认为它不是一般所谓的伪科学, 而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 它不是一般所谓的非理性, 而是根本的反理性; 它也不是一般认识上的唯心主义理论, 而是妖言惑众的歪理邪说。

与会者认为, 充分认识和发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作用, 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用无神论反对有神论, 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维护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是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法轮功”这样一个邪教组织, 那样一套低劣的完全违反常识的歪理邪说居然影响如此之大, 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说明我们的理论工作尤其理论普及工作还必须进一步加强。为此, 与会者以及省社科联特向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各学科学术团体和社科研究单位发出倡议:

一、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解

策和方针, 旗帜鲜明地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 宣传社会主义法制, 从理论的高度批判和揭穿“法轮大法”的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的歪理邪说,

反对迷信和愚昧,维护社会稳定。

二、各级社科联及各学会、研究会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和科学文化阵地,真正做到“守土有责”。要充分发扬各学科、各团体的优势,多角度、多渠道、多种形式地开展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工作,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人民群众对错误思想、观念的识别能力。

三、要大力加强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研究、普及、推广工作。要组织社科工作者走向社会,贴近现实,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科普大军,深入持久地向广大群众和广大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形成崇尚真理、崇尚科学、崇尚文明进步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坚决抵制各种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非法出版物,同时,大力扶持弘扬正气,弘扬科学,弘扬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章、书籍、音像的写作、制作和出版,拿出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品味高尚、形式新颖的好文章、好书籍,占领思想阵地和文化市场。近期,要打好主动仗,要针对“法轮大法”宣扬的谬说,组织出一批有理有据、说服力强的批判文章,深入剖析“法轮大法”的荒谬本质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肃清其流毒。

五、要把批判“法轮大法”的斗争和当前开展的“三讲”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工作方向,深化社科工作体制的改革,促进社科事业的不断繁荣。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发挥社科联“四大作用”的要求,振奋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我省社科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我们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社科理论队伍。

责任编辑:冯 生

不同类型市场评议

□ 王 冰 林幼平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不同类型市场 竞争 垄断

[摘 要] 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历史和现实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市场类型。本文对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进行评议,拟为市场主体正确认识市场以及采取正确的市场策略提供理论指导,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8-0006-06

一、对完全竞争市场的评议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竞争不受任何形式干扰、阻碍和限制的市场类型。这种市场完全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政府承担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这种市场类型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市场上有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任何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具有同质性,不存在差别;生产者进出市场不受社会力量限制;市场交易活动自由、公开,没有人为限制;市场信息畅通准确,市场参与者充分了解各种情况;各种资源都能够充分流动。

具备了以上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类型,应当是一种有配置效率的市场类型。这是因为:(1)完全竞争市场可以使微观经济运行保持高效率。完全竞争市场全面排除了任何垄断和限制,完全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因而生产效率低和无生产效率的生产者会在众多生产者的相互

竞争中被迫退出市场,生产效率高的生产者则得以继续生存,同时,又有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者随时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者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取胜。这样一来,完全竞争市场便促使生产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行高效率的生产。(2)完全竞争市场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完全竞争市场可促使生产者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从而推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他们要想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就必须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也即必须按照其产品平均成本处于最低点时的产量进行生产。生产者以最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最高产量的产品,就提高了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利用效率,因而这种生产过程就是一种促进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3)完全竞争市场可促进社会利益。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在引

导生产者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是亚当·斯密的重大发现及著名论断。他认为,市场竞争引导每个生产者都不断地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所考虑的并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由于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例如,每个生产者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其结果必然会使社会的年收入额增加,从而也促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4)完全竞争市场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资源能不断地自由流向最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生产部门,在资源的不断流动过程中实现了资源在不同用途间、不同效益间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组合间的有效选择,使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用,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效益。(5)完全竞争市场有利于消费者及其消费需求满足的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价格趋向等于生产成本,因而,“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形成对消费者来讲最低的价格,”^②而且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利润比其他非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利润要小,所以,“在纯粹竞争的情况下,获利最大的是消费者。”^③同时,完全竞争市场还“可以使消费需求的满足趋向最大化”。^④

完全竞争市场也是一种具有许多缺陷的市场形式。它的主要缺陷:

一是它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只有在具备了严格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才能成立,因而,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也必须在具备了严格的前提条件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完全竞争市场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经济

理论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假设,是其经济分析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这样一来,没有实践意义就成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最根本缺陷。二是它所必需的有大量小企业存在这个条件既不可能也不适用。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即使进入市场非常自由,由于其他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进入市场的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多。即使市场中已存在有大量的企业,这些企业也只能是小企业。在有着大量小企业的情况下,市场商品价格就可能相对较高。三是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自由进入使效率更高、产品更能适合消费者需要的企业不断涌进市场,而那些效率低、产品已不能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企业又不断地被淘汰从而退出市场。小企业在进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正常的和经常的现象。那些因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的企业,其整个企业的设备与劳动力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被迫停止使用,这样,就不能不造成资源的浪费。四是完整知识假设。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只能具有不完整的知识。生产者对其在现实市场中的地位、将来发展的动向及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信息等都不可能完整地掌握,只能经常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进行活动。消费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场上全部产品的价格、品质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市场信息也不可能畅通无阻而且非常准确。

尽管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研究完全竞争市场类型仍有积极的意义。分析研究完全竞争市场形式,有利于建立完全竞争市场类型的一般理论,当人们熟悉掌握了完全竞争市场类型的理论及其特征以后,就可以用其指导自己的市场决策,例

如生产者就可以在出现类似情况时(如作为价格接受者时等)作出正确的产量和价格决策。更重要的是分析研究完全竞争市场类型理论,可为我们分析研究其他市场类型提供借鉴。

二、对完全垄断市场的评议

完全垄断市场,是指只有唯一一个供给者的市场类型。完全垄断市场有三个方面的假设条件:整个市场的物品、劳务或资源都由一个供给者提供,消费者众多;没有任何接近的替代品,消费者不可能购买到性能等方面相近的替代产品;进入限制使新的企业无法进入市场,从而完全排除了竞争。

完全垄断市场的形成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如:生产发展的趋势,规模经济的要求,自然垄断性行业发展的要求,保护专利的需要,对进入市场的自然限制、法律限制等,都是完全垄断市场形成的重要原因。

从完全垄断市场形成的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市场类型对社会有利的方面:(1)具有促进资源效率提高的可能性。规模经济是完全垄断市场形成的重要原因,完全垄断市场具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集中地表现在规模经济上。要形成完全垄断市场,必须要拥有并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和投资,只要充分发挥投入的大量固定资产和投资的效用,企业就具有进行规模生产的能力,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一方面提高产品的产量,增加产品的品种,提供全部供给。这时的产量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企业的产量;另一方面减少资源的消耗,尽量降低产品的成本。(2)具有刺激创新的作用。完全垄断市场类型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专利是形成垄断的一种

原因,只要创造出一种新产品、劳务或新的加工技术,获得专利,就形成对这种产品、劳务或加工技术的垄断;同时,只有对创新进行专利保护,授予创新者以垄断权力,才能促进创新。这是因为完全垄断市场通过专利形式给予创新者以垄断排他性权利,使创新者在一定时期内享有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就会刺激垄断者继续大量投资于科研开发工作,这样就能促进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创新活动的开展,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完全垄断市场也存在着对社会不利的一面:

一是会造成市场竞争的损失。完全垄断市场的物品、劳务或资源都由一个供给者提供,即完全由一个企业垄断;在这种市场类型中,由于法律和自然的限制,新的企业无法进入市场,因而完全排除了市场竞争。完全垄断市场排除了竞争之后,垄断企业无竞争压力,它不用改进生产技术同样也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竞争的一定损失,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二是会造成生产效率的损失。在完全垄断市场条件下,垄断企业具有进行规模生产的条件和能力。如果垄断企业进行规模生产,就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产量,获得最佳的生产效率,在获得丰富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垄断企业垄断了市场供给,没有供给的竞争者,因而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手段来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不必通过花费大量投资购买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增加盈利。这样一来谁也不会去设法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

三是会造成社会产量的损失。在完

全垄断市场条件下,由于垄断企业完全垄断了市场供给,因而垄断企业生产的产量决定着市场供给的产品总量。垄断市场的产量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根据平均成本最低点所决定的产量进行生产,即按最佳产量进行生产,社会产品产量是最优产量。而在完全垄断市场条件下,垄断企业则是根据利润最大化所决定的产量进行生产,完全垄断市场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决定的产量只能是低产量。因为只有低产量,才能在垄断市场中卖出高价格,从而获得最大利润。所以,垄断市场首先造成了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的损失,最终造成了社会产量的损失。

四是会造成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在完全垄断市场条件下,由于垄断企业垄断了市场供给,并凭借着垄断权力控制了价格,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垄断企业控制的高价格。这样一来,消费者出高价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背离,消费者的义务与其权利严重背离,必然造成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失。从实质上来看,垄断企业对消费者造成的各种损失,就是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和权利的掠夺。垄断企业对消费者造成的权利损失的行为,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又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垄断企业对其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很难有正确的认识及改进的措施。因而,政府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干预。

完全垄断市场也是一种极端的市场类型,在现实经济实践中也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大多数垄断企业总是要受到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各种方式的干预,而不可能任由垄断企业去完全垄断市场。当然,如

果政府对垄断企业不进行干预或者干预不力,垄断企业垄断市场、损害社会和消费者利益的可能性也是随时可能出现的。

即使完全垄断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研究完全垄断市场理论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例如,研究完全垄断市场理论可以促使我们了解完全垄断市场条件下出现的各种经济关系,从而有利于我们运用这种理论认识来研究现实市场类型条件下市场主体行为如何最佳化;研究完全垄断市场理论还可以使我们明确政府对垄断行为进行调节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调节活动对市场正常运行及对市场主体利益协调的重要作用等。

三、对垄断竞争市场的评议

垄断竞争市场,是指那种既存在着竞争又存在着垄断,既不是完全竞争又不是完全垄断的市场类型。它介于垄断和竞争之间,同时又兼有垄断和竞争两种市场类型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存在着大量规模较小的企业、较多的替代品,市场产品存在着差别,存在着激烈的非价格竞争,新企业进入难度增加等等特点。

垄断竞争市场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市场类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一是有利于消费者多样性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者消费选择的多样性,在生产同质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是无法实现的。而垄断竞争市场则会从制度上激发企业连续不断生产差别产品的积极性,使市场涌现出大量差别产品。大量差别产品的不断涌现,就为广大消费者消费偏好和消费选择的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使消费者的各种消费需

求不断得到满足。同时,非价格竞争构成的产品差别,能促进企业保持商业信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能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从而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二是其效率低于竞争市场但高于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与垄断市场相比较,垄断竞争市场的产量水平相对较高,平均成本和价格水平相对较低,因而资源利用水平较为充分,经济效率相对较高。垄断竞争市场与竞争市场相比较,垄断竞争市场的产量水平又相对较低,平均成本和价格水平又相对较高,因而对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经济效率又相对较低。这样一来,垄断竞争市场的效率,处于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之间,高于垄断市场而低于竞争市场。三是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多而且规模较小,同时产品的替代性很强,因而企业间的竞争很激烈,但是,每个企业生产的又都是差别产品,这又使企业有能力控制其产品的价格和产量,从而拥有一定的垄断能力。垄断竞争市场的这种特征又有利于企业不断提高其竞争能力,在竞争中取胜。因此,垄断竞争企业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水平,生产出更多与其他企业差别更大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开拓更大的市场,从而战胜竞争对手,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四是有利于鼓励创新。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每个企业必须生产出与其他企业有区别的新产品,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差别产品的生产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其一是产品设计创新,设计或引进与其他企业有差别的新产品,如设计或引进质量更高而且款式、形状、颜色等方面不同的产品;其二是服务创新,向消费

者提供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服务;其三是技术创新,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新产品;其四是广告宣传创新,只有与众不同的广告宣传,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关注,等等。总的来看,垄断竞争市场有利于激发起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垄断竞争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一是不能以最佳规模进行生产。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生产的产品产量低于平均总成本最低时的产量规模,其产品的平均总成本高于最低总成本,即企业不能以最佳规模进行生产。二是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生产出产品以后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广告宣传和推销活动,让消费者了解企业的差别产品,熟悉产品的特点,引导或引诱消费者来消费这些产品。巨额的广告宣传和推销费用,最终要平均摊进每件产品的生产成本中,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消费者从产品本身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广告、推销费用投入的上升而增加。三是使消费者消费支付增加。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一方面企业不能以平均总成本最低时的产量进行生产,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高于平均最低生产成本,也即造成产品的直接生产费用成本上升;另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广告宣传与推销活动,从而在较高成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广告和推销费用成本,使产品生产的平均成本大大上升。消费者消费这些产品时,要比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支付更多的货币。

四、对寡头垄断市场的评议

寡头垄断市场,是指少数几家企业或销售者占支配地位的一种市场类型。

在这种类型的市场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是少数生产者或销售者,生产者的生产规模不一致,同时生产者具有相互依存性,其决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着经常性的非价格竞争等。这种市场是由规模经济、进入障碍、竞争压力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寡头垄断市场是一种重要的市场类型,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一是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寡头垄断市场中起支配作用的寡头垄断企业,一般来说实力雄厚,生产规模都较大,具备规模经济的基本条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由此,随着规模经济的实现而使生产成本得以不断下降,从而使寡头垄断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二是有利于先进技术的开发利用。寡头垄断市场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先进技术的开发利用,一个方面寡头垄断者具有的技术创新动机有利于促进先进技术的开发利用。寡头垄断者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因而技术创新的动力必然促进寡头垄断者进行先进技术的开发利用;另一个方面寡头垄断者有经济实力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他们可以在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从而促使技术发展更快。寡头垄断企业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开发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使自己在生产技术方面保持垄断地位,以便获得并维持高额垄断利润。三是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寡头垄断市场中的非价格竞争有利于从多方面提

高消费者的福利。产品质量和产品差别方面的竞争,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大的消费选择余地和更新更好的产品;广告竞争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全面更周到的信息服务;便捷周到的服务竞争,使消费者各种不同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等,都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

寡头垄断市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不利影响。例如,寡头垄断市场,往往会抬高市场价格。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少数寡头垄断企业具有的支配作用以及寡头垄断企业之间常常出现各种形式的勾结,往往会使产品价格抬高,并维持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且不易变动,这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福利。再例如,产品差异的存在和产品差异的竞争,往往会导致大批设备提前更新淘汰和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浪费。另外,大量的广告常常提供无用的和不真实的信息,欺骗消费者;还有那些不计成本、不讲效果的费用昂贵的大量广告宣传和推销活动,为转嫁企业失误的损失给消费者设下了许多美丽的陷阱,等等。这些都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抬高了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使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受到严重的损害。●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第25—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③④[美]托马斯·J·海斯通、约翰·C·罗斯韦尔:《管理经济学》,中文版,第218、219、218—219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谭湛明

当前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 的 产 权 问 题

□ 黄凯旋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讲师, 广东 广州 510070)

[关键词] 股份合作制改革 产权界定 存量资产的量化

[摘 要]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和一部分集体企业的资产不能无偿量化, 只能采取有偿出售或出租等方式, 可以量化的那部分集体企业资产应赋予其完全产权; 对于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企业资产应界定为企业集体所有, 同时要规范产权交易和资产评估。

[中图分类号] 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08- 0012- 05

一、关于存量资产的量化问题

在当前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践中, 企业存量资产的量化是首当其冲的重要的产权问题, 量化的标准和过程是否科学、合理, 直接关系到国有、集体资产的增减存亡, 这是当前我国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经常处理不好的棘手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区分国有小企业与集体企业来分别进行研究。

首先, 对于国有小企业来说, 根据目前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采用国有制形式的理论, 企业所拥有的国有资产显然属于“全民”所有, 每个企业的职工只是“全民”中的一部分, 因此不能将存量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该企业的职工, 否则, 就是对全民产权和利益的一种侵犯。所以, 在国有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中, 国有资产只能采取有偿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而不能把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混在

一起, 将企业部分存量资产无偿量化给职工。国有小企业要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 首先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产权置换, 资产置换的方式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出售。出售的价格应以准确的评估价为基础, 采用一次性或分次买断或零价出售的途径实现国有资产的置换。另一种方式是出租。在改制中, 如果出现国有资产存量较多而职工无力购买的情况, 可以把部分存量国有资产以出租的方式留在企业以支持改制, 由企业同国有资产代表签订资产占用协议并交纳资产占用费即租金, 期限届满既可把这部分国有资产收回也可继续租赁或出售给企业。对于国有资产置换回收的资金, 既可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费用, 也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给企业有偿使用, 或通过成立投资公司进行投资经营活动, 以此实现国有资产的结构优化调整和保值增值。

其次,对于集体企业来说,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不能将集体资产无偿分给个人,必须采用由企业职工购买的方式,否则就是搞“私有化”。我们认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因为,第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集体企业的资产归劳动群众共同所有,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可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两种方式,把集体共有的一部分存量资产量化给职工个人,实行按份共有,既没有改变集体企业资产的共有性质,又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而且,把企业部分存量资产量化给职工个人,只是改变了集体共有资产的实现形式。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虽然属于职工个人,但其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仍然属于集体企业,因而企业“集个人资产进行集体经营”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第二,集体企业长期以来不仅对职工采用低工资制,而且对职工入股的股本金只还股本不计增值,因而企业的存量资产中应该含有应发而未返还职工的部分。把企业的部分存量资产量化给职工个人,无非是将部分应发还的存量资产返还给职工而已,这是一种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所有权归属理论的做法,而不是所谓的“私有化”。但是,对于集体企业存量资产的量化问题,也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来对待:一种情况是集体资产的投资与所有权主体与企业职工相一致,即企业职工就是该企业存量资产的投资者和所有者。在改制中把一部分存量资产由共同共有转化为按份共有,无偿量化给企业职工个人,既没有引起所有权主体的变更,也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性质,而且有利于实现

部分所有权的明晰化和人格化,调动职工增量扩股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职工的主人翁精神。这种做法既合理又合法,值得鼓励和支持。另一种情况是集体资产的投资与所有权主体与企业职工不相一致,如由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所办的企业中的集体资产,其存量部分在改革中就不能采取无偿量化给企业职工个人的方式,否则就会造成集体中一部分人侵占另一部分人资产的情况出现,因为该企业资产属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所有,而企业职工只是大集体中的小部分成员,由小部分人占有大集体的资产既违背“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又会遭到大集体另一部分成员的反,因此这种情况对企业存量资产采用无偿量化的方式并不合理。

对于可以量化到职工个人的部分企业存量资产,要本着有利于实现产权明晰化和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的原则,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企业的机制转换和生存发展。对于难以量化到职工个人的集体企业存量资产,既可采用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让渡给企业职工有偿使用,也可采用设置集体股的方式来处理,但必须明确集体股的产权主体。一般来说,乡村企业的集体股的产权主体应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城镇企业的集体股的产权主体则应为社区联合经济组织,也可通过设立基金法人的方式持有企业集体股或由职工大会暂行集体股股权,具体操作方法可参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1997年)的有关规定执行。总之,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落实企业的资产经营责任制,提高职工对企业资产的关心程度和风险意识,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机制转换、技术改造、结构调整和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与经济效益,一切科学的合理的产权量化方式都可以大胆探索。

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中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部分存量资产量化到企业职工的股权是完全产权还是不完全产权即残缺产权?对于这个问题,国家没有统一规定,但很多地方在实践中把职工的量化股规定为不完全产权,即规定量化股只能作为红利分配的个人凭证,但不能用来继承、馈赠或转让,而且有的地方规定职工被辞退或离开本企业即丧失量化股的拥有权。从理论上讲,量化股可以也应该是完全产权,因为企业存量资产能否量化给职工的依据就是这部分资产是否是职工的投资或劳动积累所形成,必须是职工投资和劳动积累所形成的那部分资产才能量化到职工个人名下,否则量化股的存在就失去了理论根据,可见,投资和劳动积累是量化股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原投资、劳动积累与现资产形成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对应,我们另作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前文提出国有小企业的一部分职工与投资主体不对应的集体企业的存量资产不能无偿量化给职工个人,只有职工与投资主体相对应的那部分集体企业的存量资产才可以量化给职工个人。对于这部分量化股,既然所有权本来就属于企业职工,给他们以完全产权是合理合法的。不赋予量化股以完全产权,使产权主体对量化股既没有处置权又不能用来继承、馈赠或转让,既不符合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规律和资源优化配置规律,又不利于新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壮大。因此,赋予量化股以完全产权是市场经济和股份制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然,赋予职工以量化股的完全产权必须以量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前

提。目前国家没有对集体企业部分存量资产的量化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在改革实践中的操作方法也各有特色。但总的来说,量化的依据主要包括工龄、贡献和责任大小三个基本因素,实际操作起来往往是企业领导所占的量化股比例远远高于普通职工。我们认为,企业领导的量化股的比例高于普通职工符合按生产要素和贡献、责任分配的精神,但不能把差距拉得过大,否则会挫伤普通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甚至会激发职工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我国大多数集体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由于投入小、技术含量低和管理水平低下,劳动积累在企业资产形成中的贡献最大,工龄股在资产量化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太小,普通职工所占的量化股比例太低,并不符合劳动在资产形成的实际贡献。这种做法,有违资产量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原则,容易激发矛盾和引起股权量化纠纷,不利于减少社会震荡和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股份合作制改造实践中,理论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都要积极探索资产量化的合理方法和标准,科学界定工龄、贡献和责任大小在量化股中所占的比例和份额,尽可能为改革实践提供一套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资产量化管理办法和操作程序,以及相应的理论支持,使我国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尽快走上规范化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关于存量资产的产权界定和流失问题

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中,企业存量资产的产权界定经常遇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企业通过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优惠(包括税前还贷和各种减免税等)所形成的资产收益,其产权应该归谁所

有? 目前各地在改革实践中的做法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有的地方把由减免税等各种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企业资产的产权界定为国家所有; 有的地方则规定, 国家减免税和税前还贷是国家对企业的纳税义务的免除, 属于税法上国家法定的减免税形成的资产, 可归集体企业所有, 属于国家特殊照顾享受的减免税形成的资产, 可归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持有。笔者认为, 后一种做法较为科学和合理。因为实行减免税或税前还贷等优惠政策是国家对企业的一种经济管理行为, 而不是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国家设置优惠政策的目的, 是为了鼓励、扶持和帮助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促进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因此不能把各种优惠政策视为国家的投资行为。从理论上讲, 投资行为应该是一种把已经拥有所有权的资产投向企业的行为, 但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显然没有完成所有权的转移过程, 即国家不曾明确拥有过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 因而减免税行为只能视作一种国家对企业的支持行为, 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职能的具体发挥和体现, 而不是一种投资行为, 所以也就不能形成那部分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权益。因此国家国资局在《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规定》(1994年)中明确指出:“集体企业依据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享有减免税优惠而形成的资产, 不界定为国有资产。”如果一定要把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家产权, 则等于把国家减免税行为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那就会引发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难题。因为按照这种逻辑, 国家对“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则国家也拥有“三资企业”那部分由减免税带

来的资产收益的所有权, 那不把外商吓跑才怪呢? 这种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在股份合作制改革中, 资产置换或转移必须通过产权交易来实现。但在产权交易中, 经常遇到一个交易作价和资产评估高低的问题。本来, 企业的财产由资产和负债两部分构成, 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等于企业资产总量减去负债, 企业的产权交易定价由所有者权益决定。目前各地通行的做法是通过资产评估确定存量资产的所有者权益的底价, 然后再由买卖双方通过协商议定价格。问题是在当前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中, 由于资本市场尚未真正形成, 买卖双方一方是国有或集体资产代表, 一方是企业职工, 企业以外的人员无法参与交易竞争, 而企业资产的价值实际上取决于该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并由市场竞争交易决定, 在目前的情况下, 很难科学、合理地得出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作价过低不但会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 而且会引起由人民群众的不满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国家三令五申, 一再强调要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中防止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流失, 并要求所有的产权交易必须经过科学合理的资产评估, 以保护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权益, 然而, 目前我国仍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资本市场发育不良, 社会评估机构尚不成熟, 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也不健全, 因而经常在产权交易中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产权交易中买卖双方的主体能力不对称。在买卖中一方是国有或集体资产所有权代表, 由于其不是真正的所有权主体, 代表的模糊身份容易导致他们对企业资产的“关切度”不高, 甚至可能在买方贿赂的巨大诱惑

面前作出损害资产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而交易的另一方是必须自己掏钱购买存量资产的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关系决定他们对资产作价高度关注。甚至有的企业职工为了压低价格,巧立名目降低、报损库存,以好充次,调整帐务,尽量做足资产损失的文章,以便在产权交易中占到便宜。这样,在产权交易中,一方是“慷慨大方”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代表,另一方是“精打细算”的企业内部职工,买卖双方的主体能力不对称,讨价还价的结果自然是“慷慨大方”者吃亏,企业存量资产低估和流失也就在所难免。第二,在资产评估中,不少企业没有把办公、生活用房、公共福利设施、商标、品牌、营销渠道等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到资产总价中去,即使已把这些要素列入资产评估范围,定价也往往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的流失。第三,在资产评估中,一些评估机构和人员的素质不高,评估程序和方法不规范。按照国家规定,资产评估必须由具有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或经国资部门批准取得资格的机构来承担并依法进行。但目前国资管理部门对评估机构的授权控制不严,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评估中心来统一负责评估事项,各地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素质良莠不齐,而且,由于目前我国资产评估的立法工作滞后,对评估机构和专业评估人员的管理监督不严,甚至出现有些地方管理部门和评估机构搞垄断经营或与买方企业串通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情况,经常造成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流失。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防止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流失,当前必须在改制中抓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第一,要加快资产评估的立法工作和加强资产评估的监控管理工作,加快资本及产权市场的建设,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防止出现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情况出现。同时在交易中要尽量使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代表的主体能力到位,这一方面要提高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代表的业务和思想道德素质,并加强对他们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要依靠客观、公正的社会中介资产评估机构来保证国有、集体资产的准确定价,避免低价出售造成资产流失。第二,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隐蔽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在改制中要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进行全面评估,以账外物资等隐蔽资产要逐项清查、登记,对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要以市场信誉度为依托,根据其形成时所需的实际成本、使用价值和获利能力来准确界定,防止无形资产低估造成资产流失的情况出现。第三,要加快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建设,培育一支业务能力强、思想道德素质高的资产评估专业队伍。通过硬化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坑害国家、集体利益或人为因素造成资产评估不当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以提高资产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度,确保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不受损害,从而促进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华商网络

□ 廖小健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中国 加入世贸 利用华商网络

[摘要]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机会与挑战并存, 对世界市场占有率的机会越来越多, 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 而世界华商网络所起的作用将与日俱增。文章指出, 我们不仅要利用世界华商网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还应积极到海外投资, 建立经销网, 拓展海外市场, 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图分类号] F7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08- 0017- 04

随着 1999 年 4 月朱镕基总理出访美加等国的圆满成功, 中美两国就中国于 1999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了共识,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 举国为之振奋。面对这个期待已久的新形势, 我们应如何充分发挥海外众多华侨华人优势? 如何利用日具规模的世界华商网络?

—

面对新形势展开的讨论, 几乎一边倒地侧重于加入世贸带来的挑战, 关注着如何防御外来攻击, 如何坚守国内固有阵地, 如何在“狼来了后, 与狼共舞”? 舆论暂时还较少注意到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机遇, 较少讨论如何发挥我国的特有优势, 充分利用加入世贸带来的机遇。

毫无疑问, 中国加入世贸后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入世贸, 我国就必须履行承诺, 大幅度降低关税, 撤消大部分贸易保护, 在开放制造业和商品流通业的基础上, 再开放电讯和银行保险等服务业投资市场。可以预料, 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将大量地涌进我国, 并和我

国民族工业争夺国内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随着我国政府过去对民族工业的强有力保护逐渐减弱, 我国民族工业将面临猛烈的冲击, 其赖以生存的国内市场很可能越来越小, 确实有必要严阵以待。

但也应该指出, 世贸的活动是双向对等的, 付出义务必然获得权利, 面对挑战同时也面临机遇。我国加入世贸后的机遇是中国经济将最大程度地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 并最大程度地利用一切机会为我服务。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成员, 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均已降到 5% 以下, 且基本废除贸易壁垒, 它们不仅向世贸各成员开放本国的投资市场, 它们庞大的资金也迫切需要到世贸成员国中寻找投资机会。因此,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随着我国平等地直接地和世贸成员打交道, 我国的商品将更容易地打入世贸各成员国市场, 我国将吸引更多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为我国经济服务, 我国资金也可以在较优惠的条件下, 到世贸的成员国中投资并占有当地部分市场。这也是我国领导人孜孜以求十多年, 愿

意作出一系列让步来换取世贸入场券的意义所在。

因此,加入世贸不仅仅是“狼来了”,更重要的是“虎下山”,不仅仅是防御,更重要的是出击。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加入世贸后的挑战和机遇,把握和利用这个机遇拓展对外经贸,我国就能更有效地利用世贸所提供的机会。我国因打开国内市场所受到的冲击,也有可能随着对外经贸的扩展而减轻。

那么,有了世贸的入场券后,我国企业如何进入世界各国,在陌生的国度里如何拓展海外市场?发挥海外众多华侨华人优势,利用世界华商网络进入各个华侨华人居住国,拓展我国的海疆市场,正当其时!

二

世界华商经济网络是以海外华侨华人的亲、地、神、业和文“五缘”社会网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经营关系网络。其中,亲缘包括血亲、姻亲等宗亲关系;地缘,就是邻里乡党等同乡关系;神缘,即宗教信仰关系;业缘,指同行同业关系;文缘,一般包括同学关系或文化上的联络。五缘观念令人们相互亲近从而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在外部条件或多种压力下人们便组成各种组织,诸如各种姓氏的宗亲会、各个地区的同乡会,以及寺庙神社、学会、行会、工会、协会等。由于地缘和业缘组织的铺盖面比较广,它们最终成为连接海外华商网络的纽带。

华商网络是随着华侨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多,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南洋的贸易和投资很多是在华族同乡之间进行,如米业由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潮州人所控制,橡胶买卖则由福建闽南人所垄断。开始,网络中的华商只是各个地缘或业缘组织中经常接触联系的朋友和伙伴,互相通报消息,偶然也合作开展一些业务。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经营规模扩大和经营内容的多元化,华商之间的传统伙伴关系进一步向业务交织和互相持股发展。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形态由此更

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内部关系包括分支机构、服务网点等;外部关系则包括联营公司、联系公司、联号公司、控股公司、跨国公司等。哈佛大学高健教授的统计指出,华人企业中,国内业务的52%,海外业务的39%,是在华人企业之间进行的。^①进入华商网络就意味着会直接接触各种商业机会。

华商网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售商到批发商再发展到进出口商及各行各业;再由小区到大区到跨国,最终形成一种以方言群帮派和业务往来为基础的经济网络联系。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当地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华商资本结合和业务运营网络联系进一步扩大,不仅华人企业互相联营,华人企业还与所在国原住民企业联营,甚至与国际资本联营。因此,海外华商经济网络并不仅仅局限于华侨华人,它与各国当地的工商网络及跨国公司的密切联系,使它发展成为一种开放性的蜘蛛网状的国际经贸网络。60—70年代起的现代再移民,特别是因政局不稳,反华排华而形成的以东南亚为中心向世界各地扩散的现代华侨华人再移民高潮,进一步促使华商经济网络扩大化,华侨华人企业的业务跟着父子兄弟或亲朋戚友散布世界各地,各地华商的网络也随着这些新移民或其他途径逐渐与世界每个角落的华商网络接上了联系。

随着华人经济的日趋国际化,为了充分利用华人历史形成的固有经济网络联系,更有效地推进华人企业和华人经济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各地华商要求建立世界华商经济网络联系的愿望日益强烈,两年一届的世界华商大会应运召开,目的是帮助建立世界华商“有作用的联系网络”。1991—1997年,世界各地华商连续召开四届世界华商大会。前三届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泰国曼谷召开,第四届会址已“冲出亚洲”,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充分显示全球华侨华人经济的蓬勃发展,海外华商网络正铺盖全世界。而且,以最新的通讯科技与电脑网络,将世界各地的华商资料纳入国际电脑

网络的“世界华商网络工程”，已于 1995 年为新加坡建立和正式推展，世界各国华商之间的联系因而更便利、快捷和有效，世界华商“有作用的联系网络”实际已经开通，世界华商网络的全球化更为迅速。

世界华商网络的日趋全球性，是近年华商网络引起人们的关注的重要原因，各国商界和政要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 1993 年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香港商会会长霍英东表示，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下，华商在促进各所在国家及地区的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将扮演重要的角色。^②在 1995 年 12 月第三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泰国当时的总理班汉·西拉巴差开幕致词时强调，全世界华商的经济力量是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发展的重要机制，华商在世界各地广泛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个商业群体很难与之相比的。遍布全球的华商是促进中国同泰国以及其他国家合作，实现经济方面共同目标的良好渠道。^③80 年代凭着《大趋势》一书而名噪一时的约翰·奈斯比特推出的新著《亚洲大趋势》，预示了八项来自亚洲将会改变世界的大趋势，其中第一项是从国家到网络，他认为，华人正透过充满活力而紧密的商业合作，取代正在亚洲及世界经济地位处于长期滑落趋势的日本。由于中国位于太平洋区的中心位置，因此中国和华侨现已成为亚洲各国决策的考虑因素。但将在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是华商的商业网络，而非中国。^④

三

作为海外华商的母国，我国利用世界华商网络的优势不言而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充分地利用世界华商网络？

其实，“华商网络”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名词，在此之前，不同层次的华商网络就一直存在，我国有关部门也不断地与之接触，并以“内需”为着眼点，让海外华侨华人利用其经济和智力上的优势，在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结果，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华侨华人回国捐资办学、创办公益事业，还是后来的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三引进）上均取得很大的成绩。

然而，“三引进”固然重要，但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华商网络的优势。世界华商网络的定位和优势在“海外”、“世界”，在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经营网络关系。因此，要充分利用世界华商网络，除了为“内需”服务的“三引进”外，还应考虑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跟随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适时从“内”转“外”，作“海外”文章，扩大“外需”，提高利用世界华商网络的市场意识，拓展我国的海外商品市场和海外投资市场。

其实，许多国家之所以重视华商网络，就是看重它拓展海外市场，包括拓展中国市场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利用华侨华人关系吸引外资、人才。在 1993 年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发表专题演讲中特别指出，经济网络的联系有着相当大的潜能，为商业上的来往奠下基础。如果我们不利用华族网络扩大和掌握这些机会（经济机会），那将是很愚蠢的。他还表示，新加坡还可以利用当地印度人网络进入印度和南非，因此，新加坡决定改变移民政策，在新加坡建立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各种不同族群，利用他们世界性联系网络来扩大新加坡的范围，增加新加坡可以掌握的机会。^⑤

马来西亚政府在 90 年代初积极倡导马华两族经济合作，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马来西亚华商网络，协助马来人企业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马来人的经营市场，发展马来人经济。马来工商总会主席丹斯里旺阿兹米曾认为，要打破种族藩篱开创市场，马华两族除了在进军国内市场要相互合作外，在进军国际市场，如到海外投资时，华巫两族都需要携手合作和相互配合。^⑥1993 年 6 月随大马首相马哈蒂尔

访华的 300 多名代表中,有一半是华人和马来人工商企业家,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挥华商在中国的网络作用,协助马来人进入中国市场。马哈蒂尔访华时特别指出,我们应当利用和发挥我们的社会优势去中国做生意,例如我们掌握多种语文,像华语和华文及华人方言,就是我们的有利条件。⑦事实上,马来西亚已有不少借助华商网络进军海外的成功事例。曾随同大马首相访华的土著企业家丹里斯阿兹曼回国后曾说,华人懂华语使得他们在中国发展业务更方便,我料想大马华人去中国投资也会把土著伙伴带去,他们对土著去中国投资将很有用处。例如,我在中国有投资计划,我也会携带大马华人同去,这将在完全陌生的中国环境中使生活过得更容易。⑧马来西亚的一些土著工商人士还提出利用华侨华人在泰国、印支三国和澳洲的经营网络进入泰国等国的主张。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海外华侨华人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它们利用华侨华人对外联系网络发展对外经贸活动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新时期,我们也应当及时从“内”转“外”,利用世界华商网络,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华商网络,直接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各地建立中国商品经销点,利用世贸实施贸易自由化的便利,拓展我国的海外市场。其实,我们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目的是扩大生产、发展经济,而经济是否能上去,关键在于产品是否有市场,有市场,经济就发展,没市场,经济就萎缩。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科技产业化等,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以占有市场。

我们还应利用世界华商网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已经证明,对镶直接投资是绕过贸易壁垒进入海外市场的有效途径之一。面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和扩

大发展机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转向跨国经营,向外直接投资。但整体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远远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原因之一,主要是对外国缺乏了解,投资效益不甚理想。世界华商网络刚好可以提供有关帮助。如果有熟悉的华人工商界人士牵线搭桥,指点迷津,我国企业集团到国外投资,必然会更迅速地熟悉当地的经济架构、工商法律和经营习惯,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最少的海外投资项目,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由于缺乏经验或不熟悉情况而遭受的挫折,从而慢慢在当地站稳脚跟。

总而言之,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加入世贸,机会与挑战并存,对世界市场占有率的机会越来越多,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其间世界华商网络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我们不仅要利用世界华商网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我们还必须站高一点,放眼世界,利用世界华商网络到海外投资、到海外建立经销网,拓展海外市场;利用世界华商网络,探讨实现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机制、产业、市场接轨的可能性和途径,这才可能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更充分地利用世贸提供的机会,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步伐。

①John Kao “The Worldwide Wed of Chinese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93。

②③《世界华商经济年鉴》1996/1997年,第5、7页。

④香港《信报》1995年11月16日。

⑤香港《大公报》1993年11月22日。

⑥⑦⑧马来西亚《工商世界》月刊,1993年第8期,第6—11页。

责任编辑:谭湛明

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

□ 陈丽洁

(湛江师范学院讲师, 广东 湛江 524048)

[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 效率 系数——负所得税 三条保障线

[摘要] 本文从公平与效率角度, 比较分析德国、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践境况, 然后分析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提出“系数——负所得税”方案等设想。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8-0021-04

一、国际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社会保障由来已久, 从埃及、古罗马、古希腊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 社会保障是度过自然灾害和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只是极为有限的保障。欧洲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16世纪随着欧洲启蒙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深入, 保障的主要内容是扶贫救济。

1. “社会市场经济”与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国家充当主角的制度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创建于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为安抚和瓦解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 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疾病、残废、失业、老年保险体制, 成为官办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型。联邦德国(原西德)新自由主义者认为, “社会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 保证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的经济秩序, 是使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与个人自由完全协调的社会经济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目标, 是实现经济

人道主义, 使每个人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 人人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他们认为国家应利用财政税收政策, 调整由市场经济所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 实现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公平与效率的观点事实上成为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理论依据。联邦德国政府从50年代中期起积极推行“人民股票”措施, 实施各种福利政策, 以保证公平分配。1975年建立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补偿制度、社会补助制度、职业咨询与失业介绍制、社会救济制度等五大类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2. “福利经济学”与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体系上最终完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是本世纪40年代的英国。1942年英国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从儿童补助、养老金、残废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妇女福利七方面提出对全体公民实施社会保障的全面计划。贝弗里奇主张要向贫穷、愚昧、肮脏、疾病、失业等开战, 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1948

年7月5日由工党政府组织全面实施,建立“英国型”的几乎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现代福利国家,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点。现行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涉及面最广、条款最完整、操作最实用的。它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执法严厉,不留死角。二是全民保障,国家财政预算、个人缴费、雇主缴纳、国民保险基金投资收益4大块构成全民保障的资金来源。三是“劫富济贫与多缴多得”相结合。在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下,一个人缴纳的国民保险基金与其日后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不完全相等,体现互助互利,实现公平收入的原则。

3. “混合经济”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始建于1935年颁布健全的《社会保障法》。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条款具体、容易实施、涉及范围广、大众受益。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深入人心,个人和企业法律意识强,不仅主动缴纳社会保障税,而且积极创造条件交纳社会保障税。美国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对美国产生主要影响。他指出,美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包括两部分:国家管理公共部门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国家调节是为了预防和对付经济衰退,以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益。他认为政府的福利规划,也应提到在公民之间的各种收入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以对不同的集团和阶段征收不同数量的赋税的形式完成的。他提供的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措施有:累进税、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通过食品券、医疗补贴、低价住房等形式向低收入者提供消费补贴。

4.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瑞典,先是魏克塞尔在20世纪初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30年代,阿尔宾·汉森政府提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

福利计划;50年代以后,社会福利计划得到全面实施,其中包括建立失业保险、基本养老金制度、病休保险、儿童津贴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在教育、医疗、托儿、老年住宅等方面提供各种免税低费的社会服务。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受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伯克的影响。林德伯克认为国家调节在推进“收入分配均等化”、“经济稳定化”和“福利普遍化”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和必要的,但又指出庞大的福利设施对市场机制和经济效率的损害。他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即“社会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战后瑞典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于战后瑞典“混合经济”实践的成就,林德伯克归纳为四点,其中指出在收入分配均等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全民养老金制度、中小学义务教育制和多种形式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制度,从而使瑞典成了西方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

5. 小结与启示

西方福利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动方面。尽管各国实行社会保障的做法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说是包括了国民保险、工伤津贴、残疾人津贴、失业津贴、退休金、产妇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收入津贴、附加津贴、战争抚恤金。社会保障费用的来源一般有两个:一是国民保障费。这部分一般由工人和企业共同负担。二是政府财政拨款。这部分主要靠税收支持,而税收的主要部分是个人所得税。而高福利以高税收为前提。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社会经济发展及人们的经济生活、价值观念,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积极的影响主要有:(1)使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普遍有所改善,基本生活水平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林德伯克曾运用洛伦茨曲线来测定瑞典20岁以下男女人口纳税前后收入分配状况得出1951年、1960年、1969年收入均等化呈不断提

高趋势的结论。(2)缓解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在人道主义、社会公平等反映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方面有可观的进展。(3)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顾虑破产等风险的后顾之忧,刺激人们追求高效率,实现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增长。英国早期在伦敦首创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对于商人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鼓励和刺激,有力促进了大英帝国的远洋运输业和对外贸易。(4)缓和机制的副作用,社会成员都可获得“社会安全网”的保护,稳定社会,安抚人心,成为社会“减震器”。德国“铁血首相”直言不讳:一个期待着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

消极作用主要有:(1)增加了政府的负担,削弱了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2)社会保障实现的收入均等化,使社会形成一种观念——不干或少干工作照样可以生活。这种观念严重损害效率,失业者依赖政府和社会,坐享可观的救济金,甚至不急于就业。高收入者因税赋过重,特别是高额累进税制,挫伤人们为追求更高收入而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

纵观社会保障发展史,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还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社会保障的方式必须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实力相适应;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国家都必须通过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来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我国的社会保障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在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各种社会变迁,在社会生活领域尽力弥补由市场自发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不足之处,起到调节贫富、保证基本公平分配、稳定社会的作用。

1. 社会保障制度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追求所谓公平而忽视效率,其结果是平均主义盛行,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贫穷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识到“效率问题”对于生产力、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党的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再进一步指出“把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经成为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的关键是保障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它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国民收入的分配贯彻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也必须贯彻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体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

2. 建立“三条保障线”,体现公平。

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平,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市场竞争是无情的,总会产生失业者;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甚至一开始就无力参与市场的竞争;还有妇女容易遭受不公正待遇。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织成一张张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的安全网,确保社会成员在因为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生计断绝时,不至于陷入无助的陷阱。

按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惯例,个人所得税制度是织造最低标准安全网、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提出,超过一定收入水平的家庭交给政府所得税,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则从政府取得现金支付。负值和正值的税金,由国内税务局管理;这种不论其个人特征如

何,给一切穷人有保证的最低收入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称为“负值所得税”。用“负值所得税”制度使没有获得机会的人分享获得机会的人的一部分利润,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线(贫困线),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体现“公平优先”原则。

“三条保障线”即“实现再就业——领取失业保险金——领取居民最低生活费”,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条保障线:加强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引导职工转变择业观念,争取尽可能多的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后,要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第二条保障线:三年后还没有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也要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转到社会保险机构领取失业保险金。

第三条保障线:享受失业保险两年后仍未就业的,转到民政部门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

3. 以“系数——负所得税”方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为了体现真正的公平,促进效率提高,笔者提出“系数——负所得税”方案。其基本内容是:由政府界定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不按此标准发放,而是按一定的系数负所得税税率(由政府根据应发放保障金人员的类别而定),使有关社会成员,根据不同情形而得到一定的补助。其计算公式:

实际发放的保障金= (政府界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系数)+ (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

这种“系数——负所得税”方案,可以使失业者、真正特困人员得到保障,下岗后再就业者再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受到一定的牵制,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依赖政府补助过活,不积极求职就业的懒汉思想,从而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低效率阻碍经济增长,造成社会供给不足,缺乏实际公平的物质基础。高效率才可以做大蛋糕,从而实现更高目标的公平。

4. “教育保障——人力资源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保证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确保市场拥有源源不断的产业后备军,才能为效率提供必备的人力资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失业者、低收入者、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及其子女综合素质不容乐观。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等手段,来保证全体成员的教育权,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据一些资料反映出这样的困境,一些贫困生不交学费上学,一些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也跟着不交学费上学。为了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学校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学校经费不足,必将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对这部分的社会成员的教育问题不予重视的话,就会导致这部分社会成员素质的下降,最终将制约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也不应该把80%以上的社会成员的教育排除在外,否则不仅不公平,而且最终将影响整个民族的素质,阻碍经济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1. 唐钧《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曾昭宁《公平与效率: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抉择》,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
3. 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4. 李洪军、王仕军《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济·社会》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谭湛明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 钟少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0)

[关键词] 国学 近代学术 中西文化

[摘要]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 40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 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 指出所谓“国学”, 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 应运而生的怪物, 如钱穆言:“前既无承, 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 “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 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8-0025-014

一、前言

自 1993 年开始, 北京大学连续出版大部头的《国学研究》刊, 袁行霈教授在发刊辞上宣布:“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的部分, 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 直接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①笔者不幸没有赶上 30 年代的国学教育, 因而对如此美好的“国学”概念产生兴趣, 陆续找来前辈研究国学的论著拜读。几年过去, 兴趣依旧, 但很没有美好的感觉, 反倒是感觉如又掉进旧染缸, 这个太大的旧染缸搞得现代所谓国学大师们五颜六色, 看自己和看别人都是朦胧的, 远不如近代中国学者那么冷静清晰。故而笔者不揣简陋无知, 斗胆写出此文, 将自己学习中国近代学者对于“国学”的研究情况, 如实讲来, 还求方家斧正。

近代中国学人对于“国学”研究, 有传统优势和劣势, 也有偏爱, 更有偏恨, 故而所产生的论文, 实在太多了。据当年统计, 自清季到 1935 年, 就有七千余篇, 涉及五百余报章杂志。^②其中作者之多, 可谓涵盖近代中国学人中的

主力队员和非主力队员。更令人难办的是, 当年的“国学”研究, 已经并非纯然是学术性的, 是包括各种政治人事的纠纷。笔者只能尽力从纯学术角度来展开介绍。笔者所主要依据的是近代研究“国学”的 40 多部专著, 多数集中在 30 年代出版。

从史学角度看, “国学”概念在近代中国是含糊不清的, 差异极大。夸“国学”的人固然多如牛毛, 但咒骂“国学”的人更令人过目不忘, 例如当年的左派陈独秀就骂研究国学者, 是“牛粪里寻香水”; 而当年右派的吴稚晖也有妙论:“这国故的臭东西, 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 小老婆吸鸦片, 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 政治无不腐败。”^③这种判断, 即使再有道理, 也是同学术研究相距太远了。但是史实是自清末开始, 尤其在 30 年代, 中国人的“国学”概念是太普及了, 不但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一流高校有国学课, 有国学研究机构, 有一批人才参与; 就连大量中学里, 也有国学课程。像钱穆、马瀛、黄毅民等先生写出的国学专著, 都是在



学任职时的教材。于是在客观上,中国一两代年青学子大都经过“国学”教育,这几百万学子从中学习的得与失,至今恐怕还少总结。而这进程可是对中国人的知识进步,曾起到相当关键性的作用,也就使得“国学”概念沿用至今。当然,当年的大中学里的主流教育并非“国学”,而是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才是决定 20 世纪中国进步的第一主力,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的。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有种令人担心的缺陷,就是对于许多新造词句概念含混矛盾,对于许多旧词新义亦是含混矛盾,而至今还没有一本工具书来,还中国年轻人一个明白。笔者不才,并非有意向当代国学大师们讨个明白,而是自己学习多年,为这些含混的词句吃尽苦头,不得已自己一个一个去整理。人生苦短,能够整理出几个概念来,也就自我满足了。其中“国学”这个概念,在中国流传百年,笔者尚不见何人说个明白,也许早该完成其历史任务,或者赋予新意,但是依然稀里糊涂嬗变至今,笔者真希望不要等到 21 世纪时候,还如此不求甚解。故而从五方面略述如下:

中国“国学”产生之缘由与企图。

“国学”之定义问题。

“国学”之分类问题。

“国学”之研究方法问题。

“国学”之内涵。

至于中国人研究“国学”百年所造成的效果,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题目,这里就暂且从略。笔者可以在这里先作一个断言:如果中国人想在 21 世纪全球学术上有所表现,肯定不会是“国学”这个概念。

二、中国“国学”产生之缘由与企图

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学”这个概念。西方古代有没有相类的概念,笔者不得而知。但是在中国近邻的日本古代,早就有此概念,原是专指一种地方子弟学校。后来到 18 世纪初

叶,僧人契冲在著作《万叶代匠记》中,利用来重新解释古典文献和客观归纳法。继由荷田春满等人加以发展,形成自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到本居宣长作《古事记传》,可谓集国学之大成;后来平田笃胤等人又发展,加强了神道的、国粹的色彩,提到思想高度;到明治维新时期,国学作为倒幕运动的理论根据,为草莽志士广泛接受,成为当时实践活动的支柱。只是在“洋学”充分扎根于日本后,日本的国学同儒教、武士道一样逐渐衰微了。日本的“国学”概念针对的是“汉学”概念,而日本的“汉学”概念,恰是他们所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故而在 1902 年翻译出版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中,日本学术界是有所介绍的。在该书中写道:“为讲求神道国学而游学东京者,一时颇盛。然其势力比之于如日中天之欧化主义,固不足十分之一。是犹以只手障狂澜,杯水车薪,其不能见效也固宜。”^④而在更早的 1887 年,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发表《日本国志》中,已经提到日本“国学”。^⑤可惜当时中国人太忙,没有注意。更奇怪的是到 30 年代的中国“国学”鼓吹者们,依然茫然于“国学”概念的产生由来,多是以章太炎于 1902 年流亡日本时,挂起“国学讲习会”牌子,来作为“国学”在中国产生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学风,是很不负责任的,其实“国学”概念早于章先生就来到中国了,章先生不过使日本的“国学”概念改变成中国“国学”概念而矣。章先生所力图讲述的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⑥这也同日本的“国学”原则一致。

后来在中国的学者广泛利用“国学”概念,则是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见解和研究表现。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只能择要略述。

笔者所见较早的《国学讲义》,是江起鹏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在书的开始就讲为什么要研究国学,他写道:“定教育之方针,为今我国民一大问题。识者谓莫妙於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庶学於人而不至役於

人,不失为我国国民之教育。信是则研究国学,其亦学者所有事焉。”^⑦他的方针所根据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在日本“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为了“学於人而不至役於人”,为了定当年讨论的中国教育方针,故而要研究国学。在该书最后,则总结出讲述“国学”的目的:“(一)不徒事诵读,而实奉圣训。(二)不专事诂训,而通知大义。(三)广参世界之学说,以阐发微言。(四)实体先圣之志愿,以普救同胞。一言以蔽之曰,实尊我孔圣者。务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学说,而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毋拘牵,毋颛预,毋自封,毋自隘,则庶乎为圆满之国粹主义乎。”^⑧此话同章先生的话,都是发表于满族统治末期,对于当时的民族革命是有大影响的。江先生所讲的“圣训”,肯定不会是慈禧太后的。但是作为“国学”,想“普救同胞”,那也太离谱了。至于“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的尊孔目的,引来后来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已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了。

在清朝末年张之洞鼓吹“中学”来与“西学”内外有别之后,在严复执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取消“哲学”讲述“经学”之后,“国学”仿佛前仆后继地又来到中国书生间,其中以北大在1922年成立“国学研究所”为重镇之一,第二年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提出他的见解:“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

心。……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⑨由此看来,胡先生是清楚国学研究是存在黑暗与光明两种前途,故而提出他的研究条件,以力图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百年过去,我们的闭关态度以及唯我独尊的不虚心,似乎还荡漾在一些人头上。至于当时就有吴文祺评论该宣言道:“这篇宣言,既不说明整理国故的必要与价值,更不说明国故学的性质,而只定了许多整理国故的方法。不过这或许可以说各人的立足点不同,我们倒也不必过事‘吹求’。至于东大的国学丛刊的发刊词,完全是保存国粹者的口吻,尤其没有批评的价值了!”^⑩那么,吴先生自己希望的研究原因有五条:“(一)要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二)我们现在应该用新眼光来研究它,替它补苴罅漏,替它发挥光大,这是谋今后学术进步的必经阶段。(三)历史进化的观念。(四)先须明其学说思想的本来面目,否则赞成便是盲从,反对便是盲抗!(五)一般人对于国故,往往迷信前人附会的传说。”^⑪吴先生还有一个好笑的理由,他认为:“国故学的性质,很像数学。数学,一方面是训练思想的最好的方法,一方面又是各种科学的基础。国故学在一方面固然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的基本学问,在别一方面,研究国故学的人,也可以藉此养成我国人所最缺乏的重徵求是的科学精神。一般遗老遗少们,对于西洋的科学,既没有根柢,又不肯研究,国故学的根本精神,虽然和他们的笼统脑筋格格不入,但材料究竟是中国的,不致使他们望之却步。使国故学和他们携了手,便可以慢慢的改造他们的脑筋了。”^⑫如此立论,今天看来真有点妙不可言,但也并非是胡言乱语,总是当年的一种愿望吧。

严复在清末霸道的错误之一,就是将京师大学堂的“哲学”科改成“经学”科,并实行数年,严重影响中国学术的进步。这个“经学”概念更曾纠缠在中国多年,本文不谈了。但是在1904年就引来邓实先生先办“国学保存会”;再于1905年办《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到1908年再成立“神州国学社”,热闹一时。邓先生的观点很多,例如说:“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⑬他的结论是:“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欧化亦有精神之学,此就其大端言耳。)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⑭如此观点,恰与张之洞鼓吹的“中体西用”一脉相承,再加上爱国,真能卖弄一时。可惜这些观念到20年代就落后了,引来鲁迅的评论道:“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⑮

太炎先生于1922年在上海,公开讲演“国学”,再一次阐明他的学问,引来当时新闻界的介绍热潮。而他的高足曹聚仁弘扬其见解,专门鼓吹“国故学”。他写道:“先哲之治国故者,其态度为主观的、情感的、功利的;今后的治国故学者,其态度则趋向于客观的、理智的、批评的。先哲之治国故,犹饮酒者然,神昏志乱,尚噀噀然扬言于众曰,酒之味何似,酒之益何似!日诱人以饮酒焉。今后之治国故学者,则犹化学师之谈酒然,其原质为何,其过程如何,人饮之其影响于身体如何,皆为之剖析无余,使人自谋取舍焉。……中华民族思想衰老之过程,由国故学可得其年轮;中华民族精神上之病

态,由国故学可明其表里。故国故学非国糟,亦非国粹。一东亚病夫之诊断书,以备用药时之参证也。”^⑯曹先生的研究深刻独到也广泛,在当时影响颇大。

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自己作序来说明看法,他写道:“我们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的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智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翻过来说,中国的国故学,何尝不是学问?……国故学不能成功一种学问的名词;那国故里面,自有他的真学问在。倘然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里,把这虚无缥缈学术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消。这样一做,不但中国的学术上平添了无限的光荣,而且在全世界的学术上一定可以平添无上的助力。”^⑰许先生点明了这样的理想,即是当前的国故学不足成为学问,而希望将来的研究国故,能够与国际学术相接轨。

郑奠则提出修国学的宗旨,他写道:“以学术大同为言,则趋诣真理,唯是之从。我国国学与异邦相较,诚有谢短者。然所自得,岂少也哉?是故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发怀旧之蓄念,以增国人爱国之心,阐明国学之精英,以与世人相见而共趋于真理,必将有事乎此矣。”^⑱他再提出方针是:“一,务实求是,利用厚生,以为学鹄。二,解去一切拘牵,无复中外古今之见,唯理是从。三,以自修自悟自证自得为归。四,条理旧绪,使秩然有统。五,剪除杂说,标举大义。六,补苴罅漏,张皇幽渺。七,研精覃思,钩发沈伏。”^⑲这真是20年代书生的文章,读来相当费劲,解开来也没有什么奇特。

到30年代,时代背景上对“国学”的需求减退了,书斋里的“国学”研究倒显现出来多了,约有十多部专著吧。其中笔者最欣赏的为马瀛的《国学概论》,他在批评中国学人的“迷

信态度、鄙弃态度、暧昧态度、盲从态度”之后，专用一章谈研究国学的原由。开始先引胡适的观点：“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②0}马先生相当赞成，故而在纯学术的基础上，提出四个研究的原因：“一、表现民族精神；二、整理先民遗产；三、破除新旧界限；四、沟通东西文化。”^{②1}他的愿望是：“必须有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之眼光，祛除影响附会之客气，且深知近世科学方法、性质、价值，与学术之历史发达过程，将东西之学术，切实比较研究之，方足使两系文明融合，而在世界学术上，放灿烂之光明。此实为研究国学之最大任务，而一般青年，不容不仔肩者也。”^{②2}笔者不敢说，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研究“国学”的大师们，有几人已经达到他的愿望？恐怕是太少了。

以上几位前辈对“国学”所显示的企图明显不同，今人如果扣帽分派系是容易的，但是这就不是学术了。我们由此可以探讨近代中国人在思考什么？中国学界在做什么？在一个含糊的名词下面安排了中国人的伟大追求？或是治国平天下？或是急功近利？历史已经将之洗涤清楚了，至少，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态度，不再被一棍子打死，反倒是正确的选择了。至于“爱国”云云，其实是与“国学”本身拉不上关系的，因为既然有“国学”，就必然有“非国学”、“反国学”、“乡学”、“族学”等等相应概念，真会叫爱国者难以适从。任何人都都会说：要我爱国是正常的，但要我爱一门学科，就要看这学科是否值得我去爱。逻辑就是如此，

硬拉中国人去爱“国学”，再上纲上线，也是会被历史所否定。遗憾的是，这些前辈们不同的见解，包括批判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见解，很少有能够逃脱急功近利的意图，讲“国学”还是为了饭碗，那就难怪中国的纯学术研究冲不出国门了。再加上仗势欺人，拉帮结派，知识混乱，就更给“国学”旗帜下添加许多历史的垃圾。

再从这个名词角度看，许多中国学人争论的背后，是往往埋藏着各种不写出来的企图。当年柳诒徵就明示道：“余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从来误用一种不通之名词，吾人当为矫正，不可再行沿讹袭谬。然今之学者，往往有以此种名词高自期许，互相标榜，或者以此菲薄他人。如曰某人世讲汉学，则尊之为学者；或曰某人所讲是宋学，则有鄙夷不屑之意。缘此种名词，自满清以来，言者所含之意，久有轩轻之见存于其间。故沿用至今，不必问其所讲者若何。”^{②3}所以从传统的“名正言顺”的研究态度来注意，是很有必要的。

三、“国学”之定义问题

“国学”这个名词，20世纪初流传于中国，与它所相类的名词，应该是有“中学”、“经学”、“古学”、“旧学”、“国粹学”、“国故学”等等。虽各有所不同，但总可谓同一战线的朋友。而将之认作假想敌的名词，则有“西学”、“洋学”、“哲学”、“新学”、“世界学”等等。可怜当年的书生，是需要花费许多时光来记住并判断其名词的准确程度；外国学者更不知是怎样去学习和对应英文的。如果再问这个新名词的定义，就会发现各种说法，这里略举数例。如果再归纳一下，就会发现下定义者，都碰上一个两难的悖论：“国家”是有界的，而“学术”是无国界的。如何才能够让矛盾的双方合理地呆在“国学”这个筐子里？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只是留下他们辛苦的

痕迹。

邓实主编在《国粹学报》上给出的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②4}这是很糊涂的概念，有地有人就有国？有国就有学？根本证明不了！因为这几个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他再把学习国学来“自治”其国，就更荒唐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一国各个时期内所有之学术内，“国学”仅是占一部分。所以逆推理的“国学”就是一国所有之学，其逻辑是不能成立的；再有中国的自治历史中，“国学”也没有能够挽回几次亡国。应该说，邓实先生的定义在当时就不高明，但是还有号召力。

接着有郑奠给定义道：“学之诂义无过二说：一训觉悟；一训效法。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学问之功，效而后见。此一说也。学非能益，全天所生，自觉自悟，无待於外。此又一说也，两说相反，而其义相成也。……学术以天下为公，初无国界可守，此言取善之资则然耳。学不徒生，必有所因。……趋新博异之士，乃欲尽弃所固有，以为与世相违，理宜屏之。守旧者怒目奋臂，起而与之争。然察所执持，或拘拘文墨之间，以为道在於是。有以知其必败也。……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於心与物皆隶焉。即至方技艺术，有理可究，有法可守，有益於民者，亦得被此称。固非词章之士所能专也。”^{②5}郑先生强调学问的广泛性，无所不包，并且对于文墨之争很不以为然。但是，无所不包的定义，肯定是很难被利用的定义。

后来对“国学”概念认真琢磨，并竭力给出定义者，恐怕主要是曹聚仁，他先仔细写道：“中华民族所组织之国家，曰中国。故‘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接着就给“国故”定义为：“中华民族在过去三千年间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再给

“国故学”定义为：“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现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法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②6}然后还对定义中每一句话详加说明，再加上详论三点：“国故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之异点”、“国故与中国学术之异点”、“国故学之独立性”。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他的主张，莫误解他的主张。可惜，由于立论的先天不足，逻辑上的缺陷，虽被当时一些人接受，但被历史所淘汰。例如他判断的“国故”，就不包括非结晶思想，不包括非文字表达；何况“国故”如果全部归结为思想，哪里还有“国故物质”立足之地呢？曹先生自己也不等同“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就是他的“国故学”。

沈亦云恐怕是发展了曹先生的观点，他写道：“凡本国前贤往哲最高思想之结晶，讨论人生必要与人生有趣味之问题，发为有系统之学说，其影响于此国，有极长之时间性；其应用于此国，有极广之普遍性；其代表此国，有极大之显著性；谓之国学。”^{②7}此话今天的读者恐怕眼熟，连“最高思想”都用出来了。可惜无法选举产生，更无法考订“最高”与“最低”的分界线。

当时就有蔡尚思针对曹先生观点，另行下定义如下：“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此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终始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②8}

到40年代，曹朴就能够较冷静地介绍道：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通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各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⑩显然,曹朴已经认为,“国学”这个名词接近过时了,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仅是一种习惯罢了。

邵祖平更是说得简单,他写道:“国学一名,称号不旧。盖以西学随海通而来莅吾土,吾土文字所记述之学不得不名为国学也。然则国学者,国文学而已,表里精粗,津梁阃奥,……”^⑪好一个“不得不名”,就将什么都通融过去了。

笔者翻查近代中国的百余部辞书,发现仅有少数几部辞书有相关条目,录如下:

《辞源》中“国学”条目定义为:“一国所固有之学问也。”

《辞海》中“国学”条目定义为:“本国固有之学术也。亦称国故。”

《辞海》中“国故”条目定义为:“谓本国故有之掌故与学术也。对于外来科学而言,故又有国粹、中学、国学之称。”

《中华百科辞典》中“国学”条目定义为:“本国之学术思想也。指本国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项而言。章太炎分国学为经学、哲学、文学三部。”

《法律政治经济大辞典》中“国粹”条目定义为:“国家之精华,无论其为物质上精神上,足以表扬国有之文彩与特长者,为国粹。”^⑫

现代人都知道,辞书条目内容是比较平和稳重准确的。但是近代中国的辞书对于“国学”概念表现出来很不热情,查清末的辞书就根本没有这个条目,民国时期本应该收此条目的《哲学辞典》、《教育大辞典》等,也视而不见。这只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此概念的疑惑。再看此几条条目内容,显然也是简单编写,含糊不清。反过来说,也就是读者们没有什么急切需求,不想查个水落石出。

综观近代中国人所给出的“国学”定义,依然不能清晰地给读者一个科学的没有异议的定义。这不是中国人笨,而是画蛇添足所至。硬把国家同学术绑到一起,以希望作为抵抗外来传入的新人类知识的武器,这种徒劳的努力,历史已经将之废弃了。

四、“国学”之分类问题

一门学科想建立,就自然有个分类问题,从中可以看到此学科的一些基本状况,以及能力之高低。而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史中间,学术分类创立虽早,但自唐宋以来,四部分类法就成为历代公私目录的主要标准,严重地窒息着中国学术精神的发展。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恰是集“经、史、子、集”四部的大汇合。虽有人私立书目,打破四部框架,另外尝试立分类体系,但主流是四部的死架子。问题就出在当西方新知识来到中国后,当时西方的知识分类,是没有办法装进中国四部分类里面。而相反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则能够在西方传来的新分类体系中安全地安排。所以中国学术分类体系,在近代恰是协调接轨的转变过

程,从思想到图书目录,都有一个漫长混乱的转变过程。“国学”正好产生于这个时期,它既然是东西两大文明碰撞的中间产物,它的分类系统就有了五花八门的特色,说成稀奇古怪都不过分。而且让今天的年青人看的话,颇觉其分类之难以适从,如果拿近现代各种知识分类去套用,确实很难。

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国学”时,其内容为:“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③2}当时日本户水宽人博士著:《汉学》,其内容为:“殉死与作俑;中国人种即汉族;中国古代之开化;古今文尚书考。”^{③3}两相比较,所写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但是分类和思想区别很大。

曹聚仁的“国学”分类标题则焕然一新:

“甲、文学: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平民化文学、病态文学。

乙、史学:

丙、哲学:道家、儒家、墨家、法家、佛学、宋明理学、东原哲学。

丁、人生哲学:

戊、政治学:

己、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

庚、论理学。

辛、心理学。

壬、天文学。

癸、算学。

子、其他科学。

丑、宗教。

寅、美术。^{③4}

如此分类,曹先生的意图倒是明确了,但是读者可就苦了,把五四以后的时髦词揉在一起,包罗万有,简直是一锅烩的“国学”。

王易的分类是:“经学、小学、哲学、史学。”^{③5}

汪震、王正己的分类是:“经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文章的派别、文字学、清代学术史。”^{③6}

黄毅民的分类是:“语言文字学、文学史、经学、史学、哲学史、科学。”^{③7}

钟泰的分类是:“六书篇、声韵篇、章句篇、六艺篇、诸子篇、目录篇、汉宋异同篇、文章体制篇。”^{③8}

李笠的分类是:

甲、哲学部:群经哲学、诸子哲学、释氏哲学、哲学史。

乙、史学部:别史、通史、史志、史论。

丙、文学部:总集、专集、小说、文评。

丁、小学部:形义、声韵。

戊、类书辞典部。^{③9}

吴文祺的观念中的“纯粹的国故学”,是由“一、考订学;二、文字学;三、校勘学;四、训诂学”组成。^{④0}

马瀛的分类是:“(一)经学;(二)哲学(诸子学、理学、佛学);(三)史学;(四)文学;(五)其他学术(神秘学术、美艺术、应用学术、自然学术)。”^{④1}

曹朴的分类是:“语文、古物、书籍、经学、史地、诸子、佛学、理学、诗赋词典、散文和骈文、新被重视的文学、科学及艺术。”^{④2}

略观以上的分类,恐怕无需解释分析了,反正当时和今天的读者都是梳不清、理还乱。这些先生是连当时的图书目录学家的分类见解也很少理睬,各自自行其事,自以为指导人师,随意将古今中外的知识概念乱为组合,使得读者更难判断“国学”是何方神圣,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因为还是如何将“国”与“学”搅拌到一起的问题,因为“国”与“学”并没有化合成为新物质产品,而仅仅是他们主观指导说其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分子,这当然是枉费心机的主观分类。

再补充注意一下,他们的分类互相差别如此之大,既不同于传统的四分法、七分法;也不是近代西方传来的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内已经应用的十进法等,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只能说明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后面,并且还互相斗气较劲,在应该“国家一致”的地方各成一“家”。

五、“国学”之研究方法问题

传统中国学人,拥有一套博闻强记的做学问的功夫,一字不识就以为耻。在清代更是形成考据学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历。这在方法来讲,就像钻牛角尖一般,虽有点蜗角虚名,但是全面开放逻辑的研究,就一直是不知道。问题是近代西方所形成的活跃的多方位的研究方法拥进中国,西方人研究中国已经出现许多成果,让中国人看得十分吃惊,其中虽有幼稚处,但其方法思想是有优势的。有见于此,“国学”的鼓吹者们,对于“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再拘泥于传统思维方法,而是直接引进西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标题,来与旧方法概念相混合,其意图应该是“中体西用”的“西用”部分吧。只是要注意,近代中国已经有一批介绍“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那些著作里所介绍的新方法标题,虽然与“国学”中相类,但是内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成功的作用,五四运动时期鼓吹的“科学”是有着伟大影响的。不过,既然“国学”引进西方新研究方法的皮毛,也还是对于“国学”本身影响不小,恐怕也是当时“中西学术合作”最成功的一部分。今天读者去看“国学”类书,恐怕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就在于方法问题,因为其中归纳许多研究学术时的基本功和经验教训,这在古今中外是差不多的。本文篇幅所限,仅介绍三位先生的观点。尤其是今天想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年青人,不可轻视忽略。当然,在以“国学”为旗帜之外,依然有更多的研究学问的方法介绍,同样需要我们去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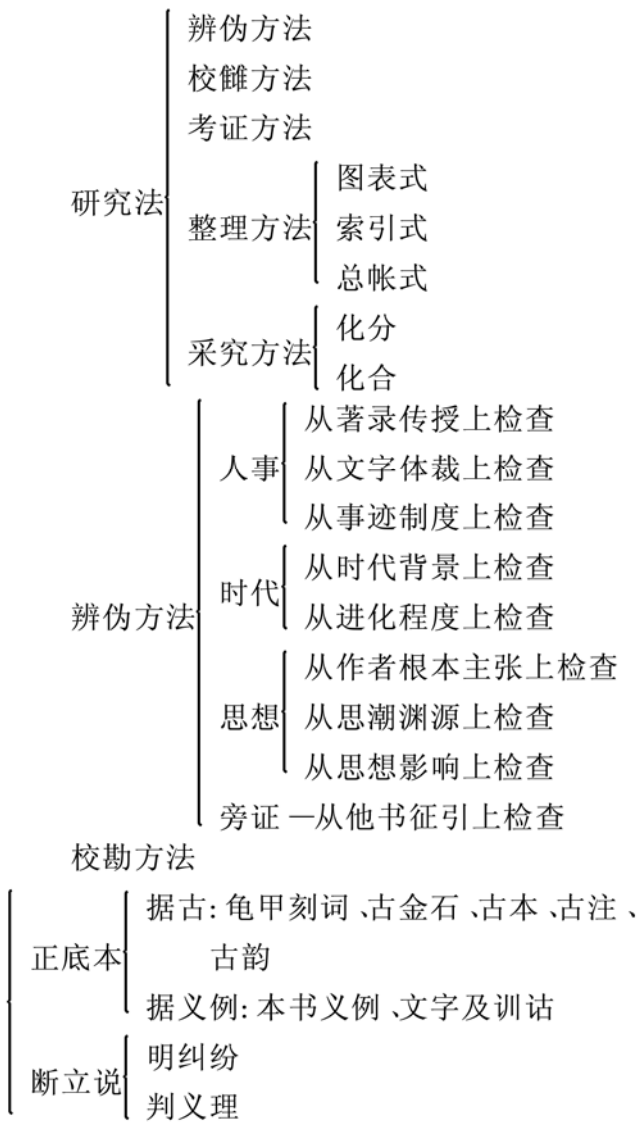
章太炎提出研究“国学”的方法有五种:

1. 辨书籍的真伪; 2. 通小学; 3. 明地理; 4. 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5. 辨文学应用。^{④3}

章先生的意思相当明白,但是作为方法讲则含糊。章先生是在 1922 年发表此演讲的,而早于他的王星拱、黄昌谷以及中国科学社同人等,介绍宣传近代方法的书籍文章已经广为流传了,并且明显比较章先生的系统清晰实

用,无怪乎当年听章先生演讲的人数日趋减少。笔者在此毫无贬低章先生历史功绩之意,章先生在“中国国学界”开拓之功不可没。

章氏的弟子曹聚仁力图进一步阐明他的国学方法,在其书中专门写四章,并有列表和许多证明案例:



至于考证方法论,曹先生更是从汉宋儒的考证,讲到清儒段玉裁、崔东璧、钱大昕等人的考证成就,以及胡适、梁启超的考证评论,再引用弥儿(Mill)的《名学》书中的逻辑观点,得出结论道:“以科学方法考证国故,则其成就必远胜于清代学者。近如胡适之治诸子学,顾颉刚之治史,所用皆为科学方法,皆国故学中之曙光也。”^{④4}而关于整理方法和采究方法,更是罗列许多具体案例。确实说明曹先生所下的大功夫,其缺点依然是对于近代研究方法了解不足。

笔者比较愿意研读的书是马瀛的《国学概论》，他在书中用 15 章来介绍研究方法：

观察：选择、浏览、圈点及钩识、精读、钞录。

会通：治经学应知家数、治哲学应知流派、治史学应辨真妄、治文学当知变迁。

怀疑：疑古、疑今。

辨伪：作伪之原因、辨伪之巨著、辨伪之方法、前人已考定著名伪书表。

明诬：寓言、支词、诬妄、传说、虚构、疏忽。

勘误：校勘之证据、错误之由来。

归纳：钱大昕考古音、王引之考古词、俞樾考词品、胡适考词格。

比较：思想疏密、理论长短、学说异同、传注得失、文辞优劣、事迹真伪。

分类：演绎的分类、归纳的分类。

整理：索引式、图表式、总帐式、专史式。

辑补：辑佚、补作。

统计：前人已作之统计、吾人可作之统计。

调查：方言、风俗。

发掘：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古书、新郑彝器、澠池石器。

评判：主观的评判、客观的评判。^⑤

马先生另外还用 10 章来讲述“研究工具”：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章句学、版本学、语法学、言语学、考据学、目录学、文法与工具之关系。从中可以领略到马先生不再纠缠中学西学的差别，他把近代各种研究方法和成就，能够用到“国学”上就用，心平气和地介绍分析，深入浅出地向青年人尽一位教师的职责。如果将此书放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献学书籍中，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再说得明白一点，其实就是使用西方传来的逻辑结构、语文表达方式、思想推理等，比较冷静地将中国传统学说内容重新排列，去掉一批含混不清的常识，凸显一批中国人愿意继承的知识。并且使传统的小范围的知识垄断局面，改变成向大范围的新一代学子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知识大普及，融合新旧知识方

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至于是否“国粹”？是否“国渣”？那是当时次要的问题了。

六、“国学”之内涵问题

既然中国国学的产生是由于政治需要，国学的定义互相矛盾，国学的分类含混不清，国学的研究方法跟不上形势需要，那么表现出来的国学内涵也就必然千奇百怪。这是要看每一位作者的意图与功力如何了。而今天想全部介绍当时国学内涵，恐怕笔者也是无力做到的，故而本文只能略举数例而已。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性知识，到近代学者手中，就都首先分科变成各种“学”，四书五经就变成“经学”，先秦诸子到宋明清儒家都是“哲学”，正史野史都属于“史学”，小说诗词全是“文学”，图书考证是“版本学”，中文字音义是“文字学”，等等。这是件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深究中西方对于“学术、学科”的定义、概念、内涵有什么区别的话。当年的国学研究者们，就是在“学”的名义下，利用西方知识概念，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内涵大清理，开始形成近代新的中国文献学研究。既然有“学”之名义，就自然需要给出新定义、新概念、新内涵等系列见解，这就有大发挥余地了。

其中对“国学”内涵深入研究分析有突出成就者，恐怕要首推钱穆，因为他的《国学概论》中，正文准确深刻，论断清晰，从古代讲到近代，系统明确，发人深思，为中国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典范；而他书中所自引注释，更是显现钱先生的过硬学力，字字有来历证据，不偏不差。现代人尤应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确实给我们许多必须学习的指导。

在《国学导读》一书中，作者为了说明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各自论证的差别，特别在书中罗列“古文大师章先生与今文大师廖继平先生两家互纠自明之语三十二则，对照观之，庶知其强弱形势所在焉！每则对照之语，皆自章廖书中刺出，有自白，有互纠，皆紧紧针对者。”^⑥

这恰是传统做学问的考据对比,将繁琐的纠缠和盘端出。

而《国学表解》一书,则是利用图表式,将各种概念提纲挈领地介绍,自然是对于学生记忆有帮助。例如:

经的意义

- 1、尊称——汉儒训经为常,以为经中所叙述,都是万古不可变易的道理,倘不出于圣人,自不可称经。
- 2、共称——章太炎则谓经皆写诸竹简,用丝连缀,好像用经纬以成布。是经为共称,不必一定出诸圣人。
- 3、定论——清章学诚则谓经在古时,并非尊称,到了后儒,因尊崇圣人,不敢触发,始以经为尊。其说可为定论。^{④7}

而那些努力将“学”硬按进“国”之中的书生们,对于其内涵倒还是下功夫,所以多数人整理的经学内涵和经学史、史学内涵和史学史、文学内涵和文学史、文字学内涵和文字学史等,基本是可以用到今天的。只有那些他们硬拉进来而又不熟悉的中国科学史、中国医学史等,才容易漏洞百出。更是要注意,他们的努力在当时就并非处于中国学术前沿和非主流。近代中国学术主流的代表,笔者倾向以当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名单为依据。^{④8}其中当然有可讨论的人选,以及当时已经逝世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但没有一人是因“国学”鼓吹而入选的。其中有些人获得“国学大师”帽子,是现代爱好国学者50年后硬扣给他们的。那些院士的研究成就,至今偏偏很可惜缺乏介绍,而仅从“国学”一隅说起,这也太显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知识贫乏了。

七、小结

启功先生曾对笔者言道:“这些所谓‘国学’书籍,其实就是当年的一批教科书。当年用过了,也就结束了。今天拿来再用,是很不明智的。除非当做历史史料来研究,作为近代

教育史中一部分而已。”笔者相当同意此言,并且正是拿来当史料用之。

钱穆《国学概论》在开头就声明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④9}钱先生说得准确明白,如果后来的国学爱好者们,愿意按照前人逆耳真言办,就根本用不着到90年代还装模作样来鼓吹什么“新国学”了。

笔者为21世纪的年轻人而撰写此文,也是因为自己曾吃过学术走回头路之苦。确有发展进取的道路,也有倒退的道路,而绝没有原地打转的学术道路。把“新”“国”“学”三个互相矛盾的概念,硬是以金钱来搅到一锅,那是更可怜的下策。历史恰可为证。

当年的教训应该总结,何为成功?何为失误?当年历史过程应该展示,何为学术正途?何为斜门歪道?现代读者读后,肯定会有自己作出清晰的判断,而无需教师爷来代劳。连当年鼓吹最热烈的曹聚仁也在其书前声明:“‘国故’是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虽然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对象,可是它决不会变成‘万应灵膏’,千万莫用它来普渡众生!”^{⑤0}难道今天反倒会让僵石来普渡众生?

其实在40年代,许地山先生就仔细地分析过“国粹与国学”,给出了足够冷静的判断,可谓给鼓吹者一剂凉药。这里仅能录几段许先生的话:“一、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国粹。……二、一个民族在久远时代所留下底遗风流俗不必是国粹。……三、一个民族所认为美丽的事物不必是国粹。……精神文化不是简单地复现祖先所曾做,曾以为天经地义底事,必得有个理性来维系它,曲评它,才可以。民族所遗留下来底好精神,若离开理智的指导,结果必流入虚伪和夸张。……评定一个地方文化高低不在看那里底社会能够保存多少样国粹,只要看他们保留了多少外国的与本国的国渣便可以知道。……‘不需无学,不学无术’,我想这八个字应为为学者底金言;但要注

意后四个字底新解是不学问就没有技术,不是骂人底话。……今日中国学术界底弊在人人以为他可以治国学,为学底方法与目的还没弄清,便想写‘不朽之作’。……学术除掉民族特有的经史之外是没有国界底。民族文化与思想渊源,固然要由本国底经史中寻觅,但我们不能保证新学术绝对可以从其中产生出来。新学术要求学术上的问题底有无,与人间底需要底缓急而产生,决不是无端天外飞来底。一个民族底文化底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底久远与经典底充斥。”^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原则和特色,现代中国的文献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等,已经多与世界学术潮流接轨,虽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空白区,但总是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起到良好作用。如果还有几位爱好者醉迷于“国学”,那也没有什么大碍,有人爱出钱供养,那就自我陶醉吧。只是希望不要以为他们在领导世界新潮流。至于像袁行霈主编那样,发表谈话说:“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研究国学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因此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国学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这样,就是有别于旧国学的‘新国学’了。”^②笔者是无法相信,旧国学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力量,将来更不可能靠新国学为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作学问依靠的是自己对真理的探求,无分旧新,更不是自己规定贡献的。●

①见《国学研究》一卷,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发刊辞第1页。

②据《国学论文索引》1~4编统计,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编,北平中华图书协会,1929~1936年,内分17类。

③吴稚晖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吴稚晖学术论集》,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11

月一版,1926年1月二版,第124页。

④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东京博文馆原编,罗孝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3月,参见第一编“学术思想史”,第4页。

⑤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版,卷三三“学术志”。

⑥见“国学讲习会序”,原载《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9页。

⑦江起鹏著:《国学讲义》,上海新学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月一版,1906年5月二版,第1页。

⑧同⑦,第102页。

⑨胡适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原载《国学季刊》一卷1号,1929年1月,后收入《胡适文存》,转引自《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697~711页。

⑩吴文祺文:“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许啸天编,群学社,1927年1月一版,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引本,第34~35页。

⑪同⑩,第35~40页。

⑫同⑩,第49~50页。

⑬邓实文:“国学讲习记”,原载《国粹学报》19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转引自同⑥,第7页。

⑭邓实文:“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原载《国粹学报》,光绪三十一年,转引自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五辑,1990年12月一版,第1097~1098页。

⑮鲁迅文:“不懂的音译”,原载《热风》,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一版,第466页。

⑯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23~26页。(未见下卷)

⑮同⑩,第34—35页。

⑯郑奠文:“国学研究方法总论”,原载《唯是杂志》,引自《国学研究》,洪北平编,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1月一版,第5页。

⑰同⑯,第13页。

⑱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月一版,第24—25页。

⑲同⑳,第25—29页。

㉑同⑳,第28—29页。

㉒柳诒徵讲演:“汉学与宋学”,见《国学研究会讲演录》一集,东南大学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一版,第84页。

㉓同㉒,第7页。

㉔同㉒,第1—3页。

㉕同㉒,第7、4、7页。

㉖沈亦云著:《国学入门》,南屏女中印,无出版项,第4页。

㉗蔡尚思著:《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10月一版,1932年8月二版,第5页。

㉘曹朴著:《国学常识》,桂林国文杂志社,1943年10月一版,第1—2页。

㉙邵祖平著:《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一版。

㉚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10月一版,1935年5月25版,丑第128页。见《辞海》,中华书局,1948年10月再版,丑第66页。见《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年3月一版,第697页。见《法律政治经济大辞典》,长城书局,1932年12月一版,第474页。

㉛同⑥,第9页。

㉜户水宽人著:《汉学》,新中国民译,东京秀英社,明治36年(1903)12月一版。

㉝同⑯,第六章“国故学之分类”,第5—7页。

㉞王易著:《国学概论》,神州国光社,1932年4月一版,1936年3月五版,第5—7页。

㉟汪震、王正己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

书店,1933年10月一版,1937年7月三版,目录第1—9页。

㊱黄毅民著:《国学丛论》,北平燕友学社,1936年4月一版,上目录第1—4页;下目录第1—4页。

㊲钟泰著:《国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6月一版,目录第1—2页。

㊳李笠文:“国学用书择要”,转引自马瀛《国学概论》,同⑳,第17页。

㊴同⑩,第42页。

㊵同⑳,第19页。

㊶同㉑,目录1—13。

㊷同⑥,第7—15页。

㊸同⑯,第二章至第五章。

㊹同⑳,第34—191页。

㊺同㉑,第144页。

㊻谢韦丰著:《国学表解》,上海学生书局,1947年4月一版,第1页。

㊼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名单如下:

哲学: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
中国文史: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
历史: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语言:李元桂、赵元任;

考古: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美术史:梁思成;

法律:王世杰、王宠惠;

政治:周鲠生、钱端升、肖公权;

经济:马寅初;

社会:陈达、陶孟和;

㊽钱穆著:《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北京重印本,弁言第1页。

㊾同⑯,卷头语。

㊿许地山著:《国粹与国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8月重庆一版,1947年6月上海一版,第152—164页。

①见《国学研究》三卷,同①,1995年12月一版,为袁主编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第657

页。

研究用书目

- 《国学讲义》 江起鹏 新学会
《国学概论》 王 易 神州
《国学概论》 章太炎讲 泰东
《国学概论》 钱 穆 商务
《国学概论》 陈延杰 商务
《国学概论》 马 瀛 大华
《国学概论》 王敏时 新亚
《国学概论》 钟 泰 中华
《国学概论》 林之棠 华盛
《国学概论讲话》 谭正璧 光明
《国学概论新编》 谭正璧 北新
《国学概要》 陈庸生
《国学概要》 李 维 北平
《国学大纲》 汪震、王正己 人文
《国学大纲》 孙德谦
《国学大纲》 徐澄宇 华通
《国学入门》 蒋梅笙 正中
《国学入门讲稿》 沈亦云 南屏女中
《国学研究法》 洪北平 民智
《国学研究》 顾荃臣 世界
《国学纂要》 徐畏潜 南京
《国学论丛》 黄毅民 燕友
《国学纲要》 薛无竞 (油印)
- 《国故学大纲》 曹聚仁 梁溪
《国故新探》 唐钺 商务
《国故论丛》 屠孝实等 学艺社
《国故谈苑》 程树德
《国学举隅》 方冲之
《国学导读》 邵祖平 商务
《国学论衡》 国学会 苏州
《国学表解》 谢韦丰 学生
《国学教学法》 陈 柱
《国学常识》 陈鹤声
《国学常识》 曹 朴 文光
《国学常识问答》 张振镛 商务
《国学常识问答续编》 张振镛 商务
《国学问答》 黄薇兰 汉文
《国学要题简答》 方明述 元新
《国学功用及读法》 李 时 君中
《国学研究会演讲录》 东南大学
《国学论文索引》 北平图书馆
《中国学术大纲》 蔡尚思 启智
〈国粹学报〉
〈国学研究〉
《国故学讨论集》 许啸天 群学社
《中国学术讨论集》 群众图书
《国学纲要》 刘明水 商务

责任编辑: 童 轩

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

——陈荣捷的学思与功业

□ 周炽成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关键词] 陈荣捷 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摘要] 本文扼要简介旅美学者陈荣捷在美的教研经历, 然后着重论述他的杰出贡献: 把中国哲学系统地推介到西方。文章还论及陈先生的分疏中哲、西哲, 兼采汉学、宋学, 兼容儒家、道家等治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8-0039-05

珠江三角洲是一块文化宝地。众多的文化伟人产生在这块宝地上。尤其是在近代中国,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物, 早已为国人所熟悉。但是, 陈荣捷的名字, 恐怕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陈荣捷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他终生工作于大学里。这种身份, 加上他自中年后长期在美国居住的生活经历, 使他不为国人所知晓。

陈先生于 1901 年出生在开平县。童年时代在乡下读私塾, 少年时代在香港接受了两年(1914 年—1916 年)的教育, 青年时代进岭南学院(后易名岭南大学), 其后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攻读哲学, 取得博士学位(1929 年)。接着回岭大执教, 在 30 年代为该校名教授之一。1935 年作为访问教授, 往夏威夷大学接受一学期的短暂教职。1937 年再往夏威夷大学, 接受长期教职, 直至 1942 年止。珍珠港事件后, 夏威夷大学停办, 由于回国的航道已因战争而不通, 遂往美

国德特茅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书, 直至 60 年代在该校退休。退休后, 陈先生仍然在美国不同的大学教书讲学, 直到 1994 年 8 月 12 日逝世。^①

陈先生的最大贡献, 简单地说, 就是把中国哲学全面地、系统地、卓有成效地推介给西方。当然, 把中国哲学推介给西方这一工作, 不能说是从陈荣捷才开始的。明朝末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已开始翻译一些儒家经典。到了上世纪后半期, 著名的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则完成了对基本儒家经典的英译, 有些译本至今仍然被看作具有权威性。传教士们的开创性工作, 自然功不可没。但是, 他们只是宗教人士, 而不是哲学家。他们难免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 对儒家哲学作出宗教性的解释, 对儒家哲学的真义与真值, 未得准确的认知。在本世纪 30—40 年代, “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向西方世界介绍儒家、道家, 风靡一时。林具有较深的国学功底,

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当然比传教士们优胜。但是,他也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他在用英文翻译、谈论儒、道时,文字功夫很好,可读性高,故当时在西方拥有大量的读者。但是,其哲理深度的不足,在所难免。

可以说,在陈荣捷之前,向西方推介中国哲学的工作是不系统、不全面的。其系统的、全面的工作,是陈先生之功。这一工作,集中体现于他的巨著“*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他用中文称之为“中国哲学史料书”)。这本书,竟先生20多年之功而成。该书起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于1963年出版。其后一版再版。30多年来,它被英语世界公认为最权威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著之一。笔者在加拿大阿伯塔大学留学时,导师Richard Bosley,即把它作为“中国哲学”这门课的教材。在北美,它已成为标准的中国哲学教材。更重要的是,在最近20—30年各类研究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英文专著、论文中,它被广泛地引用,没有哪一本关于中国哲学的英文专著,在英语世界具有它那样高的被引用率。

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受到如此重视,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该著的取材范围广而精。它涵盖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哲学,从西周到现代。而且,它选的都是中国哲学经典中的精品(由于中国哲学与大量非哲学的东西渗在一起,要做到这点实在不容易)。其次,陈著译文之准确、畅达,超过众多前贤。最后,最重要的是,该著含大量的按语,这些按语或迹思想流变、或释疑难,或中西比较,既灵活多样而又严思慎理。特别是在迹思想流变方面,功夫尤深。严复在释译西方哲学(特别是政治和社会哲学)经典时,也加大量的按语。这些按语为中国人理

解西方哲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陈荣捷的按语,则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更有进者,正如严复的按语是研究他本人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一样,陈先生的按语也是研究其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

除了“史料书”陈先生又英译了禅宗的《坛经》、王阳明的《传习录》、朱熹和吕祖合编的《近思录》……;用英文撰写关于朱熹二书:“*Chu Hsi: Life and Thought*”(《朱熹的生活和思想》)、“*Chu Hsi: New Studies*”(《朱熹:新的研究》);在《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杂志以及他人所编的书中,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的学术论文几十篇,发表大量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宗教的书评;为各类英文百科全书撰写关于中国哲学的条目。

最后一个方面,在50—60年代几乎为陈先生所“垄断”。这种“垄断”地位,意味着西方学界对开平子在中国哲学领域的学术贡献的公认。这些百科全书包括:Collier's American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Funk and Wagnall's Encyclopedi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其中,他撰写了“中国哲学”、“儒学”、“道学”、“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等条目。严格来说,在最后一本《哲学百科全书》中,陈先生并未“垄断”所有关于中国哲学的条目,但是,他在这方面写得最多,且为这领域的主持人。

陈先生晚年集中精力研究、推介朱熹。这方面的成果,即前述关于朱子的二书。《朱熹的生活和思想》是香港新亚书院“钱穆讲座”的讲词。讲词把朱子放在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范围内来考察,着重宏观把握朱子的哲学,而其《朱熹:

新的研究》,则着重对朱学的微观分析;二者相得益彰。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不承认朱子的正统地位,以之为“歧出”,“别宗”,而以王阳明为正宗。陈先生明确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复提醒人们注意朱子思想统治传统中国数百年这一历史事实。与 20 世纪中国内地学界的主流观点——批判朱熹,把他作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不同,陈荣捷对朱子作实事求是的探究。确实,他希望继承朱子,而不是把它抛掉。他继承的朱子,既是中国文化中的朱子,更是世界文化中的朱子。另外,开平子看重朱熹,并不意味着他看轻王阳明。他同样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王阳明。传统的门户之见,很难在陈先生身上出现。

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指向行动的哲学,一种培养人格的哲学。因此,为(哲)学与为人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典型的体现。他不仅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学问传给西方,还通过他自己的为人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人生模式传给西方。他的为人,深深地感染着与他接触的西方人。弟子 Irene Bloom 在回忆他的文章②中称之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活典范”,屡赞他的自然意识、四海为家的情怀、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禀性、待人亲密无间的胸襟等等。1979 年他在出国 30 年后首次回来。他带着孩子回到广州康乐园(岭南大学旧址,现中山大学校园)看他们的出生地。岭大校友热情地款待他。他还受到政府的礼遇。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故里开平的家里进行了庄严的祭祖礼。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自传里,他说,这次回来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③自此以后,他频频回国。他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在中华大地上重新得到公平的对待而感到欣

慰。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回国讲学,通信,与去美的国内访问学者交谈等)去努力推动国内的中国哲学研究。

综观陈先生的学问,有几点是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第一,分疏中哲、西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巨大的差异,承认这种差异,是确定中国哲学独有地位的前提。如果中国哲学完全跟西方一样,向西方推介中国哲学便没有意义。在分疏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陈先生的努力是卓然有效的。近代以来,常有人以中国精神文明上不弱(只在物质文明上落后)而西方精神文明上不强(只在物质文明上先进)这种自慰来平衡此巨大反差。陈荣捷不以为然,他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罕作价值判断(中国哲学或它的某个方面好,西方哲学或它的某个方面不好,或者倒过来)。在他看来,别中西关键在于搞清事实,而不在于强作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最好由读者来作,而不好由研究者来作。在研究者平实、客观地道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后,读者心里自然有数:中国哲学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由读者所作的价值判断才是真正强有力的。

别中西,其目的不在隔中西,而在通中西。而通中西的做法通常有两种:以中通西和以西通中。以中通西即以中国故有的理念框架去解释和会通西学。19 世纪末较早接触西学的中国人常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初用起来较方便,但后来却发现用它难见西学之真谛,而易曲解西学。以西通中,则反过来,即以西方的理念框架来解释,会通中国原有的学问。本世纪初、中期,少时在国内读国学,后出国留学学西学,最后又回国做学问的国人,多用此种方法。冯友兰、胡适等都是用此法的典范。“西方的学理



——中国的材料”这种治学法似乎已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范式。详细评价这种方法的功过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我想指出的是,陈先生有时也尝试用这种方法,但总的来说,却不太钟情于它。为了翻译中国哲学经典,他经常不得不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不过,他用得很谨慎,很有分寸。

陈先生如何实现中西贯通呢?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主要是通过以中通中来实现中西贯通的。他的以中通中,就是一方面抓住尽量少的中国哲学的概念,然后用它们来将整个中国哲学统起来,另一方面将后来的中国哲学尽可能溯源至最早的中国哲学。这两方面的目的都是化繁为简,易于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用简单的理念解释繁杂的历史,也同样有化繁为简之功。不过,冯的理念常取之西方哲学,而陈的概念则多源自中国哲学本身)。对于那些能将整个中国哲学统起来的概念,如果在英文中找不到恰当的词来翻译,他宁可用音译,如用“Jen”译“仁”,用“Li”译“理”等等。另外,他在为《哲学百科全书》写“中国哲学”条目时,用“New - Taoism”(新道家)来翻译“魏晋玄学”,此处可见其溯源工夫之到家。

为什么以中通中能达到中西贯通?这是一个在学理上不易说明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承认,西方读者对中国学问的接受,是中西贯通的一种表现或往中西贯通靠近的话,那么,陈荣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料书》在西方的被广泛引用以及中国哲学在西方越来越受到重视,表明他在引向中西贯通方面是成功的。

陈先生生活于西方世界 40—50 年而没有被西化,而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不少学人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西化了。陈

先生用英文写的作品,比很多大陆学者用中文写的作品,更具有中国品味。这种吊诡,值得关心中国文化的人士深思。

第二,兼采汉学、宋学方法。这本来是两种解释儒家经典的不同方法,分别产生汉代和宋代。后来引申为一般的治学方法。汉学方法注重文物训诂,寻究经典原文的本义。宋学方法则着重对经典的创造性解释,用解释者的立场去重构原典的意义。这两种方法之争,由来已久,在现代仍有继续之势。^④此一争论本来是有意义的,但如过分固执,则易流于门户之见。与此不同,陈先生兼用汉学、宋学这两种治学方法,避各自之短,而扬各自之长。作为哲学家,他本应更注重宋学方法。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偏重汉学方法。这恐怕是他治学的基点——平实、客观地把中国哲学介绍给西方使然。当然,他并不排斥宋学方法。例如,他并未像很多人那样批评用宋学方法的理学家曲解先秦儒家,反而欣赏他们的创造性。

第三,兼容儒家、道家。儒道之争,跟汉、宋之争一样,是中国文化中难解的结。陈先生超越了传统的汉宋之争,他同样也超越了传统的儒道之争。从为人方面看,他更多地像一个儒者。但是,他也吸收道家的自然、自得、自由。从其为学方面看,更是难分儒、道。他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庄子哲学的,他还为在《中国哲学史料书》中全译《老子》而颇感满意。虽然如此,他并不像传统道家那样攻击儒家,尤其是攻击儒家的仁义道德。相反,他真诚地践履着这些仁义道德。并且,从量上看,陈荣捷关于儒家的论著远远要比其关于道家的多。他晚年对朱子的厚爱,更是反映了他的儒者情怀。因此,虽然他如实地把历史上的儒、道之争介绍给西方,但他本



人却不心存儒、道门户。

附录: 陈荣捷主要著作目录

英文部分:

1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2 .An Outline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5.

3 .The Platform Scripture: The Basic Classic of Zen Buddhism (by Hui-neng), tr. with notes and Chinese text.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tr. with no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5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Comp. and t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6 .The Way of Lao Tzu, tr.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1963.

7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w-Confucian Anthology, by Chu Hsi and Lü Tsu-chien, tr. with no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8 .Neo-Confucianism, Etc Essays by Wing-tsit Chan, ed. by Charles K. H. Hanover, N. H.

Oriental Society, 1969.

9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 .Chu Hsi: New Stud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中文部分

1 .《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

2 .《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

3 .《王阳明与禅》,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

4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

5 .《朱子新探》,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

①关于陈荣捷生平的资料,可参看陈澄之辑《广东开平陈荣捷先生年谱》,载《王阳明与禅》(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另见“Wing-Tsit Chen 陈荣捷, 1901—1994: Excerpts from an Oral Autobiography”,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2(1995), No. 2, P305—344。

②Irene Bloom, “Wing-Tsit Chan, 1901—1994: In Memoria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January 8, 1995”,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5 (1995), No. 4, P467—470。

③见注①英文 P338。

④陈少明的《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论之甚详。

责任编辑: 冯 生

从《剑桥哲学词典》看当代中国哲学

□ 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东 深圳 518000)

[关键词] 剑桥哲学词典 中国哲学

[摘要] 新版《剑桥哲学词典》对中国哲学的重视,前所未有。中国哲学的身影开始全面进入西方学术界的视野,预示着世界哲学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日渐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8-0044-03

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推出一部全新的《剑桥哲学词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甫一面市,便获如潮好评。当代哲学大师普特南(H·Putnam)称赞它是“我所见到的哲学辞书当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后现代哲学的领衔人物罗蒂(R·Rorty)认为它不只具有参考书的价值,“其宽广的视域对各种可能都是一种叩问,对非西方哲学的超常注视,尤为可嘉”。

这部厚达近900页、由奥迪(R·Audi)教授任总主编的大型辞书,集中了381位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撰稿人,均为相关辞条领域的知名专家,其中不乏活跃在当今哲坛的一流学者。如柏拉图辞条的撰稿者是国际知名的柏拉图研究权威、来自伊利诺斯大学的克诺特(R·Kraut)教授,维特根斯坦辞条的撰稿者是目前最负盛名的维学专家、来自伯克利的斯拉格(H·Sluga)教授,等

等。所收录的4000余个辞条,均经广泛征求意见,严格筛选,反复斟酌,之后始一一敲定。其选收之精、新、全,远远超过了以往所出的哲学辞典。就其详细程度而言,一般词条都有500—1000个单词,个别重要词条超过了6000个单词,比本世纪所出版的几种英语哲学辞典的容量大了许多。

除了对西方哲学内容做了许多富有新意的释解以外,这部词典的最大特点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收录了有关非西方区域或国家的哲学辞条,包括拉美、非洲、阿拉伯等,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其涵盖面之广,数量之多,述介之详细,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哲学的内容。除了一条长达3000多单词、全面介绍中国哲学基本情况的辞条之外,这方面的条目多达14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中国佛教的内容(有关佛教的辞条多与印度哲学部分交叉或重合,故此处暂

不述及)。按照辞条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对哲学家的介绍。该书共收录了从古至今的 52 位中国哲学家,他们是:管仲、孔子、墨子、老子、许行、杨朱、告子、孟子、庄子、商鞅、申不害、慎到、宋钐、惠施、公孙龙子、邹衍、荀子、韩非子(以上先秦),贾谊、董仲舒、杨雄、王充(两汉),王弼、郭象(魏晋南北朝),韩愈、李翱(隋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胡宏、朱熹、王阳明、刘宗周(宋明),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毛泽东、刘少奇、钱穆、徐复观、唐君毅(近现代)。另有 6 位列入候选名录:方东美、贺麟、牟宗三、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二是对中国哲学特有的名词概念、术语范畴,以及个别重要命题的解释,大约有 60 条。包括天、自然、气、道、太极乾坤、五行、虚等宇宙本体概念,理、心、知行、良知、正名等认识论概念,王霸、礼、术、道统等社会历史概念,以及所占比重最大的仁、义、忠、孝等道德伦理概念。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等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命题均做了较详细的解释。三是对哲学流派的介绍,这方面列入了儒、墨、名、法、道等先秦诸子五家,以及后世的黄老、新儒家(道学、理学)等。四是对重要哲学典籍的介绍,共列入《易经》、《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10 种。

除了明显重视先秦哲学之外(这也是西方汉学界的一贯传统),该辞典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就人物辞条而言,假如包括候选部分,本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大势,本辞典做了三点归结:一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影响,二是在

中国内地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新儒家哲学在港台地区的复兴和成长。向西方学习,构成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基调,哲学亦不例外。当代中国哲学在本质上已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家无一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浸染,从问题意识到言说方式均已程度不等地西化,所以离开西方哲学的背景就无法分析和理解当代的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一条主线。毛泽东成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具有中国思想背景的、对当代世界产生了一定震撼力的学说。但这种思想的极端化,将中国社会带向了崩溃的边缘,也极大地弱化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力。从 1978 年以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正日益走向多元化,处在一种苦苦的探索之中。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港台地区所生长出的新儒家哲学显然只是学院式的,并没有融入到台湾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因而也就没能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这一传统色彩颇浓的思潮,其主将皆为专业哲学家和大学教授,从香港的钱穆、唐君毅,台湾的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到目前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文明对话前沿的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莫不如此。

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瞩目和追踪,预示了世界哲学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传统的哲学范域观念正在被突破,哲学史的疆界和外延已经超越出了西方自身。

传统上,哲学被视为西方所独有,所谓哲学就是指西方哲学,不包括西方以外的思想。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之内容,一般是作为东方思想的一部分被附赘于东方宗教的研究领域,或者是作为

中国历史研究的思想史背景材料来处理,或者是构成描述中国文化的大叙事结构的一两个基点。至于用学科归类的眼光,将它和西方哲学硬捏在一起,欧美人实难接受。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们的大学哲学系绝不包括中国哲学部分,绝少开设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他们的哲学刊物也很难见到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哲学著作基本上与中国无涉。这样,以往的哲学辞典和哲学史,内容上也就只包括了西方部分,而没有中国哲学,这种情形相延成习,早成定格。二战后,随着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加深,特别是70年代后,工业东亚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的老调曲终人散,唯西方的一元观也大为褪色,东方被重新摆正在当代世界的格局之中。东方文化,特别是东方的宗教和哲学思想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某些内容已逐渐渗透到了西方学术的主流话语之中,西方传统人文学科的纯质状态正在被打破,哲学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具有东方色彩的异质之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编《剑桥哲学词典》才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收录了非西方哲学内容的辞条,肯认了东方哲学的价值,给了东方哲学以应有的地位。

作为东方思想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虽说早在启蒙时代即已播撒于欧陆,但长时间里只是做为猎奇的对象在狭小圈子中被观玩(伏尔泰可为代表),浪漫时代以降,更是声誉跌落,被视作是人类童年智力的产物(黑格尔可为代表)。所译介流传的典籍,仅限《易》、《老》、《语》、《孟》等几部,稍具轮廓的人物形象,只有

孔、老等数人。秦汉以下,少有人述及;当代意义,更无从谈起。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一直要等到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的二三十年。以美国学术界为例,早年的汉学家多主治文史,于哲学少有问津;而今天却不乏哲学科班出身的精锐良将。所以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汉学家数目正在增多,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兼跨两种内容哲学著述的大学教授已不鲜见。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已极大地拓展了,问题也已相当的深入,早已是今非昔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工业东亚问题的浮现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问题日渐显豁,已经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说明过去只是将中国哲学作为业已死亡的文明遗存的博物馆心态正在消退,而代之而起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和她的哲学传统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延续机理的转活意识。《剑桥哲学词典》之对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视,正是这一转向的明显表征。

当然,比之伊斯兰、古典印度等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国思想被接纳与西方学术加以融汇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还谈不上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哲学的观念和问题能否打入西方学术的主流话语?还是一个有待时日方能印证的设问,过分的乐观显然还为时尚早。但两种哲学交流的巨大反差似乎正在发生着改变,中国哲学的身影已开始全面地进入西方学术界的视野,这却是《剑桥哲学词典》明白无误地透露给我们的准确讯息。●

责任编辑:冯生

社会科学五十年

从五四运动 80 年和建国 50 年看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 夏书章

(中山大学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今年, 全国先后分别隆重开展五四运动 80 年和建国 50 年的纪念活动。活动虽然是各有主题和分开进行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的、有机的历史联系。在回顾我国社会科学 50 年之际, 很有必要从五四运动说起。

我们知道, 五四运动是在“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声中开始的, 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其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 它成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它高举民主、科学大旗, 表明它不仅是爱国的政治运动, 而且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它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的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显然离不开观念更新和理论指导。

两年后, 中国共产党成立。再过 28 年, 新中国诞生。实践充分证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主、科学精神, 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有逐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振兴华夏的可能。

应当肯定: 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提高两个文明建设的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各种改革、许多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的事情, 等等, 无一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建国 50 年来, 尽管曾经有某些人在某个时期对某类学科出现过忽视、

歧视现象,严重的如予以撤销,中止教学研究;“文革”这场浩劫,在社会科学领域更是空前的灾难;但是,拨乱反正、倡导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敏感,发出要赶紧补课的迫切呼吁。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深受鼓舞,长期被忽视的学科也恢复了生机,欣欣向荣。

试以政治学及其分支学科、相关学科为例,近20年来的发展虽因起步较晚、尚有曲折和学科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等情况,而在总体上来看,是仍在不断前进之中和有成绩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国家、民族、政党、政府、人权、国际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府职能、政治行为、反对腐败等理论研究,以及领导科学研究,等等,课题难以列举无遗,或仍属空白,或显得薄弱,正有待填补和加强。

总之,在建国50周年大庆之日,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充满希望,我们正满怀信心地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通过加倍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我与广东哲学学会

□ 曾近义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41)

在1958年广东省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期间,哲学研究工作者为了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大力开展哲学科学研究,实施广东省1958—1962年哲学科学研究规划。由参加会议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发起,于4月26日成立了广东省哲学学会筹备会,推选杜国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匡等21人为筹备委员。我有

幸忝列其中。在筹委会支持下,我和史丹同志主要负责开展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十年间先后在广东省的科技、教育、医卫界的骨干中举办自然辩证法学习研讨班十多期,协助专家学者们总结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运用辩证法的心得体会,写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论文,赢得了省委和中宣部的重视和支持。因此,在后来成立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我们都被推选为第一、二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我还被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1978年参加教育部主持的我国第一本自然辩证法讲义的编写工作,并被推选为主编之一。同年夏受教育部委托我省举办了全国自然辩证法师资培训班,参加学习的有清华大学等112所大学的有关教师。1979年我省的中山大学和华南师大被国家评为第一批自然辩证法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授权点,直到今天仅华南师范大学就培养和授予科技哲学硕士学位研究生70多名(其中包括为华工和广州中医学院授予硕士学位研究生10多名)。

回顾过去,我们为我省哲学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尽了一份力量。展望未来,我们华南师大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正为华南师大的211工程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专题开展研究,并为争取申报科技哲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授权点而努力工作,以期不辜负广东哲学学会的重托和期望。●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社会科学繁荣

□ 黄德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632)

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了。50 年来，前 30 年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中间由于某些方针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社会经济基础横遭严重破坏，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后 20 年幸得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总结了建国 30 年的经验教训，顺应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掌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审时度势，拨乱反正，打破闭关锁国的桎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一切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准则：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由于改革开放，新中国转危为安。即使 90 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然而，在此惊涛骇浪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巍然不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科学也相应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类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和学术丛书，各种专门著作和杂志期刊，纷纷出版发行；外国社会科学译著大量出现；“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及时推出。各种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各类学术活动频频举行，社会科学战线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可以说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即将到来。

什么力量在驱动社会科学的繁荣呢？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为学术自由开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促使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突破禁区，大胆探索，摆脱精神枷锁，发挥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知识分子和理论界过去怕抓辫子，怕戴帽子，怕打棍子，怕装袋子的“四怕”心理障碍解除，意气风发，都在邓小平理论光辉照耀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共同努力。

所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科学的繁荣。 ●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 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

□ 张燕清

(《福建论坛》杂志社编辑, 福建 福州 350001)

[关键词] 英国东印度公司 对华贸易 厦门 广州

[摘要] 作者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厦门贸易中心出现的特殊历史背景、其在厦门贸易的困难及其一直致力于在广州建立商馆的努力等几方面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 指出这一转移的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08- 0050- 04

17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英中贸易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初, 其贸易中心在厦门, 但从18世纪初期开始, 其贸易中心开始转移到广州, 此后一直保持至1834年该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的转移不是偶然的, 本文试就其原因略陈管见。

—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对华贸易中, 厦门贸易中心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17世纪初期, 东印度公司只能从马来群岛、印度或日本间接地购获中国产品。为了能直接对华贸易, 他们非常渴望在中国得到一个立足点。鉴于当时“中国闭关自守, 有条件地对葡萄牙人开放了一扇侧门, 但这扇门对于英国人是加锁封闭的”, ①东印度公司决定通过已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达到目的。1635

年, 东印度公司派遣一艘船只从果阿装载货物前往澳门, 进行贸易。但由于澳门总督不愿让人“打扰他的特权和钱包”, “他很容易地使用一些惯用的理由去说服中国的官吏, 对该船的航行加以种种阻挠”, 从而使第一次到达中国口岸的英船贸易活动以失败告终。②

17世纪40年代, 东印度公司进一步把直接和中国贸易提到议事日程。1644年, 公司派遣“欣德号”(Hinde)于8月9日到达澳门, 初时受到友好的接待, 但后来在船只丈量时受到“恶意勒索”。当时中国正处于明清两朝交替之年, 社会动荡不安, 贸易陷于混乱状态。该船发现澳门商品极为贫乏, “在城市里买不到生丝或熟丝、干姜……什么都没有, 只有瓷器, 它是‘欣德号’装运的主要舱货, 其余是黄金。”由于这次远航并未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在随后长达20年间, 东印度公司未曾再派遣船只到中国。直到1664年, 英公司船只“苏拉特号”(Surat)

奉命来到澳门时,仍然发现这里“没有贸易往来,在满洲统治下的中国所有口岸都没有安定的贸易”。③

就在东印度公司几度在澳门开辟对华贸易均告失败的同时,郑成功在台湾广为招徕外商,发展海上对外贸易,这无疑给英公司开辟对华直接贸易提供了新的契机。

郑成功自 1662 年收复台湾后,其父子即以台、闽、浙沿海三角地带为根据地,将厦门等福建沿海纳入其统治范围,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而清政府则对台湾实行严厉的迁界封锁政策,欲将郑氏集团困死在台湾。为了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围困,郑氏集团开始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尽管清政府“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域,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④1670 年郑经为吸引外商来台,欢迎除荷兰以外的世界各国到台湾进行贸易,允诺实行暂不对外商征收货物关税、亦不收本年度的房租等优惠政策。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670 年,东印度公司派遣小尾帆船“万丹号”(Pink Bantam)和单桅帆船“珍珠号”(Sloop Pearl)从万丹出发,于 6 月 23 日抵达台湾,由此揭开了东印度公司直接对华贸易的新页。第二年,东印度公司又在台湾设立商馆,以便开展有组织的贸易活动。尽管当时台湾因郑氏统治而独立于清政府辖域之外,但它毕竟是英公司在中国境内取得的第一个贸易基地。

1674 年大陆发生“三藩之乱”,郑经乘机攻占厦门及福建南部沿海等地。1675 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凡属郑氏统治范围的中国各地都有贸易便利的保证,⑥“英之船入厦门,乃为今年初次之

事也”。⑦英公司船开始入航厦门后,公司董事部“立即抓紧机会,1676 年派船一艘到厦门,并建立一间商馆”。⑧这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大陆上取得的第一个立足点。尽管它由于隶属郑氏统治范围而与清政府的辖域相互隔绝,但它毕竟是直接建立在中国大陆上的贸易基地,获得大陆货物较便,因而英公司极其看重厦门商馆,期望随郑氏的不断成功而扩大对中国的贸易,甚至在 1678 年下令“把厦门作为在中国的总商馆,台湾商馆也隶属它”。⑨

由于郑氏政权在福建沿海的局势动荡不安,郑氏政权与清政府之间进行拉锯战,以及清政府实行的迁界、封锁、禁海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对华贸易的发展。随着郑氏军事失利,东印度公司对厦门的期望也宣告落空:1680 年清军夺占厦门,郑氏退回台湾,英公司的厦门商馆遂告关闭。此后直至 1683 年郑克塽降清之前,由于厦门身处军事前沿,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陷于停顿状态。

二

自 1684 年清政府在厦门设海关后,尽管东印度公司可以合法地到厦门进行贸易,但大班们发觉官吏征税、勒索的现象日益严重,深感此处贸易艰难。

以 1684 年 5 月 26 日到达厦门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快乐号”(Delight)为例。抵厦伊始,5 月 27 日,英公司大班被通知要分别送礼给县令“朱太爷”和道台姚崇家。另一位官吏罗章家被大班视为小人物,只送给很少的一份礼物,结果这位官吏抗议,宣称自己是“将军大老爷的亲信,所有事务都要由他经手”,于是英公司大班只得送一份和其他人相同的礼物。根据“朱太爷”的通知,大班又“送一份礼给福州的总督宝义和将军大老爷”。

8月28日,英公司大班和这些官吏们会谈,又送一些费用给他们的书吏。

8月7日,“快乐号”船身严重裂漏,大班请求把船货搬入他们从前在厦门的商馆,以便倾侧修理。厦门官吏派人证实后,提出要英方给官员们1100两银作为条件。英公司大班极力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将这1100两“按市价用货物缴送”,而实际上这些货物价值约1600两。在这个过程中,英公司大班还要给那些会从中阻挠的小官员与送给“长官”相等的一份礼物。

12月7日,“快乐号”接到厦门官吏的通知,要求他们在十天内一定要离开。此时新“官长”朱崇家索取和他的前任同样数目的礼物,而“他们不得不照付”。

凡此种种的“礼物”和“费用”,使英公司大班面对厦门官吏的层层勒索深感“对付这个贪得无厌的禽兽,不比其他的容易”。^⑩1689年,英公司船“公主号”(Princess)到厦门贸易时,该船大班报告称,那些官吏比往常箝制得更紧,阻碍更多,而且勒索更重,他们在报告中明确地建议“在此处无法使他们让步,只有将贸易转往宁波或广州,或者放弃几年”。^⑪用马士的话来说,即“满洲人还没有学会,在贸易的羊身上剪毛而不单用一下子剥皮的方法,英国贸易者被剥了皮,而在贸易上得不偿失”。^⑫正因为此,英公司在厦门的贸易发展极为缓慢。自1684年至1689年间,英公司船只到厦门贸易量很少,这些船只载至厦门的货物价值大部分都只有“五六百贯”甚至“四五百贯”。^⑬

正是由于在厦门贸易艰难,东印度公司希望在其它地方开辟对华贸易。而17世纪末期,清政府粤海关实行减税政策以招徕外商,使英公司感到在广州开辟贸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1698年,康熙帝下令减征广东海关税银。第二年,东印度公司派遣“麦士里菲尔德号”(Macclesfield)到达澳门,他们立即感受到此时广州外贸政策的变化——从阻碍转变为鼓励镶贸发展:他们一抵澳门“即受中、葡官吏之欢迎,海关监督受总督之命且亲自下澳,率同商牙差役人等丈量船只,并愿减其原定课税四分之三以示招徕。”^⑭9月2日,甚至有位叫洪顺官的商人直接从广州来到船上,向该船商谈业务,表示愿“出最高的买价、索最低的卖价”来包购该船的船货,并供给该船“前所未有的最好商品品种”。^⑮在这里,该船大班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比起以前来到中国口岸的任何英公司船只大班都要成功——“他受到海关监督的友好欢迎,丈量船只的条件非常优厚;他按照东方式的惯例送礼,但没有受到勒索;他在好的条件下将他的全部资金以信用方式售给一位体面的商人;而订购购回出售货价的货物,差不多装满船舱。”^⑯

1699年“麦士里菲尔德号”在广州贸易所感受到的较宽松的贸易环境,增强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发展对华贸易的决心。

三

广州是东印度公司谋求发展对华贸易的重要地点。早在厦门商馆建立的第二年(1677年),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10月5日对万丹总办事处的信中,第一次命令总办事处“不要忘记设法在广州设立商馆”。^⑰1681年,董事部授权万丹总办事处有权决定将船只派往“适宜于出售英国产品的其它口岸或几个口岸”,并提出广州、浪白澳岛等地,特别强调在广州建立一个商馆的重要性。^⑱1682年,东印度公司第三次提出要在广州建立一座商馆,并派遣“卡罗莱娜号”前往

试探,结果以失败告终。^{①9}但董事部仍然念念不忘在广州建立商馆一事,1689年又派“防卫号”(Defence)前往广州,由于船长希思(Capt. Heath)的“不轨行为”引起一场“严重的殴斗事件”,致使董事部“充满沮丧”,但对此行的失败“并不感到惊讶”。^{②0}

从东印度公司三番五次强调要在广州建立商馆的训令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它在中国大陆上取得第一个贸易基地厦门开始,东印度公司就已经视广州为今后对华贸易的战略基地,并一直致力于在广州建立商馆的努力。同时,来华贸易的大班们“一致表示宁愿选择广州”,^{②1}这无疑又进一步促使东印度公司谋求建立广州商馆。然而,在力行闭关的清朝统治下,东印度公司欲在广州谋求合法的贸易立足点谈何容易——一方面是已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排斥和阻挠,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方面的重重阻力。

18世纪开始,“英国人已经把脚踏过中国贸易的门槛,虽已到桌子旁边,但还未占有席位”。^{②2}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东印度公司进入有系统地发展对中国贸易的历史阶段。从1699年开始,东印度公司每年都派遣船只到中国贸易,谋求发展稳定的对华贸易关系,建立固定的贸易基地。1699年,东印度公司派遣“麦士里菲尔德号”前往广州。8月26日,该船到达澳门。在逗留澳门的11个月间,该船同广州海关的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其首席大班道格拉斯从海关监督处求得三张“执照”:允许 he 可以和所有商人自由交易;准许 he 前往广州,并随时可以回来;准 he 若认为合适可将船开入广州。^{②3}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获得直接进入广州自由贸易的权利,改变了以往东印度公司船只只能在澳门附近游弋且遭受葡萄牙人排挤的情况,

同时和广州的贸易可以不再通过中间人(例如葡萄牙人)进行。这是东印度公司在谋求建立广州商馆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之前,英国人甚至“无法在广东找到一个落脚点”;到1701年英国人在广东的贸易投资已达40800英镑,而此时他们在厦门的投资是34400英镑——在广州的贸易投资已经开始超过在厦门的投资。^{②4}从1704年开始,东印度公司贸易中心转向广州,该年公司船只到广州4艘,到厦门2艘,到定海1艘。自1711—1753年间,仅1735年公司船“霍顿号”到过厦门,1736年“诺曼顿号”到过定海,其余来华英公司商船均集中在广州一口交易。^{②5}

正是由于在广州对华贸易的良好发展态势,进一步促使东印度公司要在“正常基础上”建立对华贸易关系。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②6}广州商馆的建立,标志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开始进入贸易正常化时期。此后直至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止将近120年间,广州商馆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史,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史,实际上就是广州商馆的历史。”^{②7}●

①②③⑥⑧⑨⑪⑫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合卷本)第一卷,第30、13、32、45、45、46、63、98、86、92、46、48、50、81—83、145、98、87页。

④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四,“伪郑逸事”。

⑤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十七世纪台

从方志记载看明清时期水稻的分布

□ 闵宗殿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 北京 100026)

[关键词] 地方志 水稻 明清时期

[摘要] 本文利用方志资料详细统计、分析了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分布情况及长江流域的双季稻种植情况, 勾画出了水稻分布的区域轮廓, 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8-0054-07

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水稻种植发展最快的时期, 主要表现在: 一、南方的水稻迅速向北方传播, 黄河流域种稻的县不断增加; 二、华南的双季稻不断向江南传播, 长江流域开始成为我国新的双季稻种植区。但是, 对于水稻的分布问题历史上记载很少, 现在能查到的和水稻分布有关的著作有以下几种:

1. 清·林则徐作有《历代开治水田

成效考》, 有关明清时期的水稻, 只讲了京师附近(今河北省)的水田开辟, 没有涉及水稻在全国的分布;

2. 清《授时通考》卷二一、二二是专门讲稻的。但北方只涉及了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5个省, 其余就是讲述南方各省的水稻品种, 有关北方5省的水稻分布也语焉不详, 很难看出我国明清时期水稻分布的具体

湾英国贸易史料》第54页。转引自林仁川《清初台湾郑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1。

⑦《华夷变态》上册, 第116页。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 见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⑩“快乐号”上述引文均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 第53—56页。

⑬参见〔日〕松浦章前引文。

⑭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62页, 商务

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⑭H. B.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朝制度考》), P280, 1908。

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310—321页, “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表”(1635—1753年)。

⑯〔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59—59页, 三联书店1957年版。

责任编辑: 郭秀文

情况;

3. 清·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这是一部推广早稻和提倡种植双季稻的专著,对于了解我国明清时期双季稻的分布很有帮助,但却难以用它来考察明清时期水稻在全国分布的情况。

虽然历史上没有留给我们有关明清时期水稻分布的详细资料,但却留下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地方志,这些方志一般都有岁时、民俗和产物等方面的内容,凡有水稻种植的州、县,都有水稻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方志的记载,统计出明清时期有水稻分布的州、县,勾画出水稻分布的区域轮廓。当然根据方志统计的材料,也有不足之处,例如,有的县没有方志,或有的县志对此缺载等,但这是极少数,因此,利用方志资料来考察明清时期的水稻分布,大体能反映当时的面貌,其真实性可以达到十之七八九。本文就是利用方志资料来研究明清时期我国水稻分布的一个尝试,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分布,二是长江流域的双季稻种植。

一、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分布

黄河流域有水稻种植,不自明清始。据游修龄先生的研究,在元代,今日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5省,都已有水稻种植,但地域不广,只是在几个点上。

明清时期水稻在黄河流域及其相邻地区的分布空前扩大。据对明清的方志统计,有400个州、县的方志有水稻种植的记载(这里指最早记载该州、该县有稻的方志,在这个时期以后的该县该州方志不计算在内),在这400个州、县中,明代占128个,清代第一次见于记载有稻的州、县为272个。

明代的128个州、县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6个省。地域的分布上,大致和元代相当,并略有扩展,但就每个省的分布点来看,则大大超过元代。

据统计,山东有稻种植的州、县有18个,占全省104个州、县的17.3%,河北、山西种稻的州、县分别为30和25,比例略高于山东,分别占该省州、县的19%和25.5%。比例最高的是河南,有33个县种稻,约占全省州、县的30.5%,比例最低的是陕西,种稻的县有11个,约占全省州、县的9.4%。此外,甘肃还有8个州、县有稻,因其当时未设布政司,行政地域不明,故无从计算百分比。

清代有水稻种植的州、县数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新见记载的种稻州、县共有272个,再加上明代已种稻的州、县128个,总数为400个,约为明代种稻州县数的3.1倍,为清代《授时通考》所记黄河流域35个种稻州、县数的11.4倍。①地域上除原有6省以外,又向北扩大到辽宁,向西扩大到新疆。

各省种植水稻的州、县数,清代明显超过明代,分布情况为:山东58个州、县,比明代18个州、县增加了2.2倍;河南78个州、县,比明代33个州、县增加了1.36倍;河北91个州、县,比明代34个州、县增加了1.6倍;山西62个州、县,比明代25个州、县增加了1.48倍;陕西46个州、县,比明代11个州、县增加了3.18倍;甘肃26个州、县,比明代8个州、县增加了2.25倍;此外又增加了辽宁15个州、县,新疆的25个州、县。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清代,我国水稻在北方发展之快、分布范围之广。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上述这几个省共有624个州、县,其中有水稻种植的州、县为400个,约占总州、县数的

64%，反映了清代有水稻种植的州、县所占比重之高。

表1 明清时期北方各省中种稻州县所占的比例表

省名	明代			清代		
	州县数	种稻州县数	种稻州县所占百分比	州县数	种稻州县数	种稻州县所占百分比
山东	104	18	17.3	106	58*	52.8
河南	108	33	30.5	106	78	73.5
河北	173	33	19.0	120	91	75.8
山西	98	25	25.5	101	62	60.3
陕西	116	11	9.4	90	46	51.1
甘肃	未设布政司	8		68	26	38.2
新疆	未设布政司			33	25	75.7
合计	599	128	21.5	624	400	64.1

资料来源：(1)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及相邻地区种稻州县一览表。

(2) 《明史·地理志》。

(3) 《清史稿·地理志》。

* 清代种稻州、县数为明代种稻州、县数加上清代新出现的种稻州、县数。

由于水稻是一种高产的粮食作物，又适宜于沼泽地生长，水稻在北方的推广，对于北方不适宜于种旱粮的低洼地、滨海盐碱地、沿河滩地、涝后积水地的利用起了良好的作用，有的州、县因此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清道光时，河南密县百姓在洧河修渠种稻，收到了“收获较陆地增加数倍，沿河居民实利赖之”的效果；②康熙时，天津镇总兵蓝理利用海河潮水种稻，垦田二百余顷，秋收亩三四石不等，人称小江南；③光绪时，周盛传在津沽一带利用海河水在小站一带开垦稻田，以后培育成名闻全国的小站稻，④等等。

但北方是个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年降雨量黄河下游、渭河流域及海河流域在500—700毫米左右，内蒙古及河西走廊一般小于250毫米，可资灌溉的水资源严重不足，而蒸发量又大，这就极大地

限制了水稻在北方的种植，不少地区种稻的面积都相当少。例如：河南：南乐，“稻，非经水灾，种者亦少”；⑤荥阳，“皆畸零不能成数，总计不过万分之一二”；⑥宜阳，“惟洛流沿岸水田，间有种之者”；⑦新安“间亦有之”；⑧陈州“洼下之地，间或有之”；⑨扶沟，“稻，甚少，间有种者”。⑩河北：宣镇，“粳稻甚稀”；⑪沧州，“稻田间亦有之”；⑫易州，“地寒燥不恒艺”；⑬涑水，“稻，种于水田者，惟石亭新庆村有之，所出不多”；⑭广昌，“稻，城子村，三家村有种之者”；⑮保定，“保郡旱地居多。稻，水田也，种植者少”；⑯新城，“稻，东北濒湖产水稻，间有之”；⑰井陘，“仅数处可植”。⑱山东：黄县，“土性不宜，其淤田间或有之”；⑲东昌，“稻间有之，燥味不佳”；⑳博平，“间亦有稻”；㉑万城、章丘，“稻非北地常产，历、章诸处稍有之”；㉒肥城，“唯不宜稻，西南乡洼下之区，间有种者”；㉓临沂，“县无水田，惟洼地宜之，种者少”；㉔日照，“稻有糯有粳，……稍旱则失收，农家不敢多种”。⑳

河南、河北、山东是黄河流域种稻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种植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所种水稻面积的情况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在讲到明清时期北方水稻种植的扩大时，只是指分布州县数字的增多，并不能用南方稻区种稻情况来理解北方。在北方明清时期水稻种植虽有扩大，面积却是十分有限的，在有的县，种稻只是具有象征的意义而已。

在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北方水稻分布的情况时，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即北方水稻种植的发展有两个高潮期，一是明代嘉靖到崇祯时，二是清代康熙至嘉庆时期。这个现象，在对明清方志的统计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据统计，有明一代，记录有水稻种植

的州、县为 128 个,而出现在嘉靖到崇祯这段时间的为 94 个,占了总数的 73.4%;清代开始记载有水稻种植的州、县为 272 个,出现在康熙至嘉庆期间的州县为 208 个,占总数 76.4%(见表 2)。

表 2 明清时期北方各省方志记载有稻时期统计

省名	明代			清代						合计
	洪武	嘉靖	万历	顺治	康熙	乾隆	道光	同治	宣统	
	正德	隆庆	崇祯		雍正	嘉庆	咸丰	光绪		
山东	1*	5	12	2	26	6	2	4	0	58
河南	7	19	7	8	18	12	5	2	0	78
河北	6	13	14	2	35	16	1	3	0	91
山西	20	3	2	3	22	8	1	3	0	62
陕西	0	2	9	1	14	5	9	6	0	46
甘肃	0	4	4	2	4	8	4	0	0	26
辽宁	0	0	0	0	7	0	1	4	3	15
新疆	0	0	0	0	0	3	1	15	6	25
合计	34	46	48	18	126	58	24	37	9	明 128 清 272 合计 400

资料来源:王达等编《稻(下篇)》第 971—1207 页。

* 指州、县数,其余同。

北方地区水稻发展出现上述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人口飞速增长造成了人多地少、粮食供应不足的矛盾。据记载,我国人口在明代中叶以前,一直波动在 6000 万上下。明中叶以后,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明嘉靖时达到 6300 多万,而据近代学者的研究,人口可能已达到 2 亿;②6 清乾隆时,又增加到 3 亿,嘉庆时达到 3.5 亿;人均耕地从洪武时的 14.05 亩到嘉靖时一下降到不足 7 亩,乾隆中期又降到 3.56 亩,嘉庆时又进一步下降到 2.19 亩。②7 此外,这一时期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的发展,也挤掉了部分粮田,更加重了这一矛盾。为了解决耕地的不足,农民们开始设法利用滨海盐咸土、不宜种旱作物的沼泽地及积水洼地,水稻便成为利用这些土地的最好作物。

还有一个因素对这一时期水稻的发展也有影响,即从明代后期起,一部分士大夫有感于每年从东南地区漕运所费太大,力陈在京津渤地区发展水稻,借以减轻南粮北调之费,这就导致了河北滨海地区稻田的开发。如万历时徐贞明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唐山地区)开垦和汪应蛟在天津葛沽一带开垦;入清以后,政府在这一带一直设员开垦,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海河一带开水田二百余顷;雍正时怡亲王允祥在河北主持大规模开辟水田,共开辟官私水田 5600 余顷;咸丰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咸水沽、葛沽营田 4000 余顷,光绪时周盛传在天津小站一带广开水田等。

二、双季稻在长江流域的发展

双季稻,古称再熟稻,最初只指再生稻,后来随着栽培技术的发展,相继出现了连作、间作、混作的栽培法,统被称作双季稻。早在东汉两广地区已有双季稻,是我国双季连作稻的发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季稻从岭南发展到了江南。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粒》中所说“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反映的便是这个情况。但宋应星说得比较泛,所谓南方平原是指整个南方平原还是指南方平原中的某些地区,难以弄清。清代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也讲到双季稻的分布,但比宋应星说得要具体一些,他说:“以余所知,浙东、闽南、广东、广西及江西、安徽,岁种再熟田居其大半,近闻两湖、四川在在亦渐艺此。”李彦章所说种双季稻的省份,基本是符合当时我国双季稻的栽培地区的,但所说“岁种再熟田居其大半”则似乎有些夸大,因为当时种植双季稻的州、县或栽培面积,在有双季稻种植的行省

中,都未达到半数。这可能是李彦章为了宣传和推广种植双季稻而作的鼓动人心之言。

那么,明清时期我国双季稻的种植情况究竟怎样?经查阅明清方志,其记载反映了下列的情况:

第一,在种植地区方面,明清时期双季稻已从两广扩大到云南、福建、台湾、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安徽、四川等省,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有了双季稻的分布。

明清方志记载的种植双季稻的州县共有 159 个,当时这些省的州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为 912 个,种双季稻的州县数仅占这些省总州县数的 17.4%。就以种植双季稻最多的行省来说,广东占 48.9%,江西占 41.2%,福建占 56.6%,其他的省所占的比例就更小(见表 3)。

明清时期虽然是我国历史上双季稻种植的繁盛时期,但从方志记载的时间看,明代只涉及广东、云南、福建、江西、浙江等 5 省 15 个县,清代则有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台湾、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四川等 12 省 159 个县,90% 的地区是清代发展起来的。

表 3 明清时期各省种双季稻的州、县所占比例表

省名	州、县数	种双季稻州、县数	双季稻州、县数所占百分比	备注
广东	94	46	48.9	各省州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
广西	76	12	15.7	
云南	88	2	2.2	
福建	60	34	56.6	
台湾	15	4	26.6	
江西	80	33	41.2	
湖北	62	6	9.6	
湖南	76	3	3.9	
浙江	78	9	11.5	
江苏	71	2	2.8	
四川	152	1	0.6	
安徽	60	7	11.6	
合计	912	159	17.4	

虽然方志记载也有遗漏,但大致说来这个发展趋势还是可信的。例如,广西的双季稻,据《岭溪县志》载:“隆(庆)万(历)以前,水田多种一造……天启年间,始种早稻,岁耕二造。”思恩府是道光时在李彦章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自是郡中既得两熟,种者渐多”。^{②8}台湾的双季稻据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台湾百余年前(指 18 世纪乾隆时),种稻岁只一熟,自民食日众,地利日兴,今则三种三收矣”。江西的间作稻,据《万载县土著志》记载,这种栽培方法“嘉庆初来自闽广”。^{②9}连作稻是康熙年间“三藩之乱”以后,粤北、闽南的破产农民进入赣南、赣中后发展起来的。^{③0}湖南的双季稻,据黄皖《致富纪实》说,其双季稻的种子引自江西的“稻荪”,道光、咸丰年间广植于醴陵,19 世纪又推行到浏阳、善化、湘潭等地。四川双季稻的种子亦引自江西,嘉庆《南溪县志》载,“江西早,种自江西来,一岁可栽两次”。江苏的双季稻是康熙时李煦在苏州推广康熙帝育成的御稻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而未及推广开来。^{③1}上述事实说明,我国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双季稻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这和清代我国人口激增、人均耕地减少、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等方面因素的刺激有密切关系。其中,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在我国双季稻的推广中,起了传播技术和品种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第二,从方志记载各省种植双季稻的情况来看,明清时期种植的主要是连作稻,虽然亦有间作、混作和再生稻,但数量很少。间作稻种植最多的地区,首推浙江。浙江地区间作稻之所以比别省发达,是因为浙江种间作稻积累有丰富的经验,掌握了间作栽培的技术关键,而且历史悠久,富有传统。据《农田余话》

记载,早在明初,浙江永嘉(今温州)就种间作稻,方法是“清明前下种,芒种蒔苗,一垄之间,稀行密蒔,先种其早者,旬日后,复蒔晚苗于行间。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米,乃锄理增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实熟也。”这种栽培方法一直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浙江采用。

第三,双季稻在明清时期虽然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总的说来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双季稻在南方之所以未能大面积推广,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当时的记载来看,有以下几点:

1. 季节和劳力的矛盾。生产双季稻,前作和后作的耕、种、管、收需要大量的劳力,特别是在“立秋”前后,早稻要抢收,晚稻要抢种,劳力更显得紧张,全凭手工操作的个体农民在这一生产季节往往显得顾此失彼,耽误季节造成后季减产。《岭溪县志》说,“方插秧时,又刈早稻,人力不足,延及秋后,秧针已老,成谷无多”。《抚郡农产考略》说:“凡二遍,迟至立秋栽,则不成熟。谚云:立秋栽禾,够喂鸡母。言其得谷少也。”乾隆江西《龙泉县志》说,“翻稻,早稻刈后始种,然气候早寒则秀而不实”,这就限制了农民扩种。

2. 怕影响地力。林则徐在为《江南催耕课稻编》作序时,引用江苏农民的话,说“地力不可尽,两熟之利,未必胜一熟”,即是怕影响地力和来年的产量。道光五年江西《定南厅志》说,芟滋禾(混作稻)“惰农图省工粪,时亦为之,然梗粗根巨,一二年后,腴田变瘠壤,反足为害”,道理讲得更清楚了。

3. 水利的影响。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有人言,江北下河州县,前数十年稻两熟。余去秋以防河驻召伯埭,亲见早、中、晚稻之种皆备,而竟无再种者,心尝疑之,以询老农,皆谓嘉

庆九年(1804年)以前,罕水灾,种稻一岁得两熟。九年后,湖水秋涨,五坝辄开,田惟恐淹,故但俸其一收,而不可以再种。”这说明有些地方难以扩种双季稻,或种了双季稻又衰败,是和水利设施健全与否有直接的关系。

4. 社会制度的影响。据林则徐说,江南农民之所以不乐种双季稻是“吴俗以麦予佃农,而稻归于业田之家,故佃农乐种麦,不乐早稻。”农民种双季稻不仅多种不能多得反而多种多遭剥削,影响了农民种双季稻的积极性。

5. 后季稻产量不高。万历十年《闽大记》卷十一说:“平地之农为洋田,早晚二收,早稻春种夏收,晚稻季夏种仲冬获,利仅早稻之半。”嘉靖五年《永春县志》说,“按二熟之谷,较之一熟,所获亦相等”,即双季稻的产量等于单季稻的产量。乾隆七年《石城县志》载:“翻粳(连作后季稻),必田之腴者方可种,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光绪十五年湖北《兴国州志》说,“早稻既刈,更种晚稻者,熟较薄。”康熙时,江南织造李煦在苏州推广双季稻,从康熙五十四年(1722年)连续种到康熙六十一年,共种了8年,后季稻的产量每年都只及前季稻的一半,最好的一年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前季亩产收4.15石谷,后季收2.6石谷,也只及前季的62%,二季合计共收6.75石谷,相当于亩产稻谷915斤,一般产量都只在6石谷左右,相当今亩产810斤。而当时苏州地区的腴田或丰年亩产可达米三石,相当于今日亩产谷820斤。^②双季稻的产量,反不及单季稻的产量,这是影响当时双季稻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结语和说明

(一)从方志的记载中,我们得出了一个明清时期我国水稻和双季稻分布州、县的具体数字,弥补了文献记载过于笼统的不足。说明利用方志资料从事明清农业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明清时期各地方志的编纂,由于各县的条件不同,有的州、县虽然种稻或种双季稻的时间比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或未编方志,或编的时间相当迟,因而落实到某个具体州、县是否有稻和双季稻及其种植时期时,不能完全以方志编纂的时间为根据。方志编纂的时间,只能说明某个州、县有稻和双季稻时间的下限。

(三)本文所述的某个州、县有稻或双季稻,只是说明某个州、县有过稻和双季稻,而不是说整个州、县都种稻或双季稻,它只是指种植点,与种植面积无关。

①清《授时通考》卷二十一所记北方 35 州县为:宛平、香河、昌平、房山、遵化、满城、邢台、涞水、历城、邹平、新城、泰安、莱芜、滨州、滋阳、曹县、钜野、沂州、青州、日照、莱阳、昌邑、文水、临汾、闻喜、鄢陵、洧川、洛阳、遂平、罗山、光州、商城、渭南、韩城、西乡。

②民国十二年《密县志》卷十三。

③同治九年《续天津县志》卷七。

④民国二十三年《静海县志》。

⑤光绪二十九年《南乐县志》卷二。

⑥民国十一年《茌平县志》卷二。

⑦民国七年《宜阳县志》卷三。

⑧乾隆三十一年《新安县志》卷六。

⑨乾隆十一年《陈州府志》卷十一。

⑩道光十二年《扶沟县志》卷七。

⑪康熙十九年《宣镇西路志》卷一。

⑫万历三十一年《沧州志》卷三。

⑬康熙十九年《河北易水志》卷二十一。

⑭康熙十六年《涞水县志》卷四。

⑮康熙三十年《广昌县志》卷一。

⑯光绪五年《保定府志稿》。

⑰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卷三。

⑱雍正八年《井陘县志》卷三。

⑲同治十年《黄县志》卷三。

⑳万历二十八年《东昌府志》卷二。

㉑康熙三年《博平县志》卷五。

㉒道光二十年《济南府志》。

㉓光绪三十四年《肥城县乡土志》卷八。

㉔民国五年《临沂县志》卷三。

㉕康熙五十四年《日照县志》卷三。

㉖赵冈、陈仲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湾版);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

㉘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

㉙转引自王达《双季稻的历史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

㉚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㉛闵宗殿《康熙与御稻》,《农史研究》第四辑。

㉜闵宗殿《康熙与御稻》,《农史研究》第四辑,第89页;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郭秀文

澳门开埠的若干历史问题

□ 谭世宝

(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博士)

[关键词] 澳门开埠 和谈 受贿

[摘要] 葡人之所以可入住澳门,并非如以往多数论者所认为的是因中国官员徇贿受贿所致,而是明朝政府在知己知彼、权衡利弊基础上的正确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才产生了汪柏与索萨为代表的中葡首次和谈,从而结束了两国的敌对关系,使守法从善的葡国商人加入到与中国友好通商贸易的外商行列之中。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8-0061-10

澳门半岛正式开埠成为国际性的港口城市的年代,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定于约在明嘉靖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535—1557年)间。而葡人入居澳门的时间以及建立其只享有某些自治权的政府机构的过程,以往学界的研究尚有很多模糊不清、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最近的研究认为,较为准确严谨地说,葡人是在1557年才开始获准合法进入濠镜地区及其中的澳门半岛,而居澳葡人在澳门半岛逐步建立其自治机构是在1580年至1586年。^①因此,属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直接管治下,葡人在澳门半岛中心地区实行局部自治的时间只有260多年(1580或1586年—1848年)。其后居澳葡人以武力夺取和取消了中国香山(今中山)县政府官员对澳门地区(澳门半岛及九澳〔葡占后改称路环〕、氹仔两岛)的管治权时期有100多年(1848年—),而澳门地区进入回归中国的过渡期则为1987年至1999年。在此澳门“九九回归”之日即将来临之际,笔者试提出个人的一些新看法,仅供大家讨论参考。

一 澳门开埠成功的主导因素是明

朝政府的正确决策

在澳门开埠成功的各种因素之中,有外来的与内在的两部分原因。但相对于中国内在的因素而言,其他诸国包括葡国等的外来因素,都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因为当时仍然比外来的各国势力强大得多的明朝地方和中央政府,对于处理各外国船舶来华而引起的外交、军事、文化、商贸、海防、国家安全、领土和领海主权等关系问题,是一直具有绝对的优势和主导权的。

在明朝早期众多的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中,澳门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明朝后期以至清朝前期唯一的对外开放的国际商贸港口城市,容许葡国为主的各国商人入住经商,实为明朝广东及地方政府官员基于对内外诸因素的反复分析,对各方面的利弊得失的细致权衡后,所作出的理性抉择的结果。将葡国来华势力由最初期的敌对关系为主,转变为葡人对华的友好商贸关系为主,最后使居澳葡人逐步归化中国而成为协助明清政府将澳门开辟为远东最大的国际商港的主要外来因素,这都是

中国明朝政府官员的抉择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必须明确两点,其一是明朝史籍最初所说的香山濠(或作壕、壕)镜(或作境)澳,本来并非只指现今澳门半岛的港口,而是指整个珠江口地区,包含澳门、浪白等泊口在内。^②其二是明朝政府于1535年根据黄庆(庆或作琼、度)之建议,决定把香山濠镜地区的泊口开辟为国际商贸港口,本来是接待暹罗、占城等国的商船停泊的,与葡国船商无关。因为其时葡国船商与中国仍处于敌对的关系。葡商是后来混入,最后于1555—1557年才通过和平谈判,开始逐渐由非法混入的敌人转变为合法进入的主要合作贸易伙伴。^③葡国的历史档案及其学者的主流意见都有力地证明明朝政府是在1557年真正开始“允许第一批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④这与前述中国史籍的原始记述是一致的。只是有的葡国学者误认为:“这一日期,原则上被视为澳门形成的日期。”

^⑤而以往中国的一些学者,也由于对有关史料的误解,故都误以为澳门的开埠是以葡人入居为主要的原则标志,并且把1535至1557年间与葡人无关的中国与其他诸国商人开辟濠镜地区为国际商贸港口之事,都算到葡人账上。对此,近来已有学者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⑥但有很多具体问题仍未弄清,需要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认为,特别需要明确,当时在中国沿海的葡船葡人都被视为危害中国的非法入境者,一直受到中国各地政府的军事追剿和驱逐,故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濠镜地区包括澳门的最初开港通商事务。至于其后葡人之所以能在澳门成为中国的主要的商贸合作伙伴,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鉴于当时来华葡人既具有超出其他诸国商人的远洋国际商贸实力,又具有排除他国及中国的海盗的武力,同时又已表示出有守法从善的诚意,并且由此逐步显示出他们对强大的中国的归化效忠。充当中葡关系这一伟大历史转捩点的,就是目前仍备受误解的汪柏与索萨所进行的中葡首次和谈,这也就

是下文要着重述评鳌清的一大历史悬案。

二、汪柏与索萨的“中葡第一项协议”的和谈之真相剖白

早在明正德三年(1508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就开始命人打探中国的情况,而最初来华的葡人误以为可以像征服印度洋和南洋诸岛国那样,凭着少量的炮舰、军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全中国。经过在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一连串碰壁失败之后,葡人才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小荒岛,都不是他们可以凭借军事力量所能夺取的,必须对中国官方表现出畏服、恭顺、有礼、和平与诚心归化,才有可能在中国某一海岛获得一个立足点。^⑦同时,中国官方在与葡人经历了几次胜利的交手接战,也对葡人的实力有了比较正确清楚的认识。正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中国官方的正确决策主导,而葡人又基本服从合作的情况下,产生了汪柏与索萨为代表的中葡首次和谈。

1555年,海道副使汪柏在消灭或驱逐了一大曲葡国海盗奸商之后,主动对新来而且已经陷入困境,并表现出从善守法倾向的那些葡国船商发出了和谈的命令。接到这一命令的就是约1553年才入华的葡人在华贸易商船队的指挥莱昂内尔·德·索萨(Leonel de Sousa)。他及时把握了这一良机,^⑧所以双方进行了有史以来中国首次与葡国(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欧洲国家)的和平友好通商谈判,^⑨并且达成了口头协议。以索萨回到印度的柯枝(Cochin)后,于1556年1月15日致信葡王约翰(D. João)三世的弟弟路易斯(D. Luís)亲王所报告这一谈判的具体过程为主证,^⑩兼用其他一些中、葡的原始资料及后人的研究成果为参证,笔者认为这次谈判的要点可归纳如下:

1. 中国容许葡国船商来华通商贸易的第一项条件是要他们完全守法自新,为此首先要为今后从事和平友好通商的葡萄牙人正名实——“将‘佛郎机’一名改为来自葡萄牙与麻刺加的葡萄牙人”,以示他们和以往在中国沿海

为非作歹、走私抗税的海盗式“佛郎机”奸商不是同类。根据旁证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称呼也相应地由敌意的“番鬼(fancui)改为“番人(fangim)”。^⑪

2. 来华贸易的葡商必须按中国的惯例交纳货品(或其价值)20%的关税。这是中国皇帝规定的税额,是中国地方官员无权减低的。

3. 以上协议,已即时对索萨此次所在的商船及其指挥的船队共17艘帆船生效,葡人必须吸取以往的教训,对负责上船检查的中国海关税务官员要好好款待和表示高度的礼敬。

4. 要使这一口头协议确立并成为有效的正式条约,就必须分别报呈中国皇帝及葡国国王批准。为此,中国海道副使要求葡王派遣一名使节来华,以便向中国皇帝传送葡王对索萨作为葡国谈判代表的身份资格的追认证明,从而使得口头的和平协议得到正式的订立。

综上所述,这一协议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结束了以往两国的敌对关系,容许守法从善的葡国商人加入到与中国友好通商贸易的外商行列之中。这为葡商合法进入中国濠镜地区,最后容许葡人登陆今澳门半岛,并租居其中的一块地方以从事长期的、对中葡双方都有利的国际商贸和文化交流事业,奠定了法律基础。据此和约及很多旁证资料表明:葡人既非在1555年之前,就已被汪柏“纵容”而入居了澳门;^⑫更非在此口头协议的当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容许定居澳门。^⑬因为一来这次和谈并没有涉及划出某个港口地方给葡人入居以及相应的地租的问题,而只涉及容许他们进入中国各港口从事合法的商品贸易及应缴交相关的关税税率问题。而且即使是这后一问题的协议也要等中方禀报皇帝批准,同时葡方也报请葡王曲准之后,才能正式生效实施。所以,估计是等到1557年,这一口头协议才为双方最高当局批准实行。^⑭至于因为正式实施这一条约,而即时导致原来在上川岛、浪白滘非法居留的葡人,为方便合法的贸易而逐步转到离广州较近便的澳门居留,则应是中国政府所能谅解和

容许的。^⑮中国政府之所以容许葡人入居澳门而又不立即征收地租,并非因为某个官员的贪污自肥,而是因为要经过相当的年时,中国政府才能确定有多少葡人愿意在此建长久性的房屋,以确定该地是否适合作葡人长久租居之地。^⑯所以,到隆庆(1567—1572年)初才形成葡人在濠镜澳建屋租地而必须向中国政府交纳年租金500两白银的结果。此一结果要到万历元年(1573年)编制《赋税全书》时才正式载入国家税册中并传至清代。^⑰

但是,由于以往的西方学者对索萨此信多有误解,而中国学者又大都没有研究过索萨之信全文,只是根据被西方学者转述或节引的一两个片段,所以就难免以讹传讹,偏之又偏了。有必要略加纠正。

例如,当今多数论著都说汪、索的谈判是在1554年进行。较早持此论的周景濂说:“当时葡人与广东地方长官,并订有协约,主其事者,为葡萄牙远征日本舰队提督沙萨氏(Lionel de Sousa)。据彼一五五四年致友人函云:从来中国人视葡人与欧洲人无别,一律称之为佛郎机人,今始被认为葡人而注意及之。又云:自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三年)订立和约后,中国人乃停止称葡人为蕃鬼,而名之曰蕃人云〔见徐萨斯《史的澳门》M. de Jesua, Historic Macao. 及伏尔比绥里所著文〕。”^⑱其实前段话是对徐萨斯之文的误改,后段话则原出于克鲁斯的《中国概说》第23章,都与历史真相有出入。正如前文所述,1554年索萨尚在中国海上,至1555年才与汪柏谈判,何以能预先致信友人谈及此事呢?此时年之误为徐萨斯原有。而伯希和同引此文而指其致信的对象为“王子 dom Luiz”,戴裔焯所引亦同,可证作“致友人”当是周氏之误改。伯希和又指责“孟达多(按:即徐萨斯)未言出处,致余未能寻获此札。”^⑲可见,此信其实就是前引的1556年1月15日的信,决非1554年另致其他友人之信。难怪伯希和无从查找了。

又如中国内地研究澳门史的先驱戴裔焯、

费成康,虽然对澳门史研究作出了令人钦敬的贡献,但是限于当时的研究环境和资料的缺乏,故都沿用 J. M. Braga 之不很准确的记述,把索萨的信之首句转述为:“我在一五五二年(即嘉靖三十一年)曾乘商船往中国”。^⑩其实原信起首说:“Eu fui à China numa embarcação de mercadores, como escrevi a Vossa Alteza de Malaca, o ano de cinquenta e dois(中译:我曾于1552年于麻刺加给殿下致函,如函所述,我就乘坐一艘商人的船只去了中国。葡文原载《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P. 91,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笔者认为,这里只是说那封信是写于1552年,并没有明确说他去中国也在同一年。因此,索萨究竟是在1552年还是1553年到达中国,可暂且存而不论。但必须弄清的要害问题有如下四点:其一是汪、索和谈是在哪一年以及在什么形势下进行的?其二,谁是这次谈判的主动策划提出者?其三,和谈的方式途径是正当、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其四,和谈的内容、目的和历史意义是什么?由于 Braga 片面地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评述汪、索的和谈,所以就把功劳完全归于葡方代表索萨。他说:“葡国人能有机会与广东人公开通商,一改以前的黑市贸易,应归功于葡萄牙商舰舰长莱奥耐·特·苏沙(Leonel de Sousa),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⑪可能是基于和谈有功于葡方即有危害于中方的潜意识,戴、费等中国学者便把 Braga 对索萨的片面称赞转为对索萨与汪柏的全面指责。在他们看来,和议的进行和完成,完全是以索萨的行贿和汪柏的受贿为基础的。费氏更进一步指“索萨与汪柏会商于1553年下半年,当时索萨隐瞒了国籍,对汪柏进行了贿赂……使汪柏同意他们来粤贸易。”^⑫

90年代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非但没有呈现后出转精或后来居上的新成果,反而出现了后出转粗,每况愈下的谬说。例如,有论者说:“……其主持行贿的人是葡萄牙远征日本舰队提督索萨。而他又是在东洋宗徒圣沙

勿略死后第二天(1552年12月3日)‘乘机以机警之手段出面调停,以沙勿略由日本返回时所议定的草案为根据’进行的。根据克鲁斯(Caspar da Cruz)所著《Tracatado da China, 1829》(《中国概说》)第23章记载,索萨(Souza),曾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15日由印度西部的柯枝(Cochin)致书葡王约翰三世(King John III)的兄弟路易斯亲王(Prince Luis)叙述贿赂汪柏的过程:‘我在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挤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我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和平协定以及缴纳各种税是由广州城海道(Hai Tau)副使的命令决定的。他是国家的高级官吏和海军长官,负责海防并兼理市舶一切事宜……’”。^⑬把索萨开始谈判之时定在1552年12月3日,这是谬说。至于其所引克鲁斯的记载,也不知是如何讹传而成的,因为克鲁斯其实只是扼要记述了索萨谈判的要点及前因后果,根本没有以上所引的诸如“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国”等详细的句子。该书23章原文说:“自〔15〕54年以来,船队队长、在沙乌尔结婚的阿尔加维人列昂内尔·德·索乌萨同中国人商妥,向中国人缴税,中国人则允许他们在自己的港口做买卖。”^⑭这“54年以来”大概就是后人认定汪、索谈判进行于1554年的最有力的证据,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在1554年之后。如果索萨在1554年已完成了和平谈判及其船队的商品交易,则决不会无所事事地在中国滞留一年多时间,到1556年才回到柯枝写信向葡国亲王及国王报告有关和谈协议之事。况且在中国交换贸易所得的商品与金钱,也要从速运回柯枝以及欧洲等地作新的交易,才能真正获利。所以无论为私为公,都绝对不可能容许索萨的船队在中国滞留一年。有关索萨对华的谈判和商贸活动是

在 1555 年 3 月至当年冬季的期间内完成的,当无疑问。

三、为汪柏与索萨的和谈辨诬洗冤

如前所述,由于中钹一些论著对汪、索的和谈存有不断累积的偏见与误解,最后形成了由指责索萨在谈判中是既隐瞒国籍,又依靠非法行贿的手段来骗取了汪柏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同意,发展到诬称索萨为了进行非法贸易,而行贿收买了由最低级的守澳官员到至高无上的皇帝的中国政府的各级掌权者。例如,黄启臣在引述郭棐《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条,指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汪柏徇贿”之说后,再发挥说:“其实,受贿者何止汪柏一人,上至皇帝、两广总督,下至普通的澳官,大都得到葡萄牙人的贿赂,而姑息他们的非法活动。”^{④5}如前文所分析,1553年的“徇贿”与葡人特别是与索萨完全无关。不妨试问,所谓“主持行贿的”索萨当时有多少本钱来从事对澳官以及皇帝等人的庞大贿赂呢?这显然都是纯属无据之臆说。从汪、索谈判协定的内容和其后实施的过程来看,中葡双方都是依照本国的法规行事,因此,是不能诬指为是葡方靠冒充他国加上非法贿赂而获得中方各级官员都姑息的非法走私贸易活动的。

汪柏是江西人,进士出身,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年)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任巡海副使,同年升任按察司按察使,可见其在巡海副使(即海道副使)之任是称职有功,为上方赏识的。^{④6}而与之同为江西人兼进士出身的丁以忠,1553年时任其顶头上司的按察使之职,其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与汪柏意见相左。故郭棐《粤大记》曾载:“时佛郎机违禁潜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从夷之。以忠力争曰:‘此必为东粤他日忧,盍慎思之?柏竟不从。’^{④7}在任何时代的对外开放问题上,都会有保守与急进的两派意见之争。在很多情况下,急进的开放派常会被当时或后世的一些保守派人士诬指为因贪污受贿而主张开放。丁以忠虽反对汪柏的开放政策,但并没有仗权欺

人,诬陷汪柏受贿,相反在其晋升右布政使之后,其按察使之职便由汪柏升任。正如黄晓峰之新作正确地评论汪、丁之争说:“相形之下,益显汪柏处事之坚决果断。”黄氏还指出:“汪柏在 1554 年(嘉靖三十三年七至十月)曾受提督两广兵部侍郎鲍象贤之命,身为海道副使,与指挥王沛、黑孟阳督兵追剿沿海劫掠的千余众“番贼纠倭寇”团伙,先后擒何亚八于三州洋,方武和夷目吒过啰等一百多人于潮州柘林海面,溺贼首徐碧溪。”^{④8}可见汪柏是智勇双全的儒将。其所消灭的番贼,自然包括葡国海盗,如吒过啰就是葡盗的头目。^{④9}而其“从夷”的潜往南澳的佛郎机,可能就是索萨的船队。事实证明汪柏文武并用,给愿意改恶从善的葡船以和谈通商的出路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对中葡双方以至全世界都是有利的。但是戴裔煊则在引述以上有关嘉靖三十三年七至十月(公元 1554 年 8—11 月)汪柏等剿寇之事后,即指责说:“就在这期间、这种情况之下,葡萄牙殖民者海盗商人同汪柏打起交道来,得到汪柏纵容允许,混入了澳门。”其后文在评论汪柏分化镇压中葡海盗的策略时又说:“显然是在何亚八等与番徒之间,采取分化离间的政策,抚番徒而剿何亚八等。结果把何亚八等镇压了,反之,对于番贼番徒佛郎机,则纵容允许缴纳税课,在诸港贸易”。

本来,郭棐只是在《广东通志》说汪柏是在 1553 年“徇贿”,在《粤大记》并没有说汪柏在 1554 年受贿,但 1731 年鲁曾煜的《广东通史·丁以忠传》在抄袭《粤大记·丁以忠传》时,便硬插入了“受贿”一词,使该句变成了“海道副使汪柏受贿从夷之”。^{④0}以致后来形成了对于 1552—1554 年间的所有涉及汪柏与番夷关系的资料,都曾被人曲解为葡人索萨行贿汪柏,入居澳门之证。有人甚至直指《日本一鉴》所说在 1554 年冒他国之名的周鸾可能就是索萨。^{④1}有必要再提请注意,只有本身无合法的贸易资格之国人,才需要冒有合法贸易资格的他国人之名。索萨既然要通过谈判来求取葡

人对华贸易的合法地位,则绝对不需要也不可能冒用他国之名来谈判。因为他国早已有合法的对华贸易地位,故不存在再谈判以开展合法通商的问题。况且,当时主动提出和谈的汪柏是明知索萨的船队,就是与原来臭名昭著的“佛郎机”人是同国的,加上“佛郎机”本来就不是专指葡国之名,含有对葡人误译误称的成分,所以双方就同意此和议确定改用新的葡国葡人的译名称呼,来给予愿意自新的葡商由非法转入合法的机会。所以索萨无须冒称他国人士以隐瞒其原为“佛郎机”的葡人之身份,而是与汪柏达成了为葡人正名实的协议。《日本一鉴》下文说:“岁乙卯(1555年),佛郎机国夷人诱使倭夷来市广东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机,同市广东卖麻街。”^⑫去年是佛郎机的周鸾仍然要冒充他国之名来引番夷,至1555年则是周鸾让倭夷扮作佛郎机夷,此一变化,可视为是汪、索谈判为葡人正名合法化的直接反映。只是郑舜功不明其中为葡人正名之妙,仍误用佛郎机夷指称葡人而已。

还须要着重说明,汪柏并非先受贿赂然后枉法私自让葡人入居澳门的。据索萨的报告所述,是在汪柏按条例法规与葡人谈妥了中葡友好通商的协议之后,才出现汪柏的下属官员受过一些款待或赠礼之事。现虽难核此事有无,但即使此言属实,其作用也不能影响已谈妥的和约,而在于影响其后中国官员对有关船队是次所载运入广州的商品货物的检查与征税。据说有些葡商因此而隐瞒了货物的数量少交了税,得益甚大。由于索萨之言本身含糊不清,把用于不同目的之支出混在一起报告,其目的是借此向葡王申请回报奖赏。但已被一些未看原文的论者不加分析,就硬指为是汪柏受贿,从而纵容葡人入居澳门之证据。^⑬

同时,有充分证据表明,在1557年之前,也就是汪、索和约未正式生效以前,中国官方始终没有纵容葡人非法进入澳门居留。例如格雷戈里奥·龚萨雷斯神父在1554—1556年曾与一些教徒在澳门建草房非法居留,每年都

因为不跟其他人一样随船离开而被中国官方拘囚兼拆屋,到次年再有葡船来才释放。“到了1557年,中国人第一次不再强迫我国人拆毁‘在称为澳门的大陆尖端上’建造的窝棚”。^⑭所以,伯希和认为平铎的信件“亦不过证明澳门葡萄牙人侨居地在1556年尚未存在而已,无论如何,澳门在1554年前尚无葡人侨居地。”^⑮所以,前述所有指责汪柏及中国官员因受贿而容许葡人在1557年以前入居澳门之说,都是应当彻底扫除的不实之词。^⑯

综上所述,可知澳门开埠之功,实非葡人所能独占。中国方面不仅在于主动提供了一块可资长期发展的风水宝地,而且在决策的主导、人力物力的投入和建设的规划控制、发展的和平安全与成果的捍卫保护等方面,都是以中方为主为先,葡方为客为后的。同时,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古代中国(也许是所有古代远东亚国家)唯一一次在打败西方欧洲人的情况下,以宽大的政策与败方定立的和平通商条约。它开始了由明末到清中叶的1840年以前,中国对西方各国既可以说“不”,也可以要他们说“是”的历史时期。●

(承蒙澳门文化司署、澳门海事博物馆提供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刊物和书籍,供本作者研究参考之用,特此鸣谢!定稿于1999年2月。——作者)

①参见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9—23页,澳门基金会1995年。

②参见伯希和《澳门之起源》,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五篇39—51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年。

③《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云:“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浔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谭按:指葡萄牙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



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避之,遂专为所据。”明《熹宗实录》卷六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条按语说:“先是,暹罗、东西洋、佛郎机诸国入贡者,附省会而进与土著贸迁,设市舶提举司税其货。正德间,移泊高州电白县。至嘉靖十四年,奉指挥黄琼纳贿,请于上官,许夷(侨)寓濠镜澳,岁输二万金。从此雕楹飞甍,栉比相望。”前人或以为《熹宗实录》所载较《明史》所载较早且正。依笔者之见,《明史》较正之点,在于从入贡诸国中删除了佛郎机。又有人指责《明史》记市舶司移于电白及濠镜为误说,(见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施存龙《澳门港正式对外开埠问题考辨》,载《文化杂志》第三十三期67页,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其实,《明史》及《熹宗实录》两者的原文虽有“移于”与“移泊”之小异,其意都只是说各外国商船停泊的船口先移于电白县,后移于香山濠镜澳,而非指“市舶司”这一衙门的迁移。以主修《明史》的万斯同的才识,既能正《熹宗实录》误入佛郎机为其时入贡国之失,则断不会把泊口之迁移误改为市舶司之迁移。清初史料,多同时沿用了《明史》及《实录》之说,而今人亦多有把两者作为同误而加以批评,足证两者之意是相同的。例如,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澳蕃篇》起首说:“明初互市广州,正德时移于电白县,……”赵春晨于电白县句下加注说:“此言中外互市地点‘正德时移于电白县’,系沿袭《明实录·熹宗实录》(修撰于明化末年)和《明史·佛郎机传》的错误说法。实则中外互市地点从未移于电白县……。”(见赵春晨《澳门记略校注》113页,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可见张汝霖等所理解的《明史》的“移于”与《实录》的“移泊”都是指“互市地点”(也就是外国商船停泊的商贸港口)的迁移,并非指市舶司的衙门驻地的改变。因此,并无错误可言。又《澳门记略》下文接着说:“嘉靖中又移于濠镜者,则有若暹罗、占城、爪哇、硫球、淳泥诸国;其后筑室而居者,为佛郎机”。这是正确沿用

了《明史》之说,把佛郎机排除于最早移泊于濠镜的各国之外。又《澳门记略·官守篇》更明确说:“(嘉靖)十四年,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船口于濠镜”,这是把《明史》的“移于”与《实录》的“移泊”正确地综合解释为“移船口于”。下文又说:“三十二年(按:约公元1553年—1554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茆舍,商人弁奸利者渐运瓴甍椳角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这也是在引述《明史》之说的基础上加以的正确补充。这使得我们进一步明确,在嘉靖三十二年托言借地晒货物而登陆濠镜地——澳门半岛的蕃舶外商,亦非葡人。因为“佛郎机遂得混入”,是在这些外商上岸晒货和先后建了茅草房及砖木屋之后发生的,这就更具体说明葡方资料说葡人是在1557年才开始到澳门定居之说是准确的。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五年版)69—70页修补了西方学者强克斯脱(Ljungstedt)及徐萨斯(jesus)的1557年说,主张“葡人之居澳门,开端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而确定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传〉笺证》69页则说葡人最初混入澳门是在1553年,这都是对前述史料的一大误解。后人多沿此类误说,直指托言上岸晒货的“蕃舶”为“葡萄牙商船队”。(见同前赵氏书65页)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42—43页、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年,此书原为作者1971年的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23—25页也都调和1553年及1557年两说。费成康虽曾正确地指出濠镜于1535年被广东官府辟为进行对外贸易的洋澳,其对象是东南亚商人,而葡萄牙人是被驱逐的。其误点也是把经明政府批准的葡人入濠镜市易的始年定在1554年。同时又把最初包含整个珠江口各港口的濠镜地区,理解为后来只指澳门半岛的濠镜,(见《澳门四百年》12—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因此,

受到了施存龙的质疑批驳。但施氏否定其时的濠镜地区已被辟为国际贸易的港口市场, (其说见同上施氏之文 68 页) 则笔者不敢苟同。又周景濂认为嘉靖三十三年汪柏所批准入居澳门的蕃舶外商为葡人, 其旁证之根据是“《广东通志》卷二四三官绩录所引《粤大记·丁以忠传》谓: ‘丁以忠为嘉靖七年进士, 历官至广东按察使, 时佛郎机夷人违禁, 潜居南澳, 海道副使汪柏怂恿之, 以忠力争曰: 此必为东粤他日忧, 盍再思之? 柏竟不从。寻擢布政使’。”(见同前周氏书 68 页) 笔者认为: “南澳”本为粤闽交界处的一个广东的海岛, 不能硬说成是葡人入居澳门之证。尤塞利斯也认为: “‘南澳’包括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而不专指澳门。”(见《澳门的起源》30 页, 澳门海事博物馆 1997 年) 费成康已曾指出: “这条史料至少是不很准确的。”(见同上《澳门四百年》20 页)

④见同上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4 页。参阅同上注林子升书 24 页、同上伯希和之文。又圣塔伦子爵(Viscond de Santarém)于 1845 年起草的文件说: “一五五七年, (据我们的使者所述), 应中国人自己的要求, 葡萄牙人获得了广州官吏准许其在澳门经商的许可, 并给予其往广州的互市的权利”。见同上尤塞利斯书 27 页。

⑤见同上注施白蒂书页。

⑥见费成康书 12—19 页、施存龙之文 63—72 页、黄晓峰《澳门开埠时期的历史观察》(载同前《文化杂志》三十三期) 73—80 页。

⑦参考张天泽著, 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106 页, 中华书局, 香港, 1988 年。而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 1995 年) 44 页所引之译文略异。

⑧关于汪柏与索萨的谈判时间过程, 应以索萨 1556 年 1 月 15 日于柯枝致路易斯亲王之信所述为准。该信首先提及其是“乘坐一艘商人的船只去了中国”, 可见索萨的身份只能是前往中国的商船队的首领。J. M. Braga 称之为“葡萄牙商舰舰长”(见同前《文化杂志》第一

期 116 页) 是对的。而周景濂称之为“为葡萄牙远征日本舰队提督”(见同上注周氏书 59 页), 谭志强称之为“葡萄牙中日船队总司令(大船长)”(见《澳门主权问题始末》65 页, 永业出版社, 台北 1994 年), 这些都可能是根据索萨 1561 年 1 月 16 日信所提及其后来对日本远征之事, 而加于 1553—1556 年的索萨, 显然是错误的。其后索萨又说: “去年(1555 年) 三月我就到该地(按: 指中国广东珠江口) 过冬”。在下一段追述在中国谈判的过程时又首先说: “我为中国之行花了三年。”当他追述完谈判过程后, 就在信的第七段讲到“启程离去”的情况。因此, 可以断定索萨是进入中国的第三年, 才在 1555 年的 3 月至冬季在广东珠江口期间, 接受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发出的和谈命令, 并完成了有关谈判和商业买卖。由于当时从广州回麻刺加, 要靠 10 月—2 月的季候风, 行程约需一个月(参见同前罗理路书 22 页), 而由麻刺加至印度的航行, 通常是在年底开始。(参见同前书 74 页) 所以, 索萨当是约在 1555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离开广州返航, 至次年 1 月回到柯枝, 不久, 就致信路易斯亲王并试图通过他向葡王报告有关是次中国之行及所达成的和平协议。据尤塞利斯说: 索萨此信之“原件藏于葡萄牙里斯本东塔档案馆内(Gaveta 2, Maco 10, Nº 6 da reforma”, ff. 160—165v)。并首次由若尔当·德·弗雷塔斯(Jordão de Freitas)发表在《葡萄牙历史档案》(里斯本, 1910 年) 第八卷。后来, 布拉加在《中葡第一项协议》(澳门, 1939 年) 中再次登载此信, ……布拉加还将此信作为《西方先驱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香港葡萄牙学会会刊, 1949 年 9 月) 一文的附件。”(见同前尤塞利斯书 42 页) 笔者所见较早而接近全译的中文本, 是王伟根据 J. M. Braga(布拉加) 编注的《第一次中葡和约》的“附录”转译的, 载于同前《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一期 116—119 页, 1987 年第二季度版。葡国学者 Rui Manuel Loureiro(罗理路, 又译洛瑞罗) 的“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澳门

寻根》的“文献之三”，就是此信的古文版的注释本，澳门海事博物馆于1997年同时出版了此书的葡文本及其中译本(Chen Yong Yi译)。而美国学者W. Robert Usellis(威·罗伯特·尤塞利斯)的硕士论文“The Origin of Macao”(《澳门的起源》)之“附录一”也全文刊载了此信，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年同时出版了此书的英文本及其中译本。又吴志良的《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此书为吴氏的博士论文略加修改而成，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版的附录一：“索萨《广东国及广州城海道遣人议和》”据说是转引自金国平对此信的“最新全译本”，而金译本原载于其著《莱奥内尔·德·索札与汪柏》文中(见《澳门研究》第七期122—143页，澳门基金会1998年)。整体比较而言，诸中译本应以罗理路之本为优。故上文所引述是根据罗理路本，参考别本异说，下文不注同此。索萨的信说：“这次他们派人来议和并商定税金，照往常的习惯，我同大家商量后，马上同意了这个建议，大家都认为这是天主和陛下之赐……”又说：“广州城和王国的海道，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地位相当于海军司令，各海港口的一切事务均由他掌管，商务也管，军务也管……这次议和与议税是他下令的。”可见和谈及其主要内容都是由处于强势的主人中方预先决定了再向葡方提出，而处于弱势的客人葡方只能作为幸运的恩赐全盘接受。因为以前葡人的为非作歹已受到中国的严惩打击，这次索萨的船队已事先得到将再次受到中方军事打击的警告，因此表现得十分守法合作，完全接受了汪柏的和谈命令，否则定然难逃被消灭和驱逐的命运。

⑨布拉加的《第一次中葡和约(或译：中葡第一项协议)》曾登载此信，见同上注。谭志强称此协议“也可能是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所达成的第一份和平条约”。见同上注谭志强书页。

⑩由于以往的中国学者诸如周景濂、戴裔煊、费成康、林子升、黄启臣等以及最近的一些学者的论著都没有研究索萨的原信全文，而是

辗转从西方的徐萨斯、布拉加等人的论著所引述的不太准确的片段来立论，所以出现了很多片面讹传之说。详证见下文。吴志良的《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虽然在附录中转载了金国平对此信的最新译本的全文，但其内文有关此信的引文及研究既零碎而且并非根据金译本之文而作的，故其见仍不出前人之窠臼。见其书33页。

⑪原见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神父(Fr. Caspar da Cruz)于1570年出版于葡国埃武拉的《中国概说》第23章，中译参见同前《文化杂志》三十一期74页。

⑫以往有论者把葡人入居澳门之年定于1552—1554年，是粗疏的臆断。例如，较早是前述费成康书18—19页引述了郭棐的“汪柏徇贿”之说、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的1554年佛郎机夷船冒他国名骗汪柏之说，再加上从布雷格(Braga)书引载的索萨之信的片段，及伯希和《澳门之起源》所引述的克鲁斯《中国概说》的片段，就误断汪、索“会商于1553年下半年，当时索萨隐瞒了国籍，对汪柏进行了贿赂”。其后，同前黄启臣书45页也有同类误说：“经手为索萨行贿汪柏则是客纲周鸾。郑舜功《日本一鉴》《海市》条说：‘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佛郎机夷船来泊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客纲，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诬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根据以上葡中两方面的资料记载，均说明当年葡萄牙人的确是贿赂汪柏等中国官吏而得以进入澳门居住的。”又陈树荣所撰《澳门总览·史地篇·历史沿革》也有同类的误说，他甚至说1553年的汪、索会晤是“隐瞒了国籍的索萨贿赂汪柏”(见该书第二版11页，澳门基金会1996年)。其实，这都是对汪柏等人的天大冤枉，必须加以剖白翻案。因为黄氏上引两段葡、中两方面的资料，均无一语涉及行贿受贿之事。亦无只字提及澳门，何以能够说明“当年葡萄牙人的确是贿赂汪柏的中国官吏而得

以进入澳门居住的”呢?而在汪、索谈判(按:如上注文所述,这是汪、索都分别委派代表进行的谈判,故不能说是汪、索会晤)前的1554年的资料只是说明,在还未得到葡国政府批准实施1555年的汪、索口头定下的友好通商协定之前,有的葡船已擅自入泊广东海上,故此只能与别国的“番夷”合谋,在海上用小船收买别国的“番货”,假冒他国之名来与中国贸易。所谓“诳报海道,照例抽分”,是指冒用他国之名,按照中国法例原来所规定的他国商船的税额来“抽分”。因此,“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这只能说明汪柏之误在于没有识穿他们冒认别国商船来入市的诡计骗局,并不能说明汪柏是明知他们是葡船,因受贿而违犯法例让葡人通市,更不能说明葡人已借此机会进入澳门居住。因为原文只提到此次葡人冒充他国番人通市是“市于广东城(按:即广州市)下,亦尝入城贸易”,根本不涉及入居澳门的问题。

⑬参见同上④⑫各书文。

⑭索萨于1556年1月15日致信路易斯亲王,目的就是请葡王正式批准实行这一协定,故最快也要在1557年才能得到批准实行。因此,施白蒂将索萨与广州官员的口头协议之时系于1554年虽有细微误差,但是在1557年条下说:“莱奥内尔·德·索萨获准确定先前有关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当时称蠓镜)的协议”(见同上④书12、15页),在时间上是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进程的。但在内容上则仍有大误,因为先前的协议内容并不涉及葡人的定居澳门的问题。这点笔者上文已作论证。

⑮参阅同前罗理路书19—23页。

⑯正如尤塞利斯指出:“有一种观点称,葡萄牙人于一五五七年移居澳门时,立即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得到保证,并据此开始建立永久的居留地。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档案中没有找到任何依据。……但实际的情况显示出,葡萄牙人早期处于徘徊与不稳定的境地。看来,可以断定,他们最初获准去澳门是基于同他们早先在上川和浪白澳经商时相同的情况。”见同前

尤塞利斯书39页。

⑰关于中国政府正式向葡人征收澳门地租的开始时年,有各种异说:(1)1570,见同前施白蒂书17页;(2)1572年或1573,见同前费成康书29页;黄启臣书51页;(3)1582,见同前费成康书30页所转述;(4)1581,同前林子升书43页转述;(5)1551,同前林子升书页转述薛韞《澳门记》;(6)1573,同前周景濂书71页所录徐萨斯之说。未能尽录,容后续文再论。本文所据的“隆庆初”说见《清史稿·邦交志·葡萄牙》。

⑱见同前周景濂书59页。

⑲见同前伯希和文46页。

⑳见同前戴裔煊书70页、费成康书18—19页。

㉑见同前《文化杂志》第一期16页。

㉒见同前费成康书19页。

㉓同前黄启臣书44—45页。

㉔见同前《文化杂志》三十一期73—74页。又同前伯希和文46页所译也有些错误。

㉕见同前⑲书44页。

㉖参见同前《文化杂志》中文版三十三期75页黄晓峰之文。

㉗转引同前戴裔煊书72页。

㉘见同上⑲书75—76页。

㉙见同⑲书69页。

㉚转引自同上尤塞利斯书29页。

㉛同前尤塞利斯书19页引述日本藤田丰八之说、林子升书19页。

㉜转引自同上⑲之书页。

㉝见同前戴裔煊书72—73页、谭志强书66—67页、黄启臣书44—46页,等等。

㉞见同前罗理路书18页、140页。

㉟见同上⑲书45—46页。

㊱近读黄庆华《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张德信《葡萄牙人初寓蠓镜澳的历史考察》等文仍沿旧说,独有刘伟铿的《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发此新见。

责任编辑:郭秀文



当代澳门话剧: 主体化和多元化

□ 赖伯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10)

[关键词] 澳门话剧 剧社 演出

[摘要] 澳门话剧始于辛亥革命前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长期受到西方和香港的文化艺术影响的同时, 在地缘、人缘、文缘上与祖国内地有密切联系。半个世纪以来, 澳门话剧从沉寂到复苏、从传统和单一化到探索和多元化, 曲折而顽强地走向繁荣。

[中图分类号] I0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8-0071-05

澳门虽是地处边陲的弹丸之地, 但是它与戏剧艺术结缘的历史, 却是颇为久远的。早在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589年), 也就是世界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1564—1616年)从事创作的年代, 它的社会生活就被写进著名戏曲家汤显祖(1550—1616年)的传世力作《牡丹亭》之中。但是, 在澳门舞台上长期演出的都是来自广州和香港的“省港班”所演的粤剧, 而作为西方舶来品的话剧在澳门舞台上演的历史, 却要晚到辛亥革命前后才揭开序幕。澳门话剧历史虽短, 其影响之大也不如命运和它相似的香港话剧, 但它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澳门曾是以话剧为工具鼓吹辛亥革命的重要地方, 它也曾为支援神圣的抗日战争而大声疾呼。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西方文化艺术的输入、香港文化艺术的影响, 它与内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 以及在地缘、人缘、文缘上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 澳门话剧走着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半个多世纪以来, 澳门当代话剧发展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沉寂到复苏、从依附生存到独立发展、从传统和单一化到探索和多元化。

从沉寂到复苏

抗日战争期间, 澳门由于葡萄牙与日本的

特殊的国际关系而处于中立状态, 因此, 内地和香港都有不少剧人和团体集中在澳门开展话剧运动, 澳门剧坛上曾经热闹一时。抗战胜利后, 外来的剧人和团体先后离开澳门, 澳门没有一个自己的专业话剧团体, 只有一个海燕舞台技术社为戏剧演出作后台服务, 他们以“回到后台”为口号, 协助到澳门演出的剧团、学校业余剧社演出时装饰舞台, 主要成员有赵健、黄新、钱拾粟、王强等人。1946年以来, 该社才正式成为以演戏为主的海燕剧艺社, 但演出时断时续, 不是很正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 1948—1961年, 曾先后演过《雷雨》、《林冲夜奔》、《夜店》、《梁祝》、《搜书院》、《屈原》(其中一幕)等, 其中的《林冲夜奔》曾四度公演, 1961年以后停演。海燕剧艺社演出虽不多, 但在十多年沉寂的澳门话剧舞台上毕竟是弥足珍贵的声音。当时, 在澳门剧坛中, 还有一个业余戏剧组织——工人文娱组, 创办人是陆昌、陈振华、李光辉、郑虬等。该组织主要是上演粤剧和粤曲, 也演话剧, 上演过反映失业工人贫苦生活的创作剧目《出路》。①

澳门的学校戏剧演出活动向来比较活跃, 在这个时期, 许多中学的师生都开展过话剧演出活动。1949年, 濠江中学演出过《七十二家

房客》、《十五贯》、《河伯娶妻》、《梁祝》等剧。1946年岭南中学组成了侨联剧社,50年代末组成中华教育会康乐部剧组,都开展过话剧演出活动。1956—1957年,“教师戏剧”活跃起来,由梁寒淡、邱子维等几位教师演出了改编的莫里哀名剧《迷眼的沙子》,曾轰动一时。澳门的天主教会学校的业余剧团,如粤华中学剧团,由罗灿坤、甘恒等教师开设了戏剧训练班,招收了60多名学员,进行导演、演技、化妆、布置、编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为培养澳门本地的戏剧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该团还上演了翻译外国戏剧《风雨归舟》、《巴黎之幼童》、由《圣经》部分内容改编成的《亡羊》、创作剧《路》、《荆棘丛中的菩提》等,并参加了1957年开始的“港澳公教学校校际戏剧联赛”,曾赢得了两届冠军。除了用广州方言演出的话剧外,1957年前后,还出现了英语歌剧《毋亡我》,连演了七、八场,表明这一新品种也颇有市场,对于活跃澳门剧坛很有促进作用。^②

这个时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澳门虽未被卷入战争漩涡,但也受到影响,经济和文化都未完全恢复。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歧异,使澳门话剧与内地有所疏离,以致整个话剧坛还不够活跃,演出团组不旺,剧本创作更为冷落。据查,只有以笔名“晶晶”创作的一幕二场的喜剧《归来燕》,曾在1945年9月的《迅雷》周刊上发表。此时期,澳门话剧处于逐步复苏的状态之中。

从依附生存到独立发展

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澳门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比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较为密切,特别是在思想文化上,澳门接受内地的影响比较深。60—70年代中期,澳门的话剧也明显地受到内地的话剧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刻影响。此时期较为活跃的剧团有工人文娱组发展成的工人剧团、中华教育会康乐部剧组、镜湖医院职工等的演剧团体。这些剧团上演的剧目主要有《南海长城》、《刘胡兰》、《阿翠》、《红梅花开》、《第三颗手榴弹》、《出航之

前》、《槟榔茨的秘密》、《年青的一代》,以及由当时内地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改编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期的澳门戏剧舞台对内地戏剧的依附性,从剧人到观众的政治思想文化与当时内地的政治思想文化潮流是趋同的。即使是创作的新剧,在创作的思想和方法上也颇受内地戏剧创作的影响,如发表在当时《红豆》杂志上的四个街头短剧:冬不拉的《咖啡与蛇》、而华的《“利是”的喜剧》、横眉的《拜山记》、楚竹的《车箱内》等,都是反映当时澳门各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警世教化的作用和意义。至于澳门戏剧工会成员编写的活报剧《幸福的时刻》,描写澳门戏院工会的工人们准备放映中共九大会议纪录片时的情景,旨在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歌颂工人阶级并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主义,^③这与当时内地的政治观点和文艺创作思想毫无二致,政治教育的文化色彩异常鲜明。

70年代中期以后,澳门周边环境发生了新变,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香港经济正在起飞,澳门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在起变化,澳门的话剧舞台悄悄地发展变化。从1975年起,新的戏剧团体不断涌现,原有的曾经停止了活动的剧团也恢复了活动,如出现了晓角话剧研进社、艺苗戏剧社、教区话剧社、澳门剧社等新成立的剧团。澳门剧社是1979年组成的,其成员主要是学校的教师,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业余戏剧团体。原来就颇有影响的海燕剧社也于1978年恢复活动,成员多是各界业余青年戏剧爱好者。1979年该社曾演出过《夜天堂》,是根据台湾一个剧本改编的,内容是反映台湾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命运。同时,它还上演过改编的《虚名镇》,内容是描写30年代英国一个小镇上发生的故事。^④中华教育会康乐部剧组也于1979年恢复活动,并先后上演过内地颇为轰动的《枫叶红了的时候》,以及《克宫魔影》,这些剧目是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紧跟现实政治形势的。此时期虽然仍有

不少剧目是搬演内地话剧的,但已开始上演了一些澳门人自己创作的本地题材的剧目,舞台演职人员也大多是澳门本地人士。澳门戏剧的本土性、独立性已有所增强了。这是澳门戏剧界取得可喜进步的标志。

80年代以后,由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内地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绩,西方的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如潮涌入内地,并引起各方面深广的变化,这些对澳门话剧剧坛也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澳门的剧团组织比较稳定,演出活动也较正常,80年代后期还成立了澳门东亚大学剧社。在这时期的戏剧汇演中,中华教育会康乐部剧组上演了根据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改编的《求婚二重奏》,澳门剧社演出了创作剧《法庭内的小故事》,海燕剧社演出了创作剧《杯中情》,晓角话剧研进社演出了创作剧《死巷》。这次汇演表明,澳门的创作剧目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本地的创作队伍是增强了,创作力量有所提高。⑤

80年代中后期,在话剧艺术形式上有所探索和创新,如晓角话剧研进社曾上演过《汤姆之死》、意念剧《戏剧路上》、《受薪者》,以及追求电影艺术效果的《虚名镇》、《玻璃》、《裁决》、《死巷》等剧目。东亚大学剧社也演过一些艺术倾向前卫的剧目。这些剧场现象表明,澳门话剧工作者已不满足于过去依附外地话剧的创作思想、方法和剧目的传统,而开始独立思考 and 进行探索 and 实验。晓角话剧研进社的李宇梁先生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澳门的戏剧已经过了“技术条件未成熟”的“实习期”,并经过“自我培训”之后,走向“独立期”,演出经验和条件都已日趋成熟了。⑥这是言之有据,切合澳门话剧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从传统和单一化到探索和多元化

进入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后,澳门戏剧的发展势头更为全面而迅猛。澳门话剧工作者的长期耕耘、我国内地和香港话剧新成就的影响,以及澳葡当局抛弃前政策的调整和对

话剧事业有一定力度的支持,使澳门话剧出现了前所罕见的繁荣兴旺景观。

首先,话剧团体显著增加。由80年代的4个剧团猛增至18个剧团:海燕剧社、晓角话剧研进社、澳门戏剧社、艺穗会、青苗剧社、澳门文娱剧社、慈艺话剧社、映剧社、东亚大学剧社、校园纯演社、朗妍剧社、晴轩剧社、面具剧社、梵音话剧组、十字剧社、曦戏话剧组、圣安多尼堂颐老之家、土生葡人剧团。这些剧团在成员结构上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学生和老年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员为多。

其次,本土的剧作家队伍日益壮大,本土题材剧作有明显的增加。这批剧作家有的是从70年开始成长的,有的在80年代以后才崛起,如周树利、赵天亮、李宇梁、许国权、谭淑霞、虞耀华、李盘志、高焕剑、莫兆忠、余慧敏等。其中,周树利是典型的戏剧“发烧友”,也是澳门唯一的职业戏剧家,他在澳门全面地全力推动戏剧工作的发展。他在创作上有剧作集《简陋剧场剧集》,收入了十多个剧本,其特点是题材多取自当地群众的日常社会生活,类型和风格多样化、教育意义鲜明。他还是戏剧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他建立起“澳门艺穗会招待所”,所址就是他本人的家,招待澳门、香港和内地的戏剧工作者。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澳门的老人戏剧运动和校园戏剧运动。

李宇梁是晓角话剧研进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社的荣誉剧艺总监。他又是创作力旺盛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作主要有独脚戏剧本《二月二十九日》、《男儿当自强》、《亚当 & 夏娃的意外》等剧本,它们分别反映了澳门当前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青年人如何担负起照顾自己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婚姻与金钱的关系,以及现代都市人的复杂甚至畸型的心态等等,颇有针砭社会时弊、催人向善的教化作用。《二月二十九日》一剧在参加1993年香港戏剧汇演和澳门戏剧汇演时,曾获最佳剧本奖和全场总体表演冠军等奖项。1996年,他的新作《澳门特产》参加了由澳门文化司署主办的“澳

门人、澳门事”剧本赛,荣获冠军,并于1997年在澳门艺术节中演出。他的独幕剧《请于讯号后留下口讯》,深刻地反映了澳门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各种复杂心态,荣获澳门第二届文学奖戏剧组第一名。

许国权的剧作有《我系阿妈》和《九个半钟之后……》等,前者反映澳门子女应如何正确对待父母等老一辈人的问题,在1992年的香港戏剧汇演中,曾获优秀剧本奖,后者则是一个艺术探索剧。

莫兆忠,是澳门戏剧界的新秀,也是澳门“新校园戏剧”的突出代表。他年轻而多才多艺,能编能导能演。他的剧作多是短剧,有《阿毛·我儿》、《子君的手记》、《树荫下的回忆》、《梦剧社》、《飞越自我》、《星星男孩》、《澳门狂想曲》等,是一位创作甚丰的青年剧作家。《星星男孩》在第七届全澳戏剧汇演中,曾获优异整体演出亚军、最佳创作剧本、优异演员及优异新秀演员等多个奖项。他还自费编辑出版《剧场月报》杂志,以及自办戏剧图书室,为本地戏剧工作者提供方便。

其他剧作家和剧本,还有高焕剑的童话剧《疯子伊凡》、赵天亮的《法庭内的小故事》和《相逢何必曾相识》、李志盘的《天使的控诉》、《超人之死》、《神奇女侠也移民》、《回到往日垃圾时》、谭淑霞的《谁言寸草心》、《幸运何价》、《我要奖学金》等。这些剧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层面,反映了作为现代都市的澳门大众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当今澳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等,从题材的撷取到创作方法和风格的表现,多富有写实性特征,较易引起读者和观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⑦

又次,演出的形式多姿多采、演出剧目的艺术流派纷呈。澳门话剧的演出主力,是以学校的师生和社会各机构团体的文员、公务员为主的剧团,以及老年人组成的剧团,其演出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有日常的舞台公演、有校际戏剧比赛、新秀剧场、话剧汇演、短剧汇演、独脚戏比赛、澳门艺术节等。这种演出形式的

灵活性和多样性也表明,澳门的话剧活动日趋活跃。这些群众性的戏剧演出活动,都有助于经常、持久地鼓励和支持澳门话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据统计,80年代末以来的近10年内,澳门舞台共演出过的话剧剧目约有141个,其中搬演名著36个、改编剧目25个、创作剧目80个(未公开发表和未公演者尚未统计在内),平均每年上演剧目14个。^⑧这个数目在澳门这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城市,为数不小了。它显示了澳门在近十年内,戏剧创作力量有显著的增强,同时,本地剧人创作的剧目数量大大超过了外来的剧目。

这些剧目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流派风格上,也是丰富广泛、绚丽多姿的。它们既有以周树利和澳门剧社、艺穗会等为代表的,以真实而本色地表现澳门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凡人琐事见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有晓角剧社、海燕剧社、东亚大学剧社等的前卫性的实验剧目。后者在戏剧观念、选材取向、表现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力图突破传统、超越自我、效法西剧、探索新路。如晓角研进剧社演出过象形剧《汤姆之死》、意念剧《戏剧路上》、《受薪者》;陈柏添导演过达达主义代表人物的名作《正正反反》、后现代主义戏《哈姆雷特机器》、表现主义斯特林堡代表作《鬼魂奏鸣曲》、残酷剧场式的剧目《屋内》等。^⑨这些剧目的共同特点是,注重艺术形式的探索,而对思想内容则比较轻视;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企图打破镜框式舞台,设置各种形状的舞台,或利用各种现成的建筑物作舞台或剧场;戏剧艺术结构散文化,不强调传统的戏剧矛盾冲突;戏剧时空的转换频繁而自由,融汇运用了许多象征、变形、隐喻、荒诞等艺术手法;还融进了戏曲、歌舞、电影等的艺术特长;运用了大量现代科技的声、光、电、化等学科的舞台装置,加强观众的视角和听角的感受,总之,努力地进行现代化的艺术包装。

1994年前后,澳门剧坛还出现了“新校园戏剧”的繁荣。澳门的校园戏剧历来都颇为活

跃,但是,“新校园戏剧”与传统的校园戏剧有明显的不同,它在题材和主题思想上,力图突破“高台教化”的局限,而以反映青年人的生活、追求诉说当代青年人的心声为目的,在艺术形式上为适应剧本主题和题材的要求,也努力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如注重形体语言、吸收歌舞的表演艺术因素,并且运用游戏形式吸引观众的参与,自然而成功地使台上台下的同龄人彼此沟通心灵,共同参与戏剧创作。慈艺话剧社、校园纯演集、朗妍剧社、晴轩剧社等,是这种“新校园戏剧”的代表性剧团,他们曾上演过《青春三面睇》、《上帝搞乜鬼》、《小王子》、《暖毛毛》、《阳光拍子机》、《澳门·我们》等剧目。^⑩

澳门话剧越来越频繁地对外交流,也使它走出蕞尔之地的澳门而进入广阔的戏剧天地。澳门的戏剧演出和学术交流以及业务进修、合作等活动,已扩展到珠海、佛山、广州、北京、香港、葡萄牙、英、美等地区和国家。

当前,澳门回归的脚步声清晰可闻,澳门话剧界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去年,由慈艺话剧社主办、澳门文化司署赞助,举办了“全澳公开独脚·对手戏比赛”,参赛剧目有《我和二叔旅行去》(林嘉碧、陈卓明)、《从来未发生》(邓颖隆)、《没有遗失的怀念》(李丽丽)、《武士妻子的自白》(徐嘉莉)、《病房内》(冯燕婷)、《蜡像》(方艳芳、邝天乐)、《早餐前》(梁碧红)等。经过评审,由王家慧执导的《病房内》获得最佳导演奖,《我和二叔旅行去》获得整体演出奖,冯燕婷、李丽丽、梁碧红获得优异演员奖。在剧本创作方面,也举行了两届“全澳分开独脚戏剧剧本创作比赛”,去年举行了第三届比赛,陈世平的《爷爷细路时》被评为最佳创作剧本。

今年澳门的戏剧活动尤为活跃。3月21日起,由澳门艺穗会及澳门剧社主办,由澳门文化司署及何厚铨赞助,将举行“短剧公演九九”,已有20个剧目报名参演。澳门还首次举办了“澳门艺穗一九九九——欧洲小剧场视窗”的演出活动,以欧洲小剧场演出为主题,同

时邀请内地和台、港的话剧界人士参加,澳门本地的剧团如石头公社和晓角研进剧社等,将以新创作的剧目参加此次活动。^⑪

从澳门目前话剧舞台的发展势态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广泛持久的群众性:澳门社会各阶层中,都长期存在着不少戏剧“发烧友”,他们中有学校的师生,社会上的文员、公务员、各行业职工等,在职或已退休的老人;还有不同国籍的各种人士,如中国人、葡国人、土生葡人、法国人等。他们都长期自发地无偿甚至出资参与话剧活动,组织起各种剧团开展活动,其群众性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为其他地方所罕见。

日益鲜明的本土性:进入80年代以来,澳门人创作的本土题材的剧目愈来愈多,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戏剧界的本土意识日益增强,戏剧本土化的创作活动日益频繁,效果也愈益显著,本地的创作和表导演人才越来越多,剧目中的本土题材所占比例逐年增加。1996年,澳门文化司署组织了“澳门人·澳门事”的创作比赛,鼓励澳门人创作和表演本地题材的剧本,奖励了一批优秀剧本,如《澳门特产》和《香口胶情缘》等。在第八届澳门戏剧汇演中也出现了几个注重“澳门特色”的剧目。澳门戏剧创作和表导演人才的本地化、剧目题材的本土化,反映了澳门话剧本土性的确立和加强。

日趋繁富的多元化格局:由于澳门对外来话剧艺术精华和新颖的观念与方法,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澳门话剧界的戏剧观念发生新变,艺术胸怀有新的扩展,因而中外古今的戏剧观念和艺术方法、手法,都得到了广泛的吸收、融汇、运用,各种艺术流派交相辉映。

澳门的话剧也存在不如人意之处,创作力量还不够强大,短剧较多,长剧不足,有历史感和思想深度的长剧尤为缺乏。这种情况与历史悠久、地理位置独特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澳门,是不大协调的。我们深信,这些不足和问题,在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以后,将会有更多的条件和机遇予以改进,澳门的话剧剧坛将

谁驾玉 入轳底 辗破琉璃千顷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和流传

□ 宋若云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脉望馆 古今杂剧 戏曲

[摘要] 本文梳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与私家藏书的关系, 并透视戏曲专家对它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08- 0076- 07

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 恐怕就数戏剧的命运最乖戾。中国戏曲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产生, 但直到 12 世纪才有剧本留下来。官修正史的《艺文志》均不屑于记述她。

尽管如此, 植根于民间沃土的戏曲艺术仍然顽强地生长着, 并在元、明两代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 为我们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戏曲艺术宝库, 我们可以开始邈远的追索。

一、《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经过, 足可看作一部中国藏书史略。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是中国藏书史上一个内蕴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大藏书家黄尧圃

说, “世之好书者绝少。好书而及词曲者尤少。或好之而无其力, 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 好矣, 而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①这其实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条件: 既要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收集书籍, 又要有极高的文化素养校勘、甄别书籍。尽管中国古代历史对藏书家的选择过于苛刻, 但我们仍可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本世纪 30 年代发现的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戏剧总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其意义不亚于敦煌石室或汉简的出世。而考察她的流传经过, 几可把它看作一部古代私家藏书史, 其间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

几夕无寐, 楚天云断。

会呈现更加独特多姿的新风貌! ●

①②③⑥郑炜明《澳门的戏剧活动和作品》, 《戏剧艺术》, 上海戏剧艺术社, 1997 年。

④明《七十年代末的澳门戏剧活动》, 《南国戏剧》, 中国剧协广东分会出版, 1980 年。

⑤鲁茂《介绍澳门话剧汇演》, 《南国戏剧》, 中国剧协广东分会出版, 1983 年 2 月。

⑦⑧⑨⑩穆欣《九十年代澳门戏剧状况》, 《戏剧艺术》, 上海戏剧艺术社, 1984 年 4 月。

⑪《澳门日报》1999 年 2 月 28 日。

责任编辑: 陶原珂

“脉望馆”是明代藏书家赵琦美的藏书之室。按赵氏“家乘”，琦美原名开美，字仲朗，号玄度，又自号清常道人。嘉靖癸亥（1563）年生，以父（用贤）荫，历官刑部贵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启甲子（1624）年卒。赵琦美生平“损衣削食，假书缮写，朱黄雠校，欲见诸实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用贤）序而琦美刊之。其题跋自署清常道人。有藏书之室曰脉望馆。官太仆臣时，尝解马出关，周览博访，上书奏条方略，随例报闻。随以使事归里。著有《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容台小草》、《脉望馆书目》……”。

赵琦美的藏书多得自北方，所校书也以在北方为最多。赵琦美钞校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剧本集，就今所见他的跋语看来，当始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每月都校对好几本，以万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最多。同年于“内本”之外，又见到了山东于小谷所藏杂剧，此后二年时时都在校抄“内本”及“于小谷本”，这些剧本的钞校至少用去了三年时间。于“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贺待漏之暇校完。”（《连环记》跋）

据郑振铎先生推测，赵琦美大概是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二书，然后借了“内本”、于小谷藏本来钞校的。对于有刻本的，他就以“内本”或“于小谷本”校其异同；对于只有钞本的，则以原本和钞胥所录的复本校对一过。故“钞本”只是改正了几个错字；而对于“刻本”的校勘则费力较多。在把“内本”与“于本”钞录完毕之后便把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拆散了，和那些钞本合钉一处，成为100册，其排列次序依《太和正音谱》的次第，并对杂剧名目和作家进行考证，附于后。

妙意有在终无言。

“清常歿，其书尽归牧翁。”②牧翁即清代大藏书家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清初为礼部右侍郎，旋归乡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说他“早岁科名

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越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货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几埒内府。”其绛云楼藏书驰名天下，可惜被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不慎焚毁。

然绛云楼一烬之后，“凡清常手校秘钞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③牧斋未在书上留下痕迹。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百册宝库在赵琦美死后流落人间，归钱谦益所藏前是否还曾经过他人之手，已不可知。但钱谦益把她悉数赠予其后人钱曾，却是有案可稽的。钱曾字遵王，是钱谦益族孙嗣美之子。嗣美好聚书，书贾多挟书潜往。子四人，次名曾。曾好学，藏书益富。钱曾在《寒食夜梦牧斋》诗自注中说：“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玄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

钱曾抄录了全目，列之《也是园书目》中，并曾略加排比过，而对于原书的次第则不曾改动。在《三醉岳阳楼》剧中有遵王手书三行，是补抄原书残损处的。

钱曾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振宜。在《述古堂书目》中，钱曾写道：“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季振宜字洗兮，号沧苇，顺治丁亥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钱曾不止一次把某些宋版书或钞本卖给了季振宜，在《读书敏求记》中说，“余昔藏徽藩芸窗道人五彩绘画本，为季沧苇豪夺去。”

谁会山公意，精爽此销磨。

对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用过很大功夫的，还有一位何焯。何焯字心友，号小山，尝自署何仲子，为何焯之弟。何焯既好书，也勤于校。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其中有李开先钞本元剧及李开先旧藏元槧本的杂剧数十种，故每以元刊本校此书。他以朱笔密校脉望馆本与元槧本不同处，有的简直是等于补写了全剧。在他的跋文中可见其用力之勤：

雍正巳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槩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中。(《范张鸡黍》跋)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钞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钞本改正补入。录钞本不具全白。白之谬漏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王粲登楼》跋)

何焯所藏曲、《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以及《元刊杂剧三十种》、《琵琶记》等,后均归于黄丕烈“士礼居”。

水石精神出,江山气色来。

黄丕烈字绍武,一字绍甫,号尧圃,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其藏书之富,质量之精为当时独步。他的书多得自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王氏孝慈堂等前辈有名藏书家,遇其他名本也尽量收藏。郑振铎先生性喜藏书,对黄丕烈藏书的艰辛,颇为同情:“尝读黄尧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像有些藏书家崇儒重经,而是非常重视文集的收藏,也非常注意收藏小说和戏曲。许多小说列入《士礼居丛书》。他开辟的“学山海居”,专门收藏词曲,大量有研究价值的元曲戏曲遗产,都靠他而得以留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能流传至今,黄尧圃功不可没,黄氏对此书亦有跋。

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后,此书归汪闾源所有。“黄丕烈藏书归长州汪士钟。”(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在《郡斋读书志序》中说,“闾源英年力学,读其尊甫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采者。于是厚贾收书。不一二年,藏弃日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每册之首均钤有汪氏印章。汪氏散出后,此书归赵氏旧山楼。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约在民国初年,《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到了丁祖荫之手,但丁氏却布下疑云。下面是其跋:

“初我曾见海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所谓元刊明刊杂剧曲目,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并注明阙失。案也是园剧目除重复外系340种,尧甫所存为266种,实阙74种)《古名家杂剧》目录(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以上四目剧本,俱也是园目所载,为此书所阙。并也是园原目朱笔标著者次笔)及汪氏录清现存目录14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239种,又阙27种)。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从这篇跋中看,似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在旧山楼之后便“不知流落何所”了。而丁氏的老友新陈在《书志学》(1938年11月)上撰文说:

“丁君初我,余老友也。十年前尝撰古今杂剧跋,刊登某杂志。学者相顾惊异,幸此书之犹在人间也。维多方探询,终不知此书所在。余与丁君瓶借频频,每问及此书,则顾而言他。盖终身视为枕秘,未尝举以示人也。自丁君逝世,家属侨寓吴门,去年骤逢丧乱,所藏尽散。”

可见丁氏所云“匆匆归赵”,“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世之谈。此书在苏州沦陷之后散入民间“落骨董商之手”(新陈语)。

二、郑振铎的精诚之至,终使《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得归其所。

郑振铎在读到丁初我的跋文后,立即开始了多方搜求。他写道:

“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64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但丁氏只是说,阅过后便已交还给旧山楼。”

尽管在查问丁氏乃至赵氏后人诸多人氏

后均无所获,郑振铎仍不灰心,坚信此书必定还在人间,“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果然,精诚所至,此书竟然被郑氏发现了!他在此书的跋中生动地描述了发现的经过:

“在民国 27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发现 30 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钞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钞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极力的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

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宝”总有办法可以购下。我立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在汉口的卢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可以购得。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虽然在战争中,我相信这二三千金并不难筹。”

然而好事多磨。当郑振铎第二天再来到青阁书庄时,杨寿祺告知,唐某处的 30 余册,已以 900 金归之古董商孙某了。

由于陈乃乾与孙某相熟,郑振铎便托他与孙某商议问价,议价结果是 9000 金成交,先付千金定洋,20 天内全部付清。郑振铎写道:

“我有充足的勇气措置这事;我接受了契约。这书的价值绝非数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贾的把‘书’和‘金钱’作相等的估计。……依赖了同情与友谊,我居然筹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内将书取回。”

对此,郑振铎颇有感慨:

“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是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

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④

三 300 年来的秘册显出于世,使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平添了“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

郑振铎在第一次见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原书时,对这些“秘册”的面貌作了描述:

每册有王闾源藏印。首册有黄尧圃手抄目录,多至三十九页。几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笔及跋语。何小山也曾细细校过。钱遵王却只留下了数行的钞补的手迹。董云宰也有跋四则。到了这时,此书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来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实应作脉望馆钞校本。黄目总名作《古今杂剧》,不知为谁氏所命名。除刻本外,钞本多半注明来源,或从内本录校,或由于小谷本传抄。刻本只有二种,一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一为《息机子杂剧选本》。此书的钞校为万历四十二至四十五年间,恰在臧氏《元曲选》刊行于世的时候,故所收独不及臧选。

这 64 册的宝库包含钞本、刻本的元明杂剧 242 种,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即使其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本相同,但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

就今日所存的 242 种杂剧计之,刻本有 70 种,余 172 种杂剧全是钞本(按:郑振铎计前者 69 种,后者 175 种)。在刻本里,有 15 种是息机子本,余皆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今所见《古名家杂剧》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第一集 40 种,第二集仅 20 种。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且诸家名目皆以之为陈与郊编刊。⑤

就总数上看,较之臧选多一倍半;而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的,单在元剧方面,已有 28 种,明剧则有 6 种,元明之间所谓“古今无名氏”所作的则有 100 种以上,大都是明代宫廷演出的本子,其中有 132 种为未见流传的孤本。193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此书发现一年

后,从中选出珍本 144 种,以涵芬楼名义排印出版,题名《孤本元明杂剧》,由王季烈校勘,并逐一写了提要。1957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用旧纸型重印了该书。1958 年,郑振铎又将现存的全部脉望馆钞校元明杂剧共 242 种编入他主编的《古代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元明杂剧作品中,有赵琦美注明钞自“内本”或据“内本”校过的 120 种杂剧附有“闯关”。“闯关”殆指“穿扮”之意,每折指明登场人物所穿戴的衣冠、髯口,应执的砌末。其记载的主要冠服名目有 200 余种,经过搭配所形成的装束样式近 300 种。此外还记载了假发和髯口 30 多种,面具和形儿 40 多种,刀枪把子及其他砌末近 100 种。因钞自明代内府演出本,这些“闯关”的设计有明代的影响,但他毕竟保留了前代的东西,如一些元杂剧剧本“闯关”规定的服饰与剧中人物的装扮完全吻合,这说明了元剧作家许多人确实熟悉舞台的演出,因而剧本的要求也符合场上实际。如《山神庙裴度还带》杂剧的闯关:

头折

王员外 一字巾 圆领 涤儿
三髯髯
旦儿 髻髻 手帕 比甲袄
儿 裙儿 布袜 鞋
家童 纱包头 青衣 褙膊
正末裴度 散巾 补纳直身 缘儿
三髯髯

……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闯关是继承、总结了元杂剧人物造型的艺术经验的结果,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戏曲服饰史料。这对于研究戏曲舞台美术的历史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四、《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研究者,几乎全是一流的戏曲专家,而她的确当之无愧。

1938 年 5 月,郑振铎发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11 月新陈在《书志学》上撰文,肯定

其价值“远在寻常宋元本之上。”并理出流传大略:“今所发见之古今杂剧,除十分之一为刻本外,余皆赵开美传录内府本也。每种后有‘万历某年月日清常道人校写’等字,内四种尾有董其昌手跋。当时所集共若干种,今已无考。后由钱氏绛云楼转入述古堂,始著录于也是园书目中。雍正间归何义门之弟煌,有手校及题识,嘉庆中归黄氏士礼居。光绪初归海虞赵氏旧山楼。民国初年,转归同邑丁君初我。”在文后,新陈还录下了 242 种杂剧名目。

同年 12 月,傅惜华在《朔风》上撰文《也是园所藏珍本元明杂剧之发现》,亦述其流传之大略。在肯定其发现意义后,略作一些评述,指明一些钞本从无刻本行世,实海内孤本。因为此书曾经钱曾也是园收藏,故傅惜华名之“也是园所藏珍本元明杂剧”。

193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选出珍本 144 种排印出版,题名《孤本元明杂剧》印行于世,王季烈为此书作了提要,对于每本都有简单的批评。在序中提出四点:

1 臧氏百种,或疑其去取未当,不免采醞而遗珠玉。以此书证之,则臧氏所遗诚然有之,特尚不多。

2 古今谈曲者,咸以关汉卿为巨擘,以此书证之,则宁推实夫仁甫,驾而上之。更有不著姓名之本,如刘弘嫁婢、村乐堂等,古拙清新,兼擅其长,堪为元曲中之绝唱。未可贵耳贱目,以古人之语为定评。

3 伶工学习南曲,便于赶板,每将应有衬字妄行删去。故其脚本不如裨白裘之类,比传奇原本衬字为少。今此书亦为明代伶工传习之抄本,而多叠床架屋不可通之衬字,以与有刻本者相较,则刻本固文从字顺,其衬字远比抄本为少。乃知抄本中不可通之衬字,皆系伶人妄增,以字代腔,使便记忆,非撰曲时所本有。

4 臧氏选剧,务取名作,士礼居 30 种及盩山图书馆 27 种,皆元明刻本,亦多佳剧。读者于元明剧本,徒见文人学士称赏之作,莫见草

野俚嗜俗好之谈。此书荃茅并采,其中拿妖捉怪拳棒跌打诸剧,取悦庸众耳目,虽文字无足取,要可见当时流俗风尚。故此书出而元明两代之杂剧,非特骤增一倍,且于雅俗两途,可窥两全,为研究两代草野风俗人情者所不可缺也。

郑骞在1944年第1期的《读书青年》上撰文,在指明此书价值尤在史料,并从中选出32种“这部杂剧总集的精华”后,专门就王季烈先生的这四个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若以此书证之,臧氏所遗珠玉,诚然不多;但若以元刊杂剧30种证之,则臧氏所遗,实在不少。文后,郑骞还就作者有问题的两种杂剧作了考订。

郑振铎在发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后,于1940年4月曾写一跋,理出了此书流传、校勘、译注的一个大致轮廓,并讨论了此书的阙失情况:“清常所藏的原来有多少种,已不可知。据《也是园书目》则有340种(除重复外)。《季沧苇书目》则有300种,100册(似300种之数,系季氏举成数而言,非实际之数目),但到了黄尧圃手里,则仅存66册,266种,较之也是园所载已阙了74种,在尧圃跋里及他手抄目录里均已一一举出,但尧圃的待访录里尚遗漏了5种。丁初我谓除重复外,实阙74种,这个计算是对的。…到了王闾源手里,又阙了27种,第二次所佚阙的27种,系据王闾源氏所钞现存目录与尧圃手抄目录相校计的。自汪氏再传到丁氏,则此‘现存’的64册,242种,并不曾再有什么损失。”(所阙目录略——编者)经过了这两次佚阙,较之《也是园书目》所载,总计阙少103种。(后注“应作102种。”)

1942年2月章蕙荪在《斯文》2卷22期撰《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就版本诸问题进行了讨论,继郑振铎之后再次讨论“闯关”问题,认为“‘闯关’者,穿着关目取略谓也,此项附则,亦非作者手订,乃伶工所增入。”并对元人以“四折”为作剧定例作出新的解释。

郑振铎发现此书后,北京图书馆用重金买

下,孙楷第也赶到上海,“凡三周读讫,得笔记十余册。”后来写了一部长达24万多字的《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953年由上杂出版社列入《中国戏曲理论丛书》之一出版。该书主要对于钱曾诸人家世源流作了详尽的考证,论述了也是园旧藏200余种杂剧的藏弃经过、剧本的原委,考定了不同时期册籍,探讨了赵琦美所据版本及校勘、编类、品题诸方面内容。附录部分收有《也是园曲与也是园藏书目底本》、《重话旧山楼》、《元曲新考》等五篇。

冯沅君在读到《孤本元明杂剧》钞本后,写了《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她所读的钞本21册是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钞藏的,只是原书的一小部分,但仍“从它得到些启示”。首先是知道了元剧上演时各种脚色如何“妆裹”,这是从所附的“闯关”而来的。她所见的21册中附有“闯关”的15种剧目都见于明钞本,因此认为“这些‘穿头’颇有不出于元代的嫌疑”,认定其中“闯关”纵不全是元人设计的,与元代剧场所用的也应相去不远,研究元剧服装不妨用它作史料。冯先生得到的其它“启示”是:唱念“题目正名”的人,应是剧中一演员。因为元剧中最后唱念的脚色既常负结束全剧的责任,又往往念着与题目正名相同的语句,所以演员可以用剧外人的身分宣告剧终,提出剧名,这与说书的体制颇有关联。根据这21册新资料,冯先生对蔡莹《元剧联套述例》中的惯例进行了补正,并对“脱剥杂剧”作出了新的解释,对《狄青勇夺衣袄车》一剧作了与《雍熙乐府》的对校,发现《孤本》与前者互有错误。此文收入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古剧说汇》。

解放后关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身的研究文章不太多,仅见《人民日报》1958年3月14日曲六乙的《阅读“孤本元明杂剧”》及1960年10月号《读书》上宜山《古典戏曲琐记》一文中对《孤本元明杂剧》的介绍等。

直到80年代,对《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研究才又有新的起色。蒋星煜在《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上发表了《常熟赵氏〈脉望

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与校注》一文,就他最近读到的张远《无闷堂文集》、《无闷堂诗集》和陆敕先《靛庵诗草》,对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校勘和曲注等问题,有了许多新的发现。蒋先生提出了几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

1.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有钞本,有刻本,何以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和《也是园藏书目》全是钞本呢?

2.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十《古今杂剧目》录杂剧 300 种,而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中“宋元杂版书”项下也列元曲 300 种,何以如此吻合?是否能肯定钱曾把书卖给了季振宜,然后又从季振宜处买了回来?否则的话,何以钱曾后来仍旧拥有《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呢?

3.凡是钞本,剧名和作者人名下,批注是比较多的,这些批注,一般推测是赵琦美和钱曾的手笔,除这二人外,还有谁?

4.钱曾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家,何以他的《也是园藏书目》中元明杂剧却一再一剧重复出现两次? ……

据张远《无闷堂文集》中《元明杂剧书后》,蒋先生分析,清初常熟地区收藏钞校元明杂剧的有三家,而不是如郑振铎、孙楷第等人所见的仅钱曾一家。这三家的流传大致情况是:

1.钱谦益→钱曾→张远→…

2.陆敕先→钱曾→何焯→…

3.秦西岩→…

这样,上述几个问题就基本有了初步答案。

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确是有钞本、有刻本,而且如张远所说那样“旧著者十之八,旧刻者十之二”。但是这一部后来为张远所得了。《述古堂藏书目》和《也是园藏书目》所载 300 种全是钞本,则是陆敕先原藏的本子的目录。

季振宜在《季沧苇藏书目》中所列元曲 300 种可能是陆敕先藏本,甚至是秦西岩藏本,而决不是赵琦美原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钱曾既然能说出“自谓已备,无复挂漏”,那么他在未有复本之前,将元明杂剧出售于是很难设想的。可以认为钱曾在某一时期曾经同时收藏赵琦美原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和陆敕先藏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原来“十之一二”是陆敕先据秦西岩藏本校的,至于陆氏自己的藏本当然是陆自己校的。所以现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某些校勘、批注,除了可以肯定是赵琦美、钱曾、何焯的手笔之外,有一部分应该是陆敕先的手笔。

钱曾《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藏书目》之所以有一剧同时两次重复出现,蒋星煜先生认为是钱氏同时收藏过赵琦美与陆敕先藏本的结果。

陆敕先是一个戏剧版本专家,名贻典,钱谦益的弟子,毛袞的丈人。他所抄的《琵琶记》是目前以为最好的一个版本。秦西岩即秦四麟,对戏剧颇有研究。

由于清初文人张远的《元明杂剧书后》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校勘、批注的情况,比过去更为清楚了。

无论如何,作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戏剧总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成了我们探求古代戏剧辉煌的一个路标,她必将继续指引我们追索昔日的光彩,遥听那悠远的回声。●

①《黄尧圃题识》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首册。

②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见《劫中得书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③④钱曾《读书敏求记》中之“杨行舒之《洛阳迦蓝记》条”

⑤⑥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见《劫中得书记》

⑦《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责任编辑:陶原珂

模糊语言、模糊思维与日常言语交际

□ 曾衍桃

(广东法商大学外语系, 广东 广州 510321)

[关键词] 模糊语言 思维 言语交际

[摘要] 本文试图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谈谈模糊语言、模糊思维及其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8-0083-04

一、模糊语言的表现形式

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认识的深入和科技的发展, 逐渐发展了一种与自然语言迥异的人工语言, 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 自然语言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既体现在语言自身, 也体现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之中。

从语言本身而言, 语言的模糊性表现为几种类型:

语音模糊。语言中的音素具有模糊性, 英语中的元音[i:]和[i]的区别是, 发[i:]的舌位比发[i]稍低, 与上顎间隙稍宽; 发[i:]时舌前部位抬得更高, 与上顎间隙更窄。这里所谓稍低与更高, 稍宽与更窄不可能有精确的界限。各种语言的语音都有模糊性。

词义是与词的语音形式相联系的, 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反映。一个词从概括反映对象到不概括反映对象, 往往是逐步过渡而非突然改变的。时间词

如黎明、早晨, 上午、中午、傍晚、春、夏等都没有明确的上下限。方位词东、南、大前方、右后方都没有明确的界域。历史分期名词初唐、中唐、晚唐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区间。英雄、模范、落后分子、高个子、小不点等概念是按事物的模糊态分类构成的模糊语词。即便是最高级形容词也可能具有模糊性, “最佳运动员”、“最好的明证”、“最佳电影导演”, 对这些概念没有明确的识别标准。其他如程度副词、频度副词则是更为典型的模糊语词。这类属于词汇意义模糊。

语句语义模糊。这种类型的模糊性源于语词意义模糊, 通常它要出现在一定的句法组合结构中, 这种模糊性才会体现出来。比如,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可以有两种解释: “开飞机可能有危险”或“开着的飞机可能有危险”。与词汇语义相比较, 语句语义模糊通常可以求助于语境来解决。而词汇语义模糊即使有具体的语境也可能难以解决它



的模糊性。

从语言的社会运用角度来看,模糊语言可以区分出以下几种类型。

幽默语言类型。语言现象是明确与模糊的统一,明确显现于模糊性当中。语言氛围的幽默更是一个模糊的结构。所谓语言的幽默性实际上就是语言模糊性的巧妙运用。人们在日常言语交际中,时不时听到一句话语会觉得好笑、风趣,关键在于,人们在听到表层话语之后,会意外地体会到一种潜藏的深刻意蕴;正是这种意蕴“触发”了人脑中的笑神经,使人情不自禁地觉得滑稽、有趣、幽默。幽默语言类型的模糊性展现的是一个幽默氛围与非幽默氛围之间的一种不确定性、渐变性,而幽默氛围的显隐是随语境而变化的。试举数位记者的询问,看罗斯福先生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记者先生,你能保密吗?”记者答道:“能。”罗斯福紧接着说:“我也能。”那位记者浑然没有觉察到罗斯福这里设了一个陷阱!罗斯福巧妙地回绝了记者又不失总统的风度,这里起作用的是幽默,而幽默的形成在于话语隐含义的模糊性。

间接言语行为语言类型。人们日常生活中之所以要进行言语交际,无非是要实现某种交际意图,而交际意图的实现多数情况下是要以言语行为为手段,用语言行为表示指令、许可、请求等。通常人们为实现言语行为,总要考虑交际对象的态度、性情等因素,因而并非总是用直来直去的言语而是拐弯抹角地用些间接的言语。这也属于语言模糊性的类型之一。间接言语行为的模糊性在于它的间接性,用一种间接的表达式实现直接的目的。比如,有一个人向你借钱,他与你素有交往,但你对他的可信任程度表示怀疑,你该怎么得体地实现你的言语行为——拒绝对方的请求呢?英语民

族和汉语民族爱用的一个表达式是 Do I look like a rich man? (你看我像有钱人吗?)这是一个模糊表达式,表示一个模糊的言语行为(询问?拒绝?),说话人没有直露其意,而他的真正意图跃然“语”上,其绝妙之处在于它表示“拒绝—同意”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全凭听话人运用模糊思维能力去推理、猜测。

礼貌语言类型(客套语言类型)。在社交场合,人们进行交际通常恪守一条很重要的原则——礼貌原则,为了使话语得体,有分寸、不失礼貌,通常采用礼貌语言。礼貌语言与间接言语行为有密切的联系,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之一,其模糊性表现在它的含混性。比如,你在餐馆就餐时要请邻桌帮忙递一下盐、酱油什么的,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e salt? 这是很得体的礼貌用语。它之所以得体就在于,你要表达的是向对方提出一个要求,但这个要求的提出不是直接形于言表,而是隐含语句的多种含义之中——既有询问之义(would-询问意愿),又有请求之义(please),还表示试探(用的是疑问句)。

综上所述,模糊语言——无论是模糊概念,模糊语词,还是模糊语句——都有一个基本特征:没有明确的外延。正是外延的不确定性导致内涵的模糊性、变动性。

二、模糊思维是人脑思维的基本特征

语言能力是人脑的天生机制,思维也是人脑的一种天生机制,两者都是人脑天生的物质属性。就人脑的思维活动而言,既有精确思维又有模糊思维,而模糊思维是人脑最重要的特征。模糊思维是精确思维的先导和前提,人脑正是基

于对客观事物的模糊思维进行分析,才能由一种理性思维形式到达另一种理性思维形式,即精确思维。这一点正是人脑与电脑的根本区别所在。

比较之下,电脑的“思维”运作是一个机械的线性过程,而人脑思维的运作是一个能动的并行过程。电脑的智能建立在数据的处理基础上,依赖的是一种精确的符号系统,记数符号的位置和符号的出现与否对信息的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人脑的信息系统本质上不是数学的,而是统计的,它不是规定符号、数字的精确位置的问题,而是信息出现的统计性质问题,信息的意义由信息的统计性质来传输,语用学关联理论论述的自然语言理解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加工过程,一个模糊思维过程。

与精确思维比较,模糊思维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优点)就是灵活性。就思维的对象来说,模糊思维是关于模糊事物的理性认识,它是通过有关对象的模糊信息用模糊的方式进行加工来揭露事物的本质。越是复杂多变的事物,模糊思维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越大。就思维的逻辑基础来说,模糊思维建立在模糊逻辑的基础之上,使用模糊概念、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进行思维。就思维的手段来说,精确的思维可以作精确的量化,模糊思维虽然不能作精确的量化,但它也有其量的特性,有形式结构和逻辑顺序性,用近似、使用模糊概念、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来进行思维。就思维的手段来说,精确的思维可以作精确的量化,模糊思维虽然不能作精确的量化,但它也有其量的特性,有形式结构和逻辑顺序性,用近似、模糊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形式化、数量化处理,并用物质手段加以模拟,这也是可能的。模糊思维在描述事

物时不追求条分缕析地刻画事物,而着眼于事物的整体特性和主要方面,用近似的方式勾勒出事物的轮廓,估测事件的进程,作出近似的、有灵活性的结论。

思维的模糊性不仅在创造性思维中得到运用,在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集中思维与扩散性思维等思维形式中也大有用武之地。无论是哪种较为具体的思维方式,都以模糊思维为发端。

模糊语言是用以表述模糊概念的手段,模糊语言与模糊思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裙带”关系。思维离不开语言,模糊思维就是选择具有模糊性的自然语言,利用语词的模糊性、歧义性和不严格符合单一语法结构的语句来把握和表达事物的模糊性。如果说概念是思维的细胞,那么模糊概念就是模糊思维的细胞,而模糊语言则是使模糊思维和模糊概念物质化的手段。对于模糊概念,人脑是利用模糊集合借助模糊语言来把握的。比如,一位教师,为了把握学生的情况,他需要使用男生和女生、优等生和差生、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学生等概念。在他的认识中,男生和女生构成两个集合,每个集合包含的元素都是明确肯定的。但对于优等生和差生之类的概念,任何稍有经验的教师都不硬性划定范围,优与非优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不能一刀切,只能通过对不同学生相互比较,通过隶属度来把握优等、差等之类概念。人们常用完全够格、基本够格、一定程度够格、不太够格、基本不够格等语言隶属度来区分不同对象的资格程度。教师等职业人员的在岗工作评审常用称职、基本称职、基本不称职、不称职等语言隶属度来衡量他们胜任工作的程度。这些都是模糊思维的模糊语言体现。通过把握隶属度的分布来把握模糊概念,是模糊思

维的一条重要原理。

三、模糊语言、模糊思维的运用价值

在日常交际中,模糊语言与模糊思维相辅相成,有很大的运用价值。一方面,模糊语言在交际中可以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避免正面冲突,如果用于批评人、挖苦人,模糊语言可以起到一种棉里藏针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交际是一个双向行为过程,对交际者而言,具备对模糊语言的模糊思维、推理、判断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模糊思维是保证成功言语交际的前提。适当运用模糊思维和模糊语言,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力和概括力,增强语言交际的效果,提高交际的效率。设想一下,如果用下面这种语言来表达“总算盼着那人走了”这样一个思想,那么,交际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Thank God, the man X who was at the time T in location L, has at the time T left the room which the man X was in at the time T.

(谢天谢地,那个在某个时间 T 在某个地方 L 的 X 已经在某个时间 T 离开了那个 X 在某时间 T 处在里面的那个房间。)

实际上,这里只要用一句简单而模糊的话语 Thank God, he has gone. 就能很好地取得交际效果。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描述的不确切性并非罪责,相反,它倒是一种赐福,使得用较少气力便能传送足够的信息。模糊地描述还有利于记忆,也就是说,不确切性有利于提高效率。”

模糊语言与模糊思维除了用于使用模糊概念的知识领域外,在精密的科学中,模糊思维也是必不可少的。卢嘉锡

总结化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后指出,在情况尚朦胧,推理论据还不足的情况下,实际过程往往带有不确切性或模糊性。科学家就是从模糊性中察出端倪,看到轮廓,毛估过程的概况,进而形成精确的结论。

在国际事务、国际交往中经常要运用到模糊语言和模糊思维。外交辞令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两国关系出现分歧的时候,要求不能直截了当,而必须隐喻性地、含糊地运用模糊语言。模糊外交语言不仅可以达到宣传的目的,还可以不损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

形象性与模糊性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模糊思维在形象思维中占有基本的或主导地位。小说家、诗人等文艺人构思作品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模糊思维的过程。文艺人在实践中收集的并不是具体的信息形式如数据、报表,而是各种典型的形态、表情、动作、语言及典型的生活镜头、片段等模糊信息形式。小说家、诗人等常用的一个刻画形象的手法是对事物进行模糊类比:柳叶眉和扫帚眉、杏核眼和三角眼、樱桃小嘴和血盆大口,都是模糊类比,它们简明生动地刻画一定的形象,传达作者的某种感情信息,隐喻是作家塑造形象的有力手段。隐喻的客观依据也是客观事物之间的模糊相似关系。

在现实世界和虚拟的可能世界中,模糊语言和模糊思维运用的场合和事例不胜枚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模糊语言无处不在,模糊思维无处可少。对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运用和开拓模糊语言、模糊思维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更好地运用模糊语言和模糊思维并发挥它们的长处,这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陶原珂

广东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素质的 测验与比较研究

□ 刘 金

(韶关大学教务处, 广东 韶关 512000)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心理素质 人格因素

[摘 要] 本实验采用卡特尔 16PF 人格问卷对学生进行测试, 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格因素的变化情况。主要通过适应能力、合作意识、耐挫折力、创新意识、自信心、健康心理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为探索出一条适合粤北山区少数民族师资培养的新模式、新途径提供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 G4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8-0087-04

粤北山区是广东省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 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从小学到初中“一条龙”的民族教育体系, 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与先进的汉族聚居地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中, 初中教育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 总体教育质量不高, 乡镇初中教师普遍数量不足, 素质较低, 流失量大。初中教育是义务教育的关键阶段, 因此, 要改变粤北山区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状况, 就要先改变落后的民族教育, 加强民族基础教育, 加强初中教育, 必须培养出适合本民族的初中教师。

研究方法

测试对象为韶关大学 96 级少数民族师资班按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的改革课题《粤北山区少数民族复合实用型师资培养模式的综合研究与实验》的要求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四年制培养的复合实用型文科初中师资的试验班) 的学生 28 人(男 18 人, 女 10 人, 年龄在 19—24 岁) 和 97 级少数民族预科一年制班的学生 27 人(男 14 人, 女 13 人, 年龄在 18—22 岁), 共计两个班 55 人。

测试工具和材料采用卡特尔 16PF 人格问卷测试, 抽取有关人格的因素项进行分析。1998 年 3 月 10 日, 以班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 每班由两名主试负责。测查时, 先由主试说明指导语, 待学生理解要求后开始作答。被试在测查中遇到不理解的项目时, 可随时向主试个别询问, 测查时间约为 45 分钟。

统计与分析

(一) 适应性水平

个体在今后的工作中, 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潜能,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否迅速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了解一个人的适应性水平, 我们主要从个体在某一环境下的焦虑程度和在该环境下成长的能力等人格因素来衡量。倘若焦虑程度低, 而在该环境下成长的能力的人格因素数值又高, 则说明该个体适应性好, 反之, 则适应性差。根据卡特尔 16PF 人格测验中的焦虑程度因素(X_1) 和在新环境中成长能力的人格因素(Y_4), 我们将 X_1 小于 5.5 分值定为焦虑程度低, 将 $5.5 \leq X_1 \leq 7$ 范围内的分值定为中等焦虑, X_1 大于 7 分值定为高焦

虑,见表一。在上述两个年级班的测试中,我们发现,低焦虑的在 96 级占 11%,97 级为 0,相差 11 个百分点;中等焦虑的在 96 级占 67%,97 级占 74%,相差 7 个百分点;高焦虑的在 96 级占 21%,97 级占 26%,相差 5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大于 0.1)。从测试结果看,96 级学生相对于 97 级学生来说其焦虑程度总体偏低,这就表明,经过一年的教育,学生对这里的生活、学习环境已逐步适应。但是,不管哪个年级,其高焦虑比率均超过 20%,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基础知识普遍较差,使其在学习中感到较大压力。第二、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好,导致其对能否继续学习下去感到担忧,进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第三、整体状况(包括学习能力、知识量、经济状况等)不如周围的汉族学生而引起自卑。

表一:不同年级焦虑程度百分率分布表

程度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弱 X < 5.5	一般 5.5 ≤ X ≤ 7	强 X > 7	
96	11	67	21	大于 0.1
97	0	74	26	

在新环境中成长能力的人格因素(Y₄)亦能反映一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Y₄的平均值为 22, Y₄ 超过 27 分值的则成长能力较强。因此,我们将 Y₄ 小于 22 分值的定为成长性较差,在 22 ≤ Y₄ ≤ 27 范围内的分值定为成长性一般, Y₄ 大于 27 分值的定为成长性较好。见表二。测试结果表明,成长性较差这一水平 96 级占 11%,97 级占 7%;成长性一般水平,96 级占 43%,97 级占 74%,相差 31 个百分点;成长性较好的在 96 级占 46%,97 级占 19%,相差 27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的差异不显著,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个体的成长性水平还是有所改观的。

以上焦虑程度和成长性水平人格因素,在两个年级中的比较,差异均不显著,原因主要是我们实验的时间短,被试数量少,以及两个

群体入学时的水平程度不同,入学后的培养形式和目标不同等。

表二:不同年级成长能力人格因素百分率分布表

程度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低于均值 Y < 22	等于大于均值 小于等于 27 22 ≤ Y ≤ 27	大于均值 Y > 27	
96	11	43	46	大于 0.1
97	7	74	19	

(二) 合作意识

了解个体合作意识水平的高低,我们主要从卡特尔 16PF 人格测试中的乐群性、怀疑性两种因素的状况来分析。测试结果见下表:

不同年级学生合作意识人格因素百分率分布表

因素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1—3	4—5	6—7	8—10	
乐群性	96	0	79	21	大于 0.1
	97	7	67	26	
怀疑性	96	0	4	46	大于 0.1
	97	0	0	41	

乐群性: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 1—3 分段(乐群性差)96 级比 97 级低 7 个百分点,在 4—5 分段(乐群性较差)96 级比 97 级高 12 个百分点,在 6—7 分段(乐群性一般)96 级比 97 级低 5 个百分点,在 8—10 分段(乐群性好)两个年级均为 0。经检验无显著性差异,但总体的乐群性水平均不高。

怀疑性:在 1—3 分段(怀疑性低)96 级 97 级均为 0,4—5 分段(怀疑性较低)96 级比 97 级高 4 个百分点,6—7 分段(怀疑性较高)96 级比 97 级高 5 个百分点,8—10 分段(怀疑性高)96 级比 97 级低 9 个百分点。经检验差异均不显著。

这种低乐群、高怀疑的人格构架,势必会影响到个体的合作质量,进而影响活动的效果。造成这种低乐群、高怀疑值的人格构架的原因有:第一、自卑心理迫使他们不愿与周围的汉族学生进行更多的交往。第二、不同角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能力较低使他们对周围的

人充满了怀疑。第三、紧张的学习与较低的学习能力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学习方面花上更多的时间,而无暇顾及其它的活动。

(三)耐挫折方面的人格因素

为了衡量个体耐挫折能力水平的高低,我们从卡特尔 16PF 人格测试中抽取了五个方面的人格因素进行分析,即稳定性、有恒性、敏感性、紧张性和自律性。

一个耐挫折能力强的人,必须具备下列品质:情绪稳定而成熟;能面对现实,能以客观、沉着、坚强、独立的态度去处理自身遇到的各种问题;做事尽职,有恒负责,有始有终,不会因一时的不顺而放弃;能知足常乐,保持内心的平衡;注意知己知彼,自律严谨。我们所抽取的五个人格因素正好反映了以上品质。测试结果见下表。

不同年级耐挫折力方面各种人格因素百分率分布表

因素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1—3	4—5	6—7	8—10	
稳定性	96	28	36	25	11	大于 0.1
	97	15	70	15	0	
有恒性	96	14	14	33	39	大于 0.1
	97	7	15	52	26	
敏感性	96	25	25	18	32	大于 0.1
	97	7	44	23	26	
紧张性	96	0	25	54	21	大于 0.1
	97	0	19	74	7	
自律性	96	11	36	35	18	大于 0.1
	97	19	52	22	7	

稳定性因素:在 1—3 分段(稳定性差)96 级比 97 级高 13 个百分点,在 4—5 分段(稳定性较差)96 级比 97 级低 34 个百分点,6—7 分段(稳定性较好)96 级比 97 级高 10 个百分点,8—10 分段(稳定性好)96 级比 97 级高 11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

有恒性因素:1—3 分段(有恒性差)96 级比 97 级高 7 个百分点,4—5 分段(有恒性较差)96 级比 97 级低 1 个百分点,6—7 分段(有恒性较好)96 级比 97 级低 19 个百分点,8—10

分段(有恒性好)96 级比 97 级高 13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

敏感性因素:1—3 分段(敏感性低)96 级比 97 级高 18 个百分点,4—5 分段(敏感性较低)96 级比 97 级低 19 个百分点,6—7 分段(敏感性较高)96 级比 97 级低 5 个百分点,8—10 分段(敏感性高)96 级比 97 级高 6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

紧张性因素:1—3 分段(紧张度低)两个年级均为 0,4—5 分段(紧张度较低)96 级比 97 级高 6 个百分点,6—7 分段(紧张度较高)96 级比 97 级低 20 个百分点,8—10 分段(紧张度高)96 级比 97 级高 14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

自律性因素:1—3 分段(自律性差)96 级比 97 级低 8 个百分点,4—5 分段(自律性较差)96 级比 97 级低 16 个百分点,6—7 分段(自律性较好)96 级比 97 级高 13 个百分点,8—10 分段(自律性好)96 级比 97 级高 11 个百分点。经检验,两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个体的稳定性水平还处于较低的状态,两个年级均有超过 60% 的人稳定性处在较低水平。第二、有恒性水平的发展优于其它四种人格因素,两个年级均有超过 70% 的人具有了一定的责任感和坚持性,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第三、两个年级尚有 50% 的人处于较敏感的水平,遇事易感情用事,不务实际,缺乏耐性和恒心,这也反映出其遇事拘谨,缺乏自信心。第四、测试结果显示,两个年级均有 75% 以上的学生紧张度较高。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学生的自卑与焦虑心态。第五、自律性普遍有所提高,个体的社会化程度得到加强,行为更趋理性。

(四)创新意识

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往往善于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发现各种有利条件,并主动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总是持一种积极、乐

观的态度。

这里我们主要是通过卡特尔 16PF 人格测验中的创造能力人格因素来了解个体的创新意识的, 测验规定分值在 7 分以上者具有强创造能力。测试结果见下表。

不同年级创造能力人格因素百分率分布表

程度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1—3	4—5	6—7	8—10	
96	0	39	25	36	大于 0.1
97	4	15	55	26	

在 1—3 分段(创造力水平低) 96 级低于 97 级 4 个百分点, 在 4—5 分段(创造力水平较低) 96 级高于 97 级 24 个百分点, 在 6—7 分段(创造力水平一般) 96 级低于 97 级 30 个百分点, 在 8—10 分段(创造力水平较高) 96 级高于 97 级 10 个百分点。经检验, 两个年级差异不显著。以上测试结果表明, 个体的创造力水平还较低, 较高水平两个年级均未达到 40%。这反映出目前实施的教育还应加强个体创造力的培养。

(五) 自信心

了解个体的自信心, 我们主要从卡特尔 16PF 人格测验中选取敢为性和忧虑性两个人格因素来了解。所得结果见下表。

不同年级自信程度人格因素百分率分布表

因素	程度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1—3	4—5	6—7	8—10	
敢为性	96	4	46	50	0	大于 0.1
	97	7	74	19	0	
忧虑性	96	0	43	53	4	大于 0.1
	97	0	30	59	11	

敢为性人格因素: 在 1—3 分段(敢为性差) 96 级低于 97 级 3 个百分点, 在 4—5 分段(敢为性较差) 96 级低于 97 级 28 个百分点, 在 6—7 分段(敢为性较好) 96 级高于 97 级 31 个百分点, 在 8—10 分段(敢为性好) 两个年级均为 0。经检验, 两个年级差异不显著。

忧虑性人格因素: 在 1—3 分段(忧虑性低) 两个年级均为 0, 在 4—5 分段(忧虑性较低) 96 级高于 97 级 13 个百分点, 在 6—7 分段(忧虑性较高) 96 级低于 97 级 6 个百分点, 在 8—10 分段(忧虑性高) 96 级低于 97 级 7 个百分点。经检验, 两个年级差异不显著。

以上测试结果表明: 第一、随着个体对环境的进一步了解和适应, 个体的敢为性得到较大改观, 自卑心理得到调整。第二、个体忧虑性仍未得到很好缓解, 忧虑性水平依然较高。

(六) 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者总是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所处的环境, 总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 即使在逆境中, 也会对前途充满信心, 从不悲观失望。

本研究对心理健康状况的认识主要是根据卡特尔 16PF 人格测验中的心理健康因素来分析的, 心理健康标准可介于 4—40 之间, 均值为 22, 低于 12 分者, 心理不健康的表现颇为显著。

心理健康状况人格因素百分率分布表

程度 百分率 年级	程度			X ² 检验
	小于均值 X < 22	等于均值 X = 22	大于均值 X > 22	
96	79	7	14	大于 0.1
97	81	15	4	

我们将心理健康状况分为三个层次: 分值小于 22 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平均水平, 倾向于不健康, 有问题的个体均在这一层次) 96 级低于 97 级 2 个百分点; 分值等于 22 的(心理健康状况达到平均水平) 96 级低于 97 级 8 个百分点; 分值大于 22 的(心理健康状况超过平均水平) 96 级高于 97 级 10 个百分点。低于 12 分的比率为 0。经检验, 两个年级差异不显著。

由测试结果可知, 被测试群体目前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暂时没有(即分值低于 12 分), 但低于平均水平的比率却近 80%, 由此说明当前仍有相当的学生受到或多或少的困扰, 难以摆

“防范金融风险,规范保险经营” 座谈会论点综述

□ 本刊记者 谭湛明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8-0091-03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日渐加快,探讨中国入世后国内金融保险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如何规范、健康发展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日前,由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泰康人寿广州分公司、《学术研究》杂志社、《南方经济》杂志社、《金融早报》报社、《广州日报》社理论部等单位联合举办“防范金融风险,规范保险经营”座谈会,4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分析国内保险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前

景,探讨国内保险业应如何防范风险、规范经营,以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保险业风险与保险公司信用评级

保险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保险业发展前景广阔,目前我国保险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存在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和政策风险。对保

脱所面临的困境。

讨论

1.测试实验的结果说明,两个样本的测试指标方面虽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不明显。

2.测试结果表明,被测者由于学习能力欠佳、知识量贫乏、家庭经济状况不良而形成较严重的自卑心理。

3.应注意提高课外活动的趣味性和广泛性,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以便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

4.利用学生已具备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引导其克服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进而提高其耐挫折能力。

5.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寻找条件,解决问题。

6.树立自信心,提高心理素质,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7.测试对象为两个不同年级群体在同一时间的测试,不是同一群体在不同时间的测试,尚需要对被试作进一步的跟踪测验。●

参考资料:

1.《关于九十年代民族高等教育的几个问题》(《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二期)。

2.《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必须超前发展民族教育》(《广西边远山区发展民族教育问题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二期)。

3.《大学生 SCL-90 测试结果的研究》(《心理科学》1995年第五期)。

4.《心理教育课与学生心理素质结构优化的实验研究》(《心理科学》1997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险公司信用等级评估是国际通行的企业信用状况评级,是在全面分析保险公司所面临风险的基础上,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作出的综合评估。目前世界上 50 家最大的商业保险公司中有 35 家已正式评级,12 家有公开信息评级,只有 3 家未评级。在我国,保险公司虽然初涉信用等级评估领域,但其对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信用评级打破了传统观念上对于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局限,客观地从经营环境、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反映了保险企业的实际信用状况。它将成为保险公司树立良好的信誉、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种策略与手段。(1)对投保人来说,寿险公司信用评级是在全面分析保险公司所面临风险的基础上,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作出综合评估,并用一种简单的字母数字组合符号表示保险公司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财务实力、偿付能力与投保人利益保障密切相关。因此,保险公司信用等级可以为投保人提供较为准确的风险信息,并成为投保选择的重要参考。(2)对保险公司而言,保险公司信用评级符合国际惯例。获取客观公正的信用等级,已经成为保险公司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策略与手段。通过信用评级,保险公司可以从中找到差距,改进管理。(3)从监管的角度看,完善的监管=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保险公司自律。保险公司信用评级是寿险公司风险信息披露与社会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可以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协助防范保险公司经营上的道德风险,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分析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保险公司加强自律管理,提高保险业的经营稳健性。

二、保险业风险防范与保险市场的规范发展

1997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许多亚洲国家的金融业及其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波及全球经济,给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保险作为金融业的三大支

柱之一,也面临着空前的考验。金融保险市场的发展应建立在企业稳健经营的基础上,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保险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信用评级是民族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中国加入 WTO 后,外国保险公司将大举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必将出现激烈的竞争。具体地说,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后,原有的市场格局将会被打破,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会逐步提高,我国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会相对有所下降;由于外国保险公司在管理水平、风险处理技术和服务水平方面占有成熟经验优势,必将在营运上与国内保险公司拉大差距,削弱国内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暴露出市场结构上的缺陷;由于现行有关保险法规的不健全及国家现行税收分配政策的倾斜,如现行外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15%,民族资本的保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33%,这样的税率是有欠公允的,无疑使保险监管机构压力增大,同时也促使国内民族资本保险公司面临严峻的挑战。由此,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如现行的保险法规应进一步完善、跟国际惯例接轨;现行的税收分配政策应有所改变等等。

我国的保险供给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结构上都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自然会对保险供需矛盾的缓和带来不利影响。另外,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同时,会带入国际上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同国内的保险公司展开竞争,并处于优势地位,这势必对国内保险公司形成外在压力,促使中国保险业向高水平运行目标迈进。如改进组织结构,建立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建立具有长期吸引力的用人制度,在和外资公司的合作中提高管理水平等。在保险市场方面,中国近日已宣布曲准美国的“立博保险”、“恒康保险”、英国的“保诚保险”、加拿大的“永明保险”四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内地成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而地域方面则开

放天津、重庆、深圳、大连四市给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在此之前,我国已曲出了美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 13 家保险公司的在华经营牌照,并允许外资在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中占 50% 的股份。因此,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如何规范保险经营,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一新的课题。

三、提高保险公司资产营运质量,泰康人寿拓展了一条新的路径

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将给中国保险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国即将加入 WTO,也使中国保险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保险公司在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化的过程中,保障客户利益和企业资金的安全性,提高企业资产营运质量,为客户和企业创造长久价值成为企业经营的宗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 1996 年 8 月成立至今短短几年时间内,业绩引人注目,截止 1998 年底,保险业务收入累计达 14.6 亿元,拥有近 7 向位客户,近 3000 名员工为客户提供各种形式的保险服务。创造了六个第一:《保险法》颁布后成立的首批保险公司中,第一家获准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的人寿保险公司;国内第一家获得信用等级评估的寿险公司,信用等级被评为 AA 级;国内第一家注册寿险服务商标的寿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协会的记录中,至今为止唯一一家无投诉的寿险公司;国内第一家推出纯保障型保险的人寿保险公司;北京第一家设立国际寿险管理师(LOMA)考试中心的公司。目前,泰康人寿已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探讨泰康人寿的成功秘诀,不难发现其经营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核心是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坚持稳健经营的方针,立足“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经营战略,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用

人机制,提倡“奉献、创新、公平、分享”的企业文化。泰康人寿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与现代金融企业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泰康人寿十分重视对内部风险的控制、重视成本控制及经营效益,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工作,在公司内部强调防范利率风险和投资市场风险的同时,把防范风险的意识贯穿于公司各部门的工作之中,并建立起了相应的防范、化解机制。公司在财务、业务管理、稽核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风险控制。财务上实行了财务负责人的委派制度。公司集中资金管理和调配,建立了费用预算制和真正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的概念,所有保费收入收归总公司统一调动,各分公司的支出费用由总公司统一下拨。固定资产由固定资产购置领导小组统一审批。在业务管理方面,公司成立了核保核赔委员会,明确各级业务管理机构和人员的承保核保核赔权限,建立了核保核赔人员的任职资格审定制度,从而化解业务风险。公司的合同管理制度、用章管理制度、固定资产购置制度等,都为公司的内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泰康人寿走的是精兵战略,瞄准国际保险业的最高水准,培养员工具备国际最先进、最敏锐的经营理念 and 思想,用国际化标准和概念要求自己,这是公司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有专家认为:泰康人走的路线是先圈内后圈外的发展路线,由于评估为 AA 级,已在市场上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品牌,在同业内打败竞争对手,短期内获得成功,经验可取,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有所转移,应扩大宣传,不光要“小而好”,还应走向“大而好”,提“规范化管理,规模化拓展”更为全面。这样,才能体现新时期的竞争对策。今后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在金融市场运作上避开金融风险,对本公司的管理如何规范,应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振兴中华的杰出领袖

——喜读龚育之、张磊等著《世纪三伟人》

□ 温宪元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00)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8-0094-04

20世纪是产生伟人的时代,在中国就有三位杰出代表,那就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由我国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著名专家龚育之教授和研究孙中山的著名专家张磊研究员等合著的力作《世纪三伟人》,从党的“十五大”会议闭幕后就迅速立题,历经10多个月的紧张劳作之后,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世纪三伟人》是迄今问世的关于孙、毛、邓研究著作的权威性版本之一。喜读40万言宏篇巨著,受到不少启发。

中华民族的光辉的历史包涵着它的令人警醒、令人振奋、令人期盼的20世纪的现代文化。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列强瓜分中国,而“庸奴误国”,“华夏大厦将倾”的危机情势下,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孙中山亲自起草《兴中会章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孙中山明确提出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民族、民权和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要求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开创了完全意

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通常的民主革命,有前两条也就够了,但是孙中山纵览世界,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接受了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多次这样解释,他的民生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孙中山高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方。”(《世纪三伟人》第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三民主义是20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诞生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最为合乎中国国情的完整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文化中的优秀代表。而孙中山则顺理成章地不愧为站在20世纪时代前列的三伟人之头一位。

站在20世纪时代前列的第二位伟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未竟之业,并且进一步将它向前推进。”(第2页)他立足中国国情,重视调查研究,独立思考,正确分析和判断了世界大势,系统总结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

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确道路,使得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之后,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毛泽东的伟绩,在于使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邓小平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纪伟人。(第 341 页)他一生“三落三起”,无私无畏,坚持原则;“他继承前人,又不为前人所囿;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毫不犹豫地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第 3 页)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场新的革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 20 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一位振兴中华的杰出领袖。

近几年来,关于孙、毛、邓的研究论著很多,与许多已经出版的论著相比,《世纪三伟人》对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生平、思想以及 20 世纪中国的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明显特点和优点。

《世纪三伟人》是一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研究性政治评传。权威性是它的头一个特点。对于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生平、思想传记和评论,可以有许多体裁,但是无论何种体裁和风格,首先对于著者来说是有一定要求的,即著者必须广泛占有评传对象的第一手材料,是这方面公认的研究权威。关于孙、毛、邓的评传著述,迄今为止,国内外专家学者已有单独出版的读物多种。为什么还要出版这一本呢?我们知道,1997 年,在举世瞩目的中共

“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首先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回顾了 100 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精辟地概括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 560 页)这是我们党头一次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出现在党的文件中。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三位伟大人物,作为 20 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先进分子的最杰出代表,并得到了全党的认可。但是,如何将党中央的这一精辟概括,迅速在全党上下和在全国人民中传播开来,并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显然,历史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正站在 21 世纪的大门口,回顾 20 世纪,了解三位中国伟人的生平,进一步学习他们的思想理论,必将大有益于我们下一世纪的事业,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第 4 页)这就需要编撰一部具有说服力、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来供党内外同志学习和参考。这样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重任,自然地落到了专门从事孙、毛、邓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身上。该书的作者们正是具备了驾驭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巨著的能力和素质。书中作者在把握题材,运用资料,分析历史事件和剖析历史人物,尤其是在评价伟人的得与失、功与过等方面,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保持与党中央一致的原则。书中的史料翔实,观点正确,论述准确、到位,读来倍感亲切和真实可信,确是一部学习和了解世纪三伟人生平思想和 20 世纪中国的权威性力作。

《世纪三伟人》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品味的论著,可以把它当作学术专著来读。如何看当前著作的学术品味,不是本文的话题。但这里我想讲的是,该书的学术品味有它几方面的涵义:一是遵循了学术规范的创作,无论是材料组织、观点提出,还是全书结构的系统层次性,无疑都是一部值得颂扬的好书;二是围

绕世纪三伟人为振兴中华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将他们为振兴中华的思想方法,主体力量,外部条件和发展道路等思想理论,融入了其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里头。这样的力作放在案头上,着实为我们的科研提供了许多便利。

之所以说《世纪三伟人》具有学术品味,还有帮助我们认识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帮助我们学习和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这样重要的第三重涵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2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党的“十五大”报告》页码)孙中山最早喊出“振兴中华”的呼声,曾经深深打动几代中国人的心。近代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把中华民族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下拯救出来,使国家臻于富强,实现由他力倡的三民主义的目标。早在“1911 年 10 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之后,“革命处于凯举行进的高潮阶段。”孙中山就意识到“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第 52 页)终于,孙中山领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摧毁了充当列强“鹰犬”的清朝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从此,人们的民族觉醒和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就是中国在 20 世纪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条件。书中分别以“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第 18 页)、“为创建共和国而奋斗”(第 34 页)、“捍卫共和制度的‘艰难顿挫’”(第 63 页)为标题,作了较为详细透彻的

论述。今天,我们读来,不时激起对站在世纪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的敬仰之情。

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党的“十五大”报告》第 3 页)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开始了新的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而又艰苦的摸索之后得出的结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指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经过 20 多年的斗争,推翻了统治中国的三座大山,在 20 世纪的中期,建立了新中国。受尽百年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从此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随即,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就是中国在 20 世纪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解决了中华民族面对着的两大历史任务之第一桩历史任务,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书中分别在“星火燎原”(第 190 页)、“奠基西北”(第 207 页)、“中流砥柱”(第 222 页)、“决战前后”(第 240 页)、“开国立业”(第 263 页)、“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第 275 页)、“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第 291 页)中,对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独到的论述。仿佛让我们回到了“毛泽东时代”,充满着激情和壮志以及对世纪伟人毛泽东的崇敬。当然,书中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作了恰如其分的交代。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失误,造成了他个人政治生活的悲剧,也给中国的建设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第 322 页)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坚持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同时,也不断地纠正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左’的错误。”(第 324 页)这些述评比较公允和客观的反映了历史事实。通读书中“重提阶级斗争”(第 313 页)和“暮年岁月”(第 324 页),会有同样的感受。

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在期盼。怎样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历史重任落到了世纪伟人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新的革命,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形成了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中华大地的面貌飞速改变,中华民族信心百倍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经历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正在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书中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核心”(第440页)这一长篇,对在邓小平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作了详细的回顾。

引述那么多,无非是想说明,《世纪三伟人》除了其学术价值外,同时也还能为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作为学习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史,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的辅助读物。

第三个特点是极有可读性。政治题材作品的创作,要有学术品味,又要获得广大读者认同,必须付出艰辛劳动才有回报。显然,该书的作者们,煞费苦心,力求达到预期目的。书中把三伟人从青少年始就树立起立志振兴中华的理想,作了不同一般的勾画。而这又是世纪三伟人的一个共同点。这样的安排,对于吸纳广大青少年读者,提升读者层面大有裨益。对于世纪三伟人如何走上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书中多有笔墨。时或妙笔横生,令今人对世纪三伟人油然而敬。如在书中讲到孙中山“探求救国拯民的道路”(第8页)一节时写道:“少年时代已经逝去,青春年华伴同他返

回祖国。开阔的视野,新的知识和观感,变革社会的热忱,‘神圣的权力不是永恒的’的信念……使他对睽别五载的故土感到陌生,而在心灵深处则糅杂着伤痛、忧虑和愤懑的情愫。他从香港换乘返乡的沙船,初入国门便受到清吏的多次扣留勒索,他不禁向旅客们疾呼:‘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在他一度留居翠亨家园的日子里,“令他深感窒闷和厌憎,他在一些场合抨击官府的弊端,希冀采取修筑道路、防御盗贼等改良乡政的措施。”(第9页)中法战争爆发后,“民族意识的昂扬给予满怀爱国与变革热忱的青年孙文以‘希望和勇气’”。此后,“孙中山否定现存政权的观念潜滋暗长”,他曾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第10页)虽然,“孙中山以‘医术’为入世之媒,”却“益发热衷于政治活动。”终于,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在日军轰击辽东大地的炮声中,从上海乘船前往檀香山,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实现其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宏愿。”(第18页)

在论述毛泽东的“学生时代”(第161页)和“在革命洪流中”(第172页)等篇章,以及论述邓小平的“从青年团员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342页)这一章,都用了许多笔墨来回顾伟人从青少年开始,就立志振兴中华,投身革命的事实和经历。读来无不激发今天青少年朋友的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又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此外,《世纪三伟人》的装帧设计也都很有特色,还具有很好的收藏价值,也是馈赠亲友的一部好礼品。

读过《世纪三伟人》后,如果说还有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略嫌篇幅少了一些,有的内容还未能充分展开。期盼经过扩容增量的新版本,早日问世。●

责任编辑:冯生